半截墓碑下的往事

高岗在北京

作者：　赵家梁、张晓霁
ISBN：978-988-99725-5-4
出 版 社：大风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年 7 月
价格：HK＄118.00
页数：406 页

【内容简介】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历次政治斗争，如今，除了“四人帮”，连林彪都给予正面评价了。高岗反党集团，至今讳莫如深。建国初期，高岗荣升国家副主席，政治地位仅次于刘少奇，眼看取而代之，突然变成反党集团。以党中央三人轮流值班的至尊身份，第一次自杀未遂，第二次自杀成功！高岗是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的，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为什么能够自杀成功？经过这么多年，牵连这么多西北干部，成为共产党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桩悬案！

本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完整展示高岗自杀前后的详细经过，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云等人的表现，许多过去从未有披露过的详情，闻所未闻！

【本书特色】

本书由高岗当年的秘书、后来的管教小组组长赵家梁，根据当年笔记，忠实还原高岗事件的原貌。

当年赵家梁看到高岗第一次用手枪自杀，扑上去夺枪，两人扑倒在地，……根据赵家梁的亲身经历，事件涉及许多党内高级干部，大量细致的言行记录，生动鲜活。

书稿历经 13 年写作修改，反复核实，多次征求高岗夫人李立群、梅行、马洪等诸多当事人的意见。

【作者简介】

赵家梁

1952 年任高岗秘书，1954 年任高岗管教工作组组长。多年来，为高岗平反，无数次向党中央申诉，并与家属修整高岗墓碑，挂一纸手书“高岗同志之墓”（见书中照片）。2007 年 9 月去世，终于没能等到本书出版。

张晓霁

高岗反党集团“五虎上将”之一张明远的女儿。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高岗曾经是一位红极一时的人物。20 世纪 30 年代，他和刘志丹、谢子长等人一起，领导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创建了陕北（包括陕甘）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他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和西北局书记，三次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长，　【注 1　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是在 1946 年召开的，当时高岗已经调到东北工作，但边区人民还是选他为参议会的议长。】是第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领导边区人民艰苦奋斗，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根据地，赢得了边区人民的拥戴。日本投降后至东北全境解放前，他先后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局副书记兼秘书长、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在创建和巩固北满根据地、剿匪、扩军建军、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做出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

和经济建设初期，他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在领导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号召党的领导干部向他学习，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

1952年10月，高岗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真可谓位高权重，显赫辉煌。可是，谁能想到，在他进京工作仅仅一年多，便背着“反党夺权”的罪名从顶峰堕入深渊，落得身败名裂，自杀身亡的悲惨下场。

1955 年 3 月，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公诸于世，他们二人被开除出党。这是建国后党内斗争的第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当时在国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而且至今还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其实，当初在确定“高饶反党联盟”时，中共党内就有不少人不理解、想不通。但是，由于问题涉及最高领导，下边的人很难了解内情，更何况在当时那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谁敢有半点异议？

如今，50 多年过去了。目前国内外一些书刊所发表的有关高饶问题的文章，依然很少披露令人信服的有关高岗“反党篡权”的事实依据，有的甚至故意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误导读者；或者真假参半，给人似是而非的印象，徒增迷团。这就使得人们越来越感到，在这一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许多未解之谜，吸引着一些人去探索这一事件的真相。

改革开放以后，中共的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开始以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审视过去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绝大部分已得到较公正的评价，该平反者已经平反。唯有这个“高饶事件”依然被厚重的帷幕遮盖着，讳莫如深。1981 年中共 11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抹去了这一事件的“集团”、“联盟”字样，但两个“司令”和“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当年被列入“集团”、“联盟”的成员，虽然在工作上得到重新安排，但至今没有正式恢复名誉，受牵连的人也只能继续忍辱负重。

这是为什么？

笔者经过多年多方搜集真实材料，加以研究剖析之后，对这一事件的脉络有了基本了解。

人们清楚地记得1966年8月毛泽东写的那张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刘少奇就是由此而倒台，随后被迫害致死在开封的一个地下室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毛泽东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以及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念头决非始于“文化大革命”。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并开始考虑新的助手和接班人。相比之下，毛泽东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少奇不满，以及想叫刘少奇“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少奇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泽东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有关刘少奇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只不过在 1954 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岗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 年夏秋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泽东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少奇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 12 月，毛泽东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了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泽东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少奇，变为联合刘少奇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

情，本书将一一缕述。

有人会说，这是给高岗翻案。其实不然。高岗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其最主要的错误就是反对刘少奇；随便传播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团结的话，以及在生活作风上极度腐败等等。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反党，是不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对待历史，应该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凡是搞错了的，就应当让历史还其本来面目，让后人能以史为鉴。这样的历史纠错，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必要的；不仅是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人，即使是一般具有正义感的人，也应该做的事情。

或许还有人说，这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这更是乱打棍子。一个政党或领袖的威望，绝非靠护短而获得。所谓以史为鉴，不仅仅是歌功颂德，还必须包括对惨痛教训的反思。况且，本书并非全面总结评价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只不过是披露一个历史事件的内情与剖析其发生的因由而已。倘若我们党能够认真反思这一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则不但不会失其威望，反而会更显其伟大英明。那种动辄挥舞“反党”、“反毛主席”的大棒，稍言不是，就把人打“死”的作风，于党、于国、于人、于己绝无益处，还是收起来的好。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当年在高岗身边工作、生活的人们和知情者，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不避嫌疑，出于维护党的利益和形象，维护历史的真实性，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

倘若这本书能通过高岗事件给人们以启示，以借鉴，笔者即当十分欣慰了。

2006 年 5 月

目 录

第一章　管教期间

1954 年 2 月 17 日，中央揭发批判高岗的座谈会进入第三天，下午，突然传来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与会者满座皆惊，议论纷纷。党中央立即研究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

一、接受管教

已经是下午三点多钟了，高岗还没有吃午饭，也不想吃。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与死的搏斗，被人们从鬼门关口上强拉回来。过度的紧张与亢奋之后，转而是极度的疲惫。

他静静地躺在大床上，思绪纷乱，犹如野马狂奔，无法控制。

他回想中午那终身难忘的情景，满脑子的懊丧、后悔、埋怨和责怪。他不明白，当时自己的头颅和枪口相距不到三四寸，怎么竟然会一枪打飞了呢？他实在懊丧！他更懊悔的是，由于自己行动不果断，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他反复回想当时的情景：早上，他把大家打发出去以后，楼上没有人，怎么不马上动手呢？是呀，那会儿没有枪。

搞到枪以后，我一个人上楼来，也是个好机会嘛，可是却又坐失良机。为什么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还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心慌意乱，不小心划破了腮帮？到了这种时候，为什么还要发出给毛主席的检讨书和给周总理的托孤信？放在那里，以后人家自然会发现嘛！这一切，只是延误了时间，丧失了时机，暴露了自杀的企图。唉！都怪我自己！我咋这么优柔寡断呀！还有小李（高岗之妻李力群）、赵家梁（高的秘书）他们，为什么都跑来阻拦我？

他怪这怪那，就是不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有自杀的念头，要干这种蠢事。

他又想起，当时赵家梁好像曾叫人“块打电话，块打电话！”是啊，他们打电话了，马上就要来人抓我啦！

他立刻惊醒，警觉地倾听着外面的动静，一听到脚步声，就以为是抓他的人来了。

他的头脑乱极了：一会儿闪映着他妻子的脸，一会儿有闪现出周围人们紧张、疑惑的目光。瞧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身边，好像故意在随行附影！原来他们是有意防备我再自杀。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有多苦，怎知我蒙受了多大的冤屈？我实在受不了啊！　　他们真不该阻拦我。

他忽然想起中午还没有吃饭，是呀，大家都没吃，都在围着他忙活。想起周围的人对他真情劝慰，奋力抢救，为他担忧，他心里又泛起对大家的感激之情：他们也累了一天，该休息了。想到这些，他又由衷地感到对大家的歉意。

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中，他迷迷糊糊，似睡似醒，也不知过了多久，只觉得阳光渐退，天色渐暗。

蓦然间，走廊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他立即警觉地倾听着，紧张地注视着房门。果然，他看到赵家梁陪着几个人进来了。啊，原来是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张秀山，都是他在陕北时期的老战友。

咦？他们怎么一起来了？——他顾不上多想，赶忙做起，强装笑脸招呼：“欢迎，欢迎！请坐，请坐！”

可是，大家却是一脸的严肃，板着面孔，好像陌路人相见，令他心颤，立刻色变。一时间，房内空气仿佛凝结不动似的，静得几乎只听见身边人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高岗没有下地，就盘腿坐在床上，习仲勋等人分别坐在沙发上，李立群在床头站着，赵家梁先是站在床边，后来就坐在床沿上。一场严肃而沉重的谈话开始了。

习仲勋开门见山，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是代表中央来和你谈判的。”

赵家梁感到奇怪：怎么不说“谈话”，而说“谈判”？

“你的错误极其严重，今天的事，你错上加错！现在把你挽救过来，你要悬崖勒马，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再不能错上加错。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首要的是平静下来，好好休息。至于检查反省，等你平静以后再好好进行。”

高岗显得格外平静，埋头听着，流着泪，不时点点头。习仲勋指指赵家梁，继续说：“赵家梁他们挽救了你，他们做得对，你应该感谢他们，决不能对他们怀恨在心，仇视他们。”

他抬起头，望大家一眼，那眼神既痛苦又茫然，似乎还没有完全从中午发生的事情中清醒过来。

“从现在起，中央决定对你实行管教，由赵家梁负责，以后你一切都要听他的。管教期

间，你要服从管教，要杜绝三个可能：自杀、杀人、外逃。【 注 1 党中央考虑到高岗的住宅毗邻苏联驻华大使馆，故有此担心。】至于生活待遇，一切照旧。”

这时，高岗已是泪流满面。思绪乱极了。他感到意外，居然没有抓他，还待遇照旧。他不免有些庆幸，又不太相信：也许，这只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吧？

——唉？中央怎么知道的？准是赵秘书讲的。他当时就喊人“快打电话!”现在又让他负责管教工作，还叫我不要仇视他们，而要感谢他们……

猛然间，他发现屋子里静极了。怎么刚才一走神，就讲完了？习仲勋说什么来着？——他极力回想：管教……不要仇恨……是呀，该表个态才是。

他终于从胡思乱想中惊醒，不断重复着：“我决不再错上加错，一定听从党的决定。”说着，转身拉起赵家梁的手说：“谢谢你救了我，我一定服从管教。”

习仲勋他们起身，扔和来时一样，既没有流露对高岗的同情惋惜，也没有握手告别，只点点头，严肃而又凝重地离去了。

高岗仍沉浸在方才的气氛中，坐在床上低头沉思，似乎谈话还未结束；有似乎习仲勋他们马上又会回来：说不定一会儿还会叫人把我抓走？——他又胡思乱想起来。

从下午五点多到夜里十点多钟，周总理多次打电话向赵家梁询问高岗的情况，并一再叮嘱说：“不要丧失警惕。”“要高度警惕，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要用猛药来治，要对他实行管教。人员不够，中央会调人来。”；“现在先让他安静下来，不忙写检查反省。”；“张秀山（东北局副书记）、安志文（计委委员）和你（赵家梁）就在高岗的楼上住下来，李力群和高老虎（高岗的长子）也一定不要离开。”；“中央马上派人来负责楼下的警卫工作，他们暂不与高岗见面……”。

傍晚，中央派来公安部的李树槐处长和赵光华等六位科级以上的警卫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的，同时成立了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组，由赵家梁任组长，李树槐任副组长，机要秘书董文彬为组员，不久，又吸收李力群为组员。安志文不是管教组的成员，但在在管教初期的一段时间，一直住在高岗家里，帮助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并向中央反映高岗的情况。

后来得知，党中央当晚先后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上述措施。

1954 年 3 月，安志文去沈阳参加东北高干会，以后再没有回高岗家。

1954 年 7 月，李树槐调走，由公安部的赵光华接任副组长。

时针已指到晚上七点多，离当天的早餐已十个小时了。经几人多次劝说，高岗勉强吃了点东西，算是午餐，也是晚餐。他平时吃得并不多，现在吃得更少，只吃了一个油炸馒头和一碗稀粥，几乎没有吃菜。

他坐在沙发里抽着烟，思绪万千，心情一点也没有放松。他不相信中央对今天的事会就此了结，总觉得一定坏派人来把他抓走，说不定今天夜里乘他熟睡的时候就会来抓人？

他又想起毛主席从杭州给他传来的话，那是下午五点半钟，周恩来打来电话，由赵家梁记录下来向他转达的。

他摊开赵家梁抄写的字条，看了又看：“主席讲，要‘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前面补充一句：‘错误严重’。主席的意见是，让高岗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此时，他又似乎感受到毛泽东对他的深情厚谊。是啊，习仲勋他们来，就是代表中央正式传达毛主席指示的。

唉！他发出一声长叹，泪水从眼角滚滚流下，有陷入深思：

——毛主席，毛主席！你咋不早出来说话呀！现在“悬崖勒马”行吗？我是想勒马，可是人家要把我往下推呀!“重新做人”？现在闹成这个样子，叫我怎么重新做人？我的身体没病，不需要休息，我是新病，我想不通呀！你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你却要我自己“好好反省”。“尽量挽救”？谁来挽救我呀……

他想过去，想现在，似乎不怎么想将来。他更多的是懊丧自杀未遂；是埋怨身边的人不该阻拦他自杀；埋怨他们不理解他内心有多么痛苦，不了解他的处境多么困难。

夜里 11 点多，他终于摁灭了烟头，站起身，慢步沿着走廊向西走去，从开着的房门里突然看见张秀山，感到有些意外，便进去坐沙发上，欲言又止。张秀山，这位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老战友，此时此刻，又能说些什么呢？两人默默地抽着烟，千语万言，尽在不言中。过了好一会儿，高岗说了句："一切都完了！"也不等张秀山答话，便起身离去。

回到自己的卧室以后，他又坐在沙发里抽烟。

李立群柔声说："早点歇着吧，折腾了一天，很累了。"

高岗没有答话，默默地坐到她身边，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手，算是回答妻子对他的关怀。这样坐了好一会儿，才对妻子说："你们不该阻拦我，不如让我死了算了！"

这些天来，特别是今天中午出事以后，李力群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极力控制着自己，强打精神劝慰他、照顾他，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想不到他还在钻牛角尖儿，自己的心意算是白费了！她坐在他身边，满腹委屈涌上心头，不禁伤心落泪、低头哭泣。高岗仍自想他的心事，有过了一会儿，搂搂她的肩，说："别哭了，你到外边去看，有没有人藏在哪里监视我？"李力群抹抹泪，起身出去转了一会儿，回来说：" 哪有什么人！"

直到次日凌晨三点半，他才上床，可是不一会儿就惊醒，慌慌张张地起来东张西望，看看室外、走廊、窗外，像是噩梦余惊。

他的管教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二、被管教的日子

高岗是 1953 年 1 月住进东交民巷八号院的。

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门楼巍峨，一对青灰石狮雄踞两侧，庄严威武。平时，两扇红漆大门紧闭，只开旁边的小门出入；院子约有百亩，布局井然；两层的主楼坐北朝南，青砖灰墙，长廊向阳，上下两层，房间数十，楼下大厅可容纳数百人翩翩起舞。当时，除高岗一家住在这里以外，秘书和警卫的办公室、值班室也都设在这里。主楼两侧是四座配楼，东三西一。起初，高岗一家住在西配楼，暑假时孩子们回来后才住主楼，楼梯吱吱响，摆设很简单。现在西楼暂时空闲着。院子四角均有配房，为秘书、警卫和服务人员的宿舍和花房、车库等。主楼东门外有一片空地，现在既是停车场，又是篮球场。大院四周青灰高墙，绿树参天；院中花香罗列，芳草铺地；散步其间，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高岗和的夫人带着小女儿一起住在主楼楼上东南角的一个大房间里。在他事业辉煌的顶峰之时，这里曾经车水马龙，宾客如云。

自从对高岗实行管教以后，他的卧室斜后面增设了一个管教人员的值班室，虽然中间隔着一个偌大的盥洗间，但实际上值班室的西门与高岗卧室相距仅四、五步，只隔着一堵薄壁。因此，值班人员能够听到卧室内的动静。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安志文和赵家梁住进起居室斜对面的一个房间（原来是孩子们放假回来住的，现在空着）；张秀山住进西边的一个房间。如今，院子里警卫森严，一般人员不能随便出入；无论院中还是室内，都绝少人员走动，楼房里也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一切都了无生气，犹如一座"冷宫"。

起初，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联系，他几乎每天来电话，甚至一天两三次电话询问高岗的情况，每隔三五天就亲自听赵家梁汇报，一再强调要努力挽救高岗，先好好休息，稳定情绪，安定下来，然后再检查反省；要求管教人员保持警惕，防止意外；要安排好高岗的生活和文体活动等等。

1954 年 4 月初，周恩来出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接着又访问东德、波兰、苏联、蒙古等国，直到 8 月初才回来。在此期间，先是由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负责与管教组联系，不到一个月，改由中央副秘书长杨尚昆联系，7 月以后，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联系（有时由副部长徐子荣和八局局长岳欣联系）。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认真管这件事。

高岗从1954年2月17日开始被管教，至8月17日自杀身亡，整整半年，大致经历了稳定情绪、准备检查、进行反省、等待处理和紧张绝望的过程。

（一）稳定情绪

开始的两三天，高岗似乎还没有从自杀引起的震撼中清醒过来：他吃不下，睡不着，经常独坐沙发，抽烟喝茶，终日神不守舍；呆头呆脑，却有很紧张、神经质。有时深夜被噩梦惊醒，突然做起来大叫："楼下来车了，来抓我来了!"

1954年2月18日，高岗上午八点多起床，情绪沮丧，精神萎靡。早饭勉强喝了点稀粥，就一屁股坐在沙发里，默不作声地捧读毛主席谈话的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张秀山、安志文、赵家梁三人一起跟高岗交谈，围绕毛主席谈话和习仲勋代表党中央的谈话精神，进行劝慰，也有批评。高岗不时流着泪表示："绝不啦!""听毛主席的话!"

当天午饭基本没有吃什么，也没有午睡；拿着电话记录看了又看。

下午，高岗先后三次找赵家梁谈心，他说话完全不像平时那样果断、明确、爽朗、利索，而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但意思清楚。他谈的内容主要是：这次犯了大错，表示悔恨；非常想念毛主席、党中央；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挽救和处理；决心服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今后，关死三个门，不自杀、不（把错误）推诿给别人、不躲躲闪闪。

他还对赵家梁说："我自己毕竟还是个人，请相信我，你们放心，我绝不再干蠢事(自杀)。""我真心感谢你，过去你帮助我工作，这次又挽救了我；往后，你还要帮助我，不要歧视，我一定服从管教。"他最后说："休息几天后，请你和志文帮助，争取两三个月之内完成我的检查反省。"

他说这些话时，泪流满面。

1954年2月19日，高岗虽然像往日一样按时进餐、休息，但还是吃得很少，睡觉也很少，经常独坐沙发，抽烟沉思，不时捧读毛主席的谈话记录。当天半夜上床休息，深夜惊醒，说："下面来车了！小李，你快去看看!"

1954年2月20日上午九点多，习仲勋来。今天他非常随便、自然，完全是老战友的神情，不像17日那天代表中央来时那样一脸凝霜，十分严肃。他径直上楼，进入起居室，还没等高岗从沙发上站起来，就已含笑、点头、握手，不需说话，就充分溢露了真挚的情谊。

不久，贺晋年也上楼来。他正参加揭批高岗问题的座谈会，这是高岗自杀未遂后第一次来。高岗见他进来，就迎上前去。贺晋年一言未发，双手紧紧握住高岗的手摇了又摇，然后挨坐在他右边。贺晋年的动作和眼神，让人明显感觉到他对高岗的情谊非浅。

张秀山紧随习、贺之后进来。他似乎早知他们要来，很自然，不用打招呼。他们都是高岗的老熟人，都是中央派他们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帮助高岗端正态度，让他早日平静下来，不要错上加错。

下午，贾拓夫、张秀山、安志文、马洪一起来跟高岗谈心，安定他的情绪，同时也批评他的错误，有时批评得很尖锐、激烈。高岗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上不去，有距离。

这天的两次交谈，上午比下午的要自然些，有交锋，有交流；高对贺晋年似乎更信任些。

两次交谈，对高岗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入请入理的思想剖析。都讲到，高岗对座谈会要有正确的态度；说既然是座谈，就比较随便，难免有捕风捉影、随意上纲的地方，"你不能一听就跳，不能对立顶牛"；说他盛名之下，其实不符；说他"二杆子"，没头脑；说他过高估计了自己，过分听信了别人。

高岗承认他对座谈会的态度不对头；承认人家说他反对刘少奇合乎事实，他是有这个错误。但说他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反对毛主席，是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这些不合乎事实，他想不通，他更想不通的是：毛主席过去对他一直很好，现在为什么突然整他？他说：

“就算我有错误，该批判，也不能这样上纲上线；而且越批，上纲越高，这是要把我一棍子打死呀。”“我从来没有反对毛主席，根本没有想过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议论少奇、散布对少奇不满的，不只是我一个人，为什么座谈会上把有人反对刘少奇的事都扣在我一个人头上？我现在有口难辩，也没人出来说话，这不是有意把我往死里整唷！”他几次怨气十足地说：“根本没有的事，硬要我承认，我受不了！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死了拉倒！”他一边说一边落泪，非常委屈。

谈到自杀，大家都很严肃地批评他，说这是极端错误的，有的说他以对立、对抗的态度对待座谈会；有的说他这是向党开枪，自绝于党，自绝于革命；有的说他以错误的行为对待自己的错误，是错上加错，是懦夫，极端自私；也有的说他这么糊涂，开枪自杀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自己放弃申诉、申辩的权利……习仲勋说：“你怎么这么小气，座谈会嘛，随便说说，你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习仲勋、贾拓夫等人走时，高岗都站起来说：希望你们能常来。他们则表示：只要你回心转意，我们会常来的。很显然，他们的到来和交谈，对高岗稳定情绪起了一定的作用。

下午，高岗表示要给座谈会写个检讨。但是写什么内容，意见不一致。张秀山、安志文坚持说，既要写检讨，那就不只检讨你这次自杀的错误，还要检讨他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高岗卡壳了，他怎么也不能检讨自己是“野心家、阴谋家、反党反毛主席、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直到 2 月 24 日，高岗才把检讨送走。

22 日（自杀未遂之后的第五天）以后，从表面上看，高岗似乎稍稍恢复了平静，有时下楼去院子里散步，有时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扑克、下棋。24 日开始，每天上午学习。这种表面的平静仅仅持续了三天。

座谈会在高岗缺席的情况下继续进行，气氛更加紧张激烈，而且调门越提越高，他很快就被说成是一个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要“篡党夺权”；不仅反对毛主席。反对刘少奇，还反对周恩来、林彪和陈云，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等等。会间，也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高岗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的问题不应定为反党性质。但立即遭到驳斥：“不要乱放炮！”

这期间，高岗每天认真看送来的座谈会记录，对有些发言特别注意，看了又看；在看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华、马洪等人的发言时，他显得很激动；对有些人的发言内容很有意见，认为与事实不符。

一次，刘景范（刘志丹之弟）来看他时说：“你咋这么糊涂，有什么话不好说，为什么要自杀嘛？”

他叹口气，沉重地说：“有些事，我不能说呀，说了，别人饶不了我，主席也饶不了我，对你们也不好。”说了这话，两人沉默了许久。

一天，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还揭发说，高岗曾和一个洋人单独谈了三天三夜。立即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

傍晚，张秀山回来对高岗说：“今天刘亚楼揭发你与洋人关系不正常，说你与那洋人密谈了三天三夜。”

高岗一听，立刻激动起来，红着脸嚷道：“刘亚楼胡说！没有那个事！我要声明，没有这个问题！”

晚饭后，他又到张秀山卧室，大声说：“我要郑重声明，我绝没有里通外国，绝对没有挑拨离间！”

他一再说，我不懂俄文，不会讲俄语，跟洋人的一切交谈都得由别人翻译，怎么可能背后搞鬼？在北满的翻译有卢竟如，沈阳有舒林，他们都在，可以叫来问问嘛。这件事刘亚楼自己非常清楚，根本没有这事。

1954 年 2 月 25 日，张秀山带回周恩来总理在座谈会的总结发言记录，其中指出：【注

2 根据赵家梁和张明远在座谈会的记录整理。】

根据高岗发言及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 43 位同志的发言及所揭发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

高岗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有如下事实：

一、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说编党史有二元论，把党分成苏区的、白区的，说毛主席代表苏区，刘少奇代表白区；说白区干部要篡党；说中国革命是从江西与陕北搞起的，编党史要对“七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修改，重下定论，企图以此煽动和影响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在八大代表团及党代表会夺取领导地位。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 1949 年起，即有计划地向多人传播中央领导同志个别的缺点错误，并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已经改正的缺点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有的还抄成档案，作为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资料到处传播；并造谣诽谤，污蔑中央领导同志有宗派，实际是掩护自己的宗派活动，以打击中央领导同志，使自己获得党和国家领导权。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利用自己已有权力寻找机会制造矛盾，逢甲说乙，逢丙说丁，挑拨、拉拢，或二者兼施。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私自对干部封官许愿，以图扩大自己的影响，骗取信任。对干部无原则，不单是对干部的看法片面，是有意识拉一部分，打一部分，企图造成党内派别，破坏党的团结。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独立王国。在东北时期对工作报喜不报忧，不愿检讨，受不得批评；认为来中央工作是调虎离山，兼中央局书记才放心。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对中央政治生活发生许多错觉，把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成是不正常。散布流言蜚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破坏党的团结和中央领导同志威信。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装潢自己，蒙蔽中央。他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又不努力学习，却冒他人之功，吹嘘自己，以扩大其影响。

八、搬弄是非，挑拨中苏关系。在东北时期，未向中央请示即同苏联同志谈党内问题；去苏联回国后说过许多挑拨是非的话。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自财经会议前后，中央提出国家是否实行部长会议制，党中央实行总书记制或设主席团的问题后，高岗即迫不及待地积极活动，打着毛主席的旗帜，伪造毛主席言谈，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假装赞扬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如说高不如林；对陈云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中央尚未决定林彪当计委副主席，高就在专家中宣布），实质上并不是真正赞扬林、陈，而是想拉他们作为自己上台的跳板。从他给主席的信 【注 3 指高岗自杀未遂前烧掉的给毛泽东的信，其中交代揭发了一些高级干部向他讲过的或一起议论过的有关刘少奇的言论】可见，他最恨的就是陈云和彭真，临死还要血口喷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高岗的一切阴谋活动。

此外，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者的道德标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党的表现，我们必须反对，并坚决抵制这种腐蚀。

上述事实，暴露出高岗是如何从多年的党员堕落到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并企图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改造我们的党。

党中央为了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向全党敲起警钟，并向高岗提出警告，指出高岗错误

的严重性，促其反省。但高岗拒绝反省，仇恨党和同志们揭发其错误，最后竟以自杀行为自绝于党和人民。虽然未遂，但已暴露其叛党的本质。

高岗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有其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但其个人主义思想与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胜利后大发展起来。表现在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不如意时患得患失，泄气动摇，想当和尚，学范蠡。

高岗的腐化行为不是一般的缺点，而是剥削阶级堕落思想的反映，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外，还有流氓无产阶级的思想。这是他的黑暗的一面。列宁同志说过："生活上不纯的，政治上必然也不纯"。高岗最近的错误，就是其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使他一步步变成资产阶级在我党内的代理人。

对高岗要长期考察。如果他真有愧悔的念头，就应当服从党的管教，沉痛认罪，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

从高岗的事件中应吸取的教训：一切骄傲自满情绪、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宗派情绪、小团体习气、分散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都应受到批判；"军党论"思想必须肃清；个人主义野心家必须防止；党内非法活动必须禁止；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必须反对；独立王国思想必须消灭；党的统一领导与集体领导原则必须坚持；党内民主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发展与提倡；党任何干部都必须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共产主义人生观必须确立；马列主义的教育必须加强。

高岗很认真地看了记录，言谈之中，流露出心里很不服气、不赞同的意思。他说：哪来那么多的错误?座谈会嘛，什么都可以说，最后还要调查核实嘛。可是，现在这样一总结，就成定论了。

当晚，经过管教人员一番心平气和地劝慰后，他在临睡前说："请放心，我不再干蠢事，不自杀啦，总而言之，彻底交代，一切交给党，不反对总理的总结发言，不冲动。"

此后几天，高岗看书、学习，散步、玩牌，与张秀山等交谈，似乎还平静，实际上他内心仍很不安。

1954 年 2 月 28 日，送来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提纲的批示：

恩来同志 2 月 25 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

同时，他对周恩来的总结作了修改补充（修改补充之处以黑体字表示）：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 突出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化我们党的一种反映。【注 4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第 451 页。】

高岗看了，激动、委屈、不平，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第二天（1954 年 3 月 1 日）中午，高岗说：这几天睡得不好，心里不是滋味。看了总理的总结发言，觉得党票完了，政治生命完了。3 月 3 日那天，当他得知东北、西北都已开会传达，便唉声叹气，说：实际上对我已做了结论，还有什么检讨可言？就等着听党处理了！

平时，高岗每晚服用两粒安眠药（速可眠）才入睡。出事之后，他更睡不好，一再要求给他安眠药。经请示同意，每晚在李力群的监督下给他服用。这几天晚上，高岗多次说，给他的安眠药是假的，吃了不管用，有时甚至退回不要。

1954 年 3 月 5 日下午，高岗刻意找管教人员说：放心吧，我决不再走绝路了。他很郑重

地对周恩来总理1954年2月25日的总结发言作了几点不同意是申诉，并表示从今天下午开始，一面学习，一面联系自己进行检查反省。

座谈会结束后，张秀山、贺晋年回沈阳之前，分别来看高岗，彼此都很难过。那天贺晋年告别时，高岗送他下楼，两人紧紧握手，贺晋年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急忙把头侧向一边，唏嘘着说："希望在陕北再见到你。"

高岗激动的哽咽了，说不出话来。多好的老战友啊！真的还能再见吗？难道从此诀别，再难相见？

贺晋年匆匆上车，向他挥挥手，走了。他久久站在楼门前望着，不肯上楼去。

送走贺晋年，高岗心头久久回荡着贺晋年的最后那句话："在陕北再见到你。"他猛然醒悟：对！回陕北去，要求回陕北去……他又陷入了胡思乱想。

（二）准备检查

从1954年3月5日到3月19日，高岗基本上都是每天上午看书学习，下午对照学习内容进行检查反省，边学边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

看书学习是作为高岗稳定情绪和准备反省的一项措施。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管教人员拟定了学习计划（共分五个单元），安排了学习进度，每个单元都具体开列了书目和章节，经周恩来同意后执行。如：

第一单元——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文件：

1、斯大林：《论批评与自我批评》；

2、斯大林：《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的报告》；

3、毛主席：《关于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4页）；

4、毛主席：《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351页）；

5、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第953页）；

6、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的修养》；

7、刘少奇同志：《论党》；

第二单元——增强党性，虚心学习文件：

1、毛主席：《红四军党代表会议的决议稿》，关于个人主义部分，《毛泽东选集》第95页；

2、《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错误思想举例部分；

3、《论党》；

4、《增强党性锻炼的决定》；

第三单元——党的纪律，学习文件：

1、斯大林：《论干部政策》；

2、毛主席：《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67页）；

3、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489、490页）；

4、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1948年版第948页）；

5、刘少奇同志：《论党》（干部问题）；

6、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7、《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在组织上的错误部分；

第四单元——党的团结：

1、列宁在联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统一决议草案；

2、《联共党史》<结束语>（第四、第五两节）；

3、《列宁主义问题》第112页；

4、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报告；

5、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定；

第五单元——经济建设。

学习方法是边学文件、边看书、边对照检查，边谈边写。起初是安排每天上午自学。几天后，高岗表示，这样好，学有所得，愿意学。后来，他要求赵、董二位秘书与他一起学习，并增加了谈国际国内时事的内容。

在管教期间，这样学习一直坚持下来。

1954 年 3 月 16 日，距离高岗自杀未遂整整一个月，周总理派人送来刘少奇在高干座谈会的报告和周总理在座谈会总结发言的正式文件，并要赵家梁向高岗传达周总理的话："这两个文件，是经过毛主席建议，中央政治局批准通过，作为初步结论。这个结论是根据确凿的材料归纳起来的共同认识，是无可置辩的；但也还是初步的，因为材料还在调查中，还有待你自己的彻底交代。在你面前有两个前途：或者彻底交代，沉痛认罪；或者抗拒到底，死不认罪。希望是前者而不是后者。要杜绝三件可能发生的事：自杀、杀人、逃跑。"

两个文件都列举了高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主要罪状。

高岗听了传达，沉默不语，要求把文件留下，并且不无怨气地对赵家梁说：那么多内容，记也记不住，以后又会说我检讨反省不彻底啦。

他认真阅读了这两个文件和总理谈话记录，心里很不服气，当晚直到次日凌晨一点半，他都不能入睡，独坐沙发抽烟沉思。

第二天，1954 年 3 月 17 日，高岗找来赵家梁反复谈他对两个文件的意见。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确实犯了严重错误，认为刘少奇不能掌舵，不能做毛主席的接班人；说他并不是要打倒刘少奇，只是像毛主席说的那样，让刘担任荣誉职务。另一方面，他又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把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上纲那么高，实在是冤枉。他认为两个文件中列举的关于他的错误和罪行，有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并逐一作了说明和辩解，提出不同的意见。这天上午和下午，他分别谈了五个小时，特别是上午的情绪很激动，委屈、气愤、抵触，对立情绪很明显。下午情绪稍平和。

对于文件中说他搞"军党论"，他根本不同意。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名词，不记得在哪里说过。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时我讲过'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句话，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那篇文章里的话"。他承认确实散布过"白区党"、"苏区党"之类的话，但他说这不是他的发明创造，由此来说他"制造军党论"，不符合事实。

赵家梁如实向周恩来汇报了高岗的说法，并问：

"'军党论'的根据是不是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

"是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根据？"

"没有。"

"高岗的这个发言稿，是马洪和我们几个人帮他准备的，其中关于'枪杆子造党'的一段话，是引用《毛泽东选集》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有关内容。"

周恩来认真听着，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高岗专案组的李波人对赵家梁说起"军党论"的问题，赵也对他作了解释。李波人说："高岗只说'我们的军队'，没说'共产党的军队'。"

赵说："从引用的全文看，'我们的军队'自然就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不会是其他党和国民党的军队。"

高岗还认为文件中所说"利用各种机会"、"有计划"、"寻找矛盾"、"今天反这，明天反那"等等，这些话都不符合事实，讲得过分。

他坚决否认自己反对刘少奇是要"取而代之"，否认有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野心。他说他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比他能干的，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从来就没有想过自己要去

当领袖。他坚持说自己只是想帮毛主席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只要不是刘少奇，谁上去都行。

在交谈中，赵家梁有时提一些问题，有时劝慰一番。两人意见没有统一，也没有闹气。最后他茫然自问：我真的有这么坏吗？怎么会发展成这样？为什么至今还不能交代？唉！欠了党和人民的债，今后怎么还呀？

尽管他面对中央文件心情很激动，感到万般无奈，有委屈、气愤、抵触情绪，但他还是与赵家梁商量下一步怎么进行反省。

晚上十点半，他自问：是不是要写个信给总理？

半夜以后，他仍独坐起居室沉思流泪，李力群多次催他休息，至凌晨四点才上床就寝。

以后连续好几天，他睡不好，吃不下，不停地想心事：——什么"确凿材料"，什么"无可置辩"？不见得！既然材料还在"调查集中"，为什么现在就匆匆作结论？

等到调查清楚再作结论也不迟呀。看来，有些人其实不关心事实究竟怎样，而是只要给我高岗作一个"要造反"的"结论"。至于我是不是真的"要造反"，是我自己"要造反"，还是有人让我"造反"，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不重要。这样事实依据不充分的结论，又怎能令人信服呢？

——照这样下去，我的党票没了，政治生命也完了！无论我怎样交代，他们都不会放过我。前途？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至于杀人、逃跑，太看重我了，我绝不会干这种事！至于自杀，已经有过一回，以后会不会再有？那得看情况，但愿不再发生……

周恩来很认真地听取有关高岗情况的汇报，一再提醒管教组，要提高警惕，注意他的安全，不要再出问题；要尽量挽救他；同时在原则问题上，该争的要争，该刺的要刺，不要怜惜他，要说得狠些，这才是真正为他好，真正帮助他，当然，要注意搞好关系。

1954 年 3 月 19 日，高岗根据中央要求，写了关于家庭有没有问题的材料。当天下午，他主动提出：从明天起，开始进行反省。

（三）反省、检查

从 1954 年 3 月 20 日到 4 月 30 日这段日子，高岗的生活平稳有序，每天看书学习、反省检查，与赵家梁交谈，也玩牌下棋，调剂生活。

1954 年 3 月 24 日及随后的几天，高岗心神不定，显得沉闷，下棋、打牌也不那么专心，晚上都在凌晨一、二点钟以后上床休息。他自己说：心里很沉痛。

1954 年 3 月 25 日中午，高岗来到赵家梁卧室，无奈地说："北京时期的错误和犯错误的思想动机，我自己写了七八条，这是我的真心话。如果自己替自己做结论的话，应该开除党籍。"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说："中央对我是仁至义尽了，我听从总理的指示，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一个党员。今后，党籍如果没有了，给我任何艰苦的工作都可以。党可以长期考察了解我今后的行动表现。如果党还要对我长期管教，我坚决服从"；"我只要求做个公民，看看社会主义建设，就知足啦！"这天，他还提出换房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时，满眼泪水，十分悲伤。

尽管高岗的态度比较认真，但对北京时期的错误性质及其危害性的认识，跟中央的结论意见有相当距离。在好几天的交谈中，都是摇头叹气，一再表示没有搞"军党论"，没有反对周总理。在整个反省过程中，根本没有说到他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位"及有"野心"的问题。直到 1954 年 4 月 2 日，仍无多大进展。

赵家梁建议：你是不是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再谈。不然顶牛了，检讨不下去，这样不行。

这个建议引起高岗的误解，以为赵不愿帮助他了，以后好几天不找赵交谈。

当时，高岗以为赵家梁很快就要离开，便征求赵对他的意见。赵坦诚地说了对他的看法，高认真倾听，频频点头。他虽未忘记赵是管教他的组长，不无戒心，但似乎更多的是把赵当作秘书、朋友。

1954年4月2日晚上，习仲勋、贾拓夫一起来跟高岗谈话，说到：

你要有接受长期考验的思想准备；

搬家的问题，要你自己给中央写信提出；

李力群可以考虑安排工作。

从此以后，除了习仲勋以外，再没有什么人来看望高岗。习仲勋是受中央委托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的，有时来询问一些历史情况。

这段时间，高岗已能够比较冷静的看待刘少奇的报告和周总理的总结。1954年4月3日，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请周转交给毛泽东【注5 戴茂林、赵晓光：《高岗》，《中共党史人物传》8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06页。】（此信未经赵家梁之手，他后来才知道），表示“同意周总理总结的精神”，要“从历史根源、思想根源进行深刻的彻底的反省”，并“向党和毛主席保证：过去犯过的可耻的叛党自杀行为不再犯。”

习仲勋来，有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向他透露一些外面的消息，如；

东北也在召开高干会了，某某回去参加揭发你的问题；

罗瑞卿、周桓等人在座谈会上很活跃；

有人提出要开军事法庭审判你；

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他们都过不了关，说他们与你一起反党，是个反党集团；

某某承认自觉反刘、反党；

已经成立了你的专案组，邓小平是组长，小平说你交代问题像挤牛奶……

这些，都给他的思想感情带来极大的冲击，他越来越感到迷惑，也感到歉疚：我能过得了这一关吗？就算我真的万恶不赦，为什么要把东北局的同志扯进来呢？

一天，他对管教人员说：我犯错误，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该牵连东北局的同志，他们都是为党工作，怎么可以说是我的”反党集团“呢？特别是明远和马洪同志，在东北局做了不少工作，很多政策是他们提出意见，由我出面。抗美援朝的后勤工作主要是明远抓的，他出主意，想办法，再由我出面提出来，他是有功的呀。明远不是我这个山头的人，从来不在我面前谈论少奇。现在他们受我的牵连，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他向管教提出：可不可以见见明远、马洪、郭峰？

李树槐说：不可能！现在你还要求见他们？

赵家梁也说：这不可能，人家不会来，中央也不同意。再说，你见他们，反而起不好的作用。

高岗很不服气地说：难道我还和他们搞串联吗？只不过是想当面向他们道歉……

后来，李树槐问李力群：高岗为什么要见明远、马洪和郭峰？是不是有话要对他们讲？

李力群说:不知道。你可以去问他本人，你也是陕北人嘛。

李树槐一陕北瓦窑堡人，原是朱德的卫士长，中南海的警卫处处长。临来高家之前，朱德嘱咐他好好照顾高岗。在高家，他偶尔乘楼上没人时上去看看。到了1954年7月，他就调走了，临走时他再三要李力群好好看着高岗，要谨慎，有些话不要随便说。

高岗的卫士长魏宝玉，在出事后不久也调走了。一次高岗问李力群：可不可以见见魏宝玉？还要求见习仲勋，都被拒绝了。

还有几件事可能影响他的情绪：一是李力群心情沉郁，时常对高岗发脾气；二是1954年4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高革命警惕》，高岗看后，思想负担很重。

1954年4月7日一早，高岗郑重提出：要求赵家梁继续帮助他反省检查；恢复每天交谈；并表示保证服从管教。赵家梁诚恳答应了，希望他好好想问题，不要胡思乱想。

晚上，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对高岗说：饶漱石已经彻底交代了，你也该快点交代吧，不能老是玩儿。高岗听了很不高兴，拂身而起，很有气地说：“你离开我好了！”

1954 年 4 月 8 日，高岗又开始反省他对刘少奇的问题，态度比较真诚、沉痛。他说，要说有“野心”的话，不是假的，就是想把刘少奇拉下来，不赞成他当毛主席的接班人。这个“野心”，何时才有的？是在财经会议前后，以前还没有。

这天午饭前，高岗再次要求赵家梁每天跟他交谈，帮他记录、整理并表示不再玩得太晚。当天晚上，果然早早上床休息。可是十天以后，又很晚才睡。他辩白说“上床早了睡不着，反而难受。”

1954 年 4 月 15 日、16 日两天，高岗着手起草《我的反省》。17 日到 19 日，一面看稿，一面修改补充。20 日起，一连好几天，高岗一面修改核定，一面誊抄，一天大约抄写几十页，五六千字，这对高岗来说，相当繁重，恐怕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一口气抄写过怎么多字。

这段时间，他好几次想找习仲勋、贾拓夫来，也曾问过安志文，马洪是否还在计委，能不能来。他很想知道他们对他的检讨有什么意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谁都没有来。高岗心里很不是滋味，说：既然他们都不来，我也不给他们看我的反省稿了。当天，他只请机要秘书董文彬给他提了意见。

1954 年 4 月 29 日上午，高岗还是叫人把反省稿给习仲勋送去 。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请赵家梁转告他：“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非常激动。经过一夜的反复斟酌，1954 年 4 月 30 日一早，终于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了：“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这句话包含了多少委屈与无奈！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一开始就“卡壳”。但经过几个月的抗争，最后还是不得不写下这句违心的话。他又特意用“实质上”、“企图”这样一些虚拟词，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但是，又有谁去注意，去认真推敲其真实的含义呢？

这天上午，高岗这说了句：“那就只好这样吧！”就让赵家梁把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送交中央。

（四）在期待中煎熬

从 1954 年 5 月 1 日到 6 月 24 日，高岗进入了漫长的等待处理阶段。这 50 来天，从表面上看，高岗心情比较平静，看书、学习、打牌、下棋，每天傍晚下楼跟警卫战士一起打篮球，生活比较有规律。

1954 年 5 月 6 日，他对赵家梁说，“我准备接受长期考验，现在你应该相信我不会再自杀了。”“现在，我没有事了，你们可以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唉！我把你们拖累了，很过意不去！你放心，不会出事了。”

但他内心真的如表面看到的那样平静吗？许多迹象表明并非如此，他不时流露出内心的矛盾与不安。未来究竟将会怎样？他心中没底。生活待遇肯定是要变的。1954 年 5 月的上半月里，他不止一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等着中央处理，不会错上加错了。”还说：“伙食太好了，要节约些；汽车用不上了，交上去吧；这房子太大了，换个小点的吧；秘书和警卫当然也不需要了，大家可以放心地出去工作。”

这些，他都不在乎。想当初，他高岗又什么？穷光蛋一个。今后大不了一切从头做起。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中央将会如何处置他？反省稿交上去以后，他以为中央会很快处理他的问题，至少会派人来和他谈谈话。后来他感到事情并不像他估计的那样简单，内心便又起了疑虑：还能保留党籍吗？还能叫我为党工作吗？那将是什么工作呢？他苦苦猜想，却怎么也猜不出结果。

1954 年 5 月下旬到 6 月上旬，高岗经常到赵家梁房间去，甚至一天去好几次。他发现这段时间赵家梁经常不在，便起了疑心，以为赵家梁不愿意再在这儿工作了，很快就要走了。于是私下对李力群说：“赵秘书变了，不亲近了，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在。”

李力群只得安慰他：“赵秘书不是那种人，也许他有别的事去了，你别瞎猜乱想。”

一天晚上，高岗找赵家梁下围棋，正巧赵又不在。于是他要卫士长白俊杰学围棋，以取

代赵。为这件事，他有好几天都唉声叹气。其实，这段时间，赵家梁到计委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或是去什坊院宿舍查看为高岗选的新住处，所以有几次高岗找不到他。后来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叫赵家梁不必参加计委的学习，这场误会才过去。

就在高岗一个人沉浸在这种永无尽头的苦思苦想中时，想不到有一天，李力群忽然对他说："你现在没有什么事了，我也该回机关去工作啦。"

他马上想到：连小李也不愿跟我一起学习了，是不是要弃我而去？他一下子激动得落泪，急切地说："早就料到有这一招！希望你以后每礼拜回来看看孩子。"

他心中仍惦记着过去一起工作的同志，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会不会受到牵连？他多么想和他们见见面，好好谈谈啊！于是，他又一次提出想见见贾拓夫和安志文等人。

赵家梁说："这件事，上次你就提出过，他们没有来。这次再提，会让他们为难的，不过，我可以把你的要求反映上去。"

过了两天，他又说想去西郊公园。

"去干什么？"

"随便走走，出去散散心。"

赵家梁耐心地劝道："公园里人那么多，难免碰见熟人，你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我看还是不去的好，你看呢？不然，我跟上面说说？"

"算了，算了，不去了!"他一脸的无奈。

其实，他提着些要求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看看对他的管教有没有变化。

这段时间，还有几件事明显影响高岗情绪。

一是李力群怀孕了，妊娠反应很强。这个孩子来得真不是时候啊。

1954 年 6 月 17 日中午，高岗到赵家梁房间，对赵说："有一件私事，万分恳求你帮忙解决一下，小李怀孕了，天天吐，天天哭，白天黑夜闹得不安宁，很苦恼，我非常希望能让她去动手术，好让我也安心一点。我已经有那么一大堆孩子，又有孙子，将来经济负担也成问题。她动手术期间，你们要是不放心，可以叫小董或老白来跟我住在一起。我反正什么坏念头、坏思想也不会有的。我好好念书、学习，增加一点马列主义，将来如果党不能宽恕我，要处我死刑，我也接受。这是打比方说的。"

为了李力群要求流产的事，高岗又两三天独自踱步至半夜以后。

他们的要求报告杨尚昆后，杨尚昆找李力群谈话，问高岗对这件事由什么意见？

李力群说：他说他的问题解决不了，不想要这孩子。

杨说：既然这样，就不是我们强迫你们哟。又说，你好好劝劝他，毛主席本想找他谈话，但他一自杀，毛主席就不好见他了。叫他以后别再要求见毛主席了。他就是有野心嘛，承认算了。对他也要历史的看。

1954 年 6 月 23 日，李力群去住医院，临走前，一再叮嘱工作人员，要注意高的安全，不要给他安眠药。高岗对她说："你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李树槐听说这事，叫他女儿到医院看望李力群，说他很惦记她，叫她不要做手术。

谁都没有想到，医生认为李力群的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做流产手术有危险，不同意手术，结果孩子保留下来。这无疑增加了高岗的心理负担。好在孩子们陆续回来过暑假，此后半个月，高岗时常跟孩子们一起玩，似乎比较平静。

李力群住院期间，高岗每晚服用的安眠药由值班人员负责管理，并在值班人员的监督下吞服。他很有情绪，多次说：你们给我的药是假的，我不要！有一次甚至当着值班人员的面把药扔在痰盂里。管教人员批评他，他赶忙承认错误："对不起，是我不对，今后一定注意!"

1954 年 7 月上旬，高岗左臂麻木酸疼，医生说是末梢神经炎，打了几天针，就不要医生

来了。

第二件事，也是令高岗难过的，1954 年 6 月 22 日，孩子们回来说：同学们说你是坏人，有的还欺负我们。

他听后，伤心地落泪了，天啊!怎么会这样？孩子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们？我是坏人？那天，他的情绪极坏，终日唉声叹气，一反常态，没有打篮球，也没有玩牌。

第三件，服务员小张说，反映西北革命斗争的连环画小人书，因为里面有高岗的事迹，现在王府井新华书店已经停止出售了。高岗听说后，对值班卫士说："我犯了错误，连西北闹革命的小人书页不让卖了，唉!"

本来，那段时间，他对未来还抱有一线希望，热切盼望中央派人来和他谈话，尽快对他作出处理，重新安排工作。他对这种无休止、无人理睬的管教生活已厌倦了。现在，这一连串的事情，使他稍稍平稳的情绪又起波澜，困惑、不安与悲观情绪日益加重，还有什么前途呀？什么学习、提高，去它的吧。他开始把大量时间用来跟工作人员玩，跟孩子们玩，以此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

（五）紧张绝望

快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1954 年 6 月 28 日起，高岗比较注意听广播、看报纸。1954 年 7 月 1 日以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陆续报导各地选出的人民代表名单，高岗很注意地侧耳倾听其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结果令他失望。他表面上跟往常一样，实际上情绪越来越坏，内心越来越不安。他把人民代表名单与对他如何处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既然名单上没有他，那就是说，至少他将被从现实生活中抹去，更不用说是排除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外了!

"不知别的人怎么样了？"他又想起那些同他比较亲密的人，为他们担心。

一天，他忽然问赵家梁：安志文、马洪是不是还在计委？高老虎是不是还在东北飞机场工作？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对骄傲情绪》。高岗看后，好几天长吁短叹，说："这篇社论是说我的。"

赵家梁问："你有没有骄傲情绪嘛？"

"有，总觉得人家不过如此。一听到人家表扬称赞说我是'西北人民的救星'，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就沾沾自喜。其实，我不懂马列。要是没有刘志丹和毛主席领路，要是没有那么多中央派来的干部帮助，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搞。可是，后来把功劳都记在我的头上，自己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停了一会儿，继续说："现在人家说我居功骄傲种下祸根，产生野心。我承认，我是骄傲，但还没有到产生野心的程度!"

他变得反复无常，每天玩得很晚，管教人员曾劝他不要玩得太晚，以免影响休息。

"好吧，好吧!"他嘴里答应着，行动上却照旧。每晚打牌，不到半夜不收场，有时甚至玩到凌晨三、四点钟。别人提醒他早点睡，他唠叨：睡得太早，反而睡不着。

他急切地盼望李力群早点回来，打发儿子去医院对她说："爸爸情绪不好，叫你快点出院，他有话要说。"

李力群回家的当晚，高岗就对她说："我可能活不了啦。你走后，没有任何人来看我，习仲勋逼我违心写了……送上去，也没有回音。看样子要对我做最后处理了。我没有反党，我对毛主席忠心耿耿……"

1954 年 7 月 14 日，高岗说，成天玩儿没意思，还是看书好。可是晚上照样跟工作人员搓麻将，一直到凌晨四点才休息。

1954 年 7 月 19 日又说：以后周末玩儿，平时听广播什么的。可是到晚上，他根本没有心思听广播，听听就睡着了。快到半夜才吃晚饭，饭后又玩扑克，至凌晨一点多。

他也曾要求找些参考资料来看，要学习苏联经济建设和编制五年计划的经验。但过后又

说："算了，算了，不要了!"

按规定，不允许他到楼上的阳台散步，但他却有两次不听值班人员的劝阻，硬是在阳台上走了两个来回。值班人员怕出意外，紧随其后。他气狠狠地说："你老跟着我干什么!"为此，管教人员严肃批评他，他马上表示接受，虚心检讨，也作了一些解释。

由于长时间的焦虑不安和寝食失调，高岗的肠胃功能有些紊乱，到了 1954 年 8 月 10 号左右，出现腹泻和胃口欠佳等症状。过去，他一旦有病，都能及时接受治疗，但这次，尽管一再建议给他治疗，都被他拒绝。

时间拖得越久，高岗就越焦虑不安。他叹道："唉！谁也不来了，谁也不出来说话了。"他究竟盼望谁出来为他说话？到了这步田地，又有谁敢为他说话，谁能为他说话呢？

他觉得自己犹如虎落平川，龙困沙滩，纵有一万个不甘心，却是万般的无可奈何！人活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

他暗暗地做着自杀的最后准备。

1954 年 8 月 15 日深夜，他把李力群从梦中叫醒，趴在她耳边说："我活不了啦，睡不着，太痛苦了。怎么处理都行，随便吧……"

管教人员时刻注意着高岗的每一个变化，这些不正常现象，引起大家不安和警觉。他们多次派人向中央当面汇报，或些书面紧急报告，认为他的情况很不正常，要求中央尽快派人来和高岗谈话，早作妥善安排，以免发生意外。同时，也要求尽快搬家，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中央来人跟高岗谈话后就搬。但遗憾的是，左催右催，左盼右盼，就是没有片言只字的答复，也没有人来和他谈话。

1954 年 7 月下旬和 8 月初，管教组曾两次全面检查高岗的卧室、起居室、办公室等各个房间及沙发、床铺、被褥、桌椅、地毯等物品，以消除可能潜藏的危险因素，防止高岗再次自杀。

第二章　反省检查

打开一叠被尘封了近 50 年的已经有些发黄的纸片——当年高岗反省的原始谈话记录，笔者的心情激动起来。这是一些规格、质地不一的纸片，既有信笺纸、稿纸，也有坐标纸、笔记本纸；有横格的，有竖格的；有钢笔写的，也有铅笔写的；字迹有大有小，记录稿边缘的空白处还有一些胡乱涂画的外文字、图画之类，也有一些简单的不连贯的词语。这是高岗谈话间断时，赵家梁为打发等待时间而胡乱涂画的。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废纸。唯其如此，它们才得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过劫难，保存下来。这些就是当年高岗写《我的反省》所依据的原始材料。现在，这些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的纸片，成为我们了解高岗其人的珍贵资料。

高岗的情绪平静以后，对自己的学习、检查和反省提出五个步骤：一提（提醒）、二记（记忆、帮助记录）、三检（查）、四结（写出反省稿）、五交（反省稿子送交中央，听候党的处理）。他还要求看座谈会的发言记录；要求赵家梁帮他整理反省材料，进行文字加工。这两条，周总理都同意了，但他强调，反省内容必须是高岗自己的，最后送交中央的反省稿，也必须由高岗亲自核定亲自抄写，不能由别人代笔。

开始的一段时间，高岗每天上午学文件，下午两点半开始谈两个多小时。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大纲式地谈他的主要经历和主要问题，想到什么就谈什么。赵家梁在一旁记录，然后整理抄清，交给高岗作进一步检讨反省时参考。

①西北

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消极。苏武牧羊。挑大粪。当和尚。

狭隘、仇恨。

腐化。

审干。

无人批评，一批就跳。

说好的，没揭批不好的。

骄傲。了不起，吹装。

贪功。夸大自己的作用。

财经会议

组织会议

二线一线。

②东北。

自己要求去的。

宗派。看彭。看林。

独立王国。

听好；不听不好的。

腐化。

外国关系。

把成绩放在自己账上。

1954 年 3 月 19 日以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他每天上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仍是按西北、东北、北京三个时期先提出题目、大纲，以后逐步展开主要问题和具体错误事实。他讲的断断续续，有时一面讲一面流泪，有时长吁短叹、陷入沉思。赵家梁偶然插几句话或提几个问题。

1954 年 4 月中旬着手写《我的反省》。他逐字逐名斟酌推敲、反复修改，最后定稿，亲自抄写完成《我的反省》，4 月 30 日送交中央。

高岗谈西北时期情况时比较轻松，有时还很兴奋。他既肯定工作成绩，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谈到 1942 年西北高干座谈会时，他不无愧疚地说："那时对郭洪涛的批判很厉害，他都能接受；现在自己犯了错误，人家一批旧受不了啦。"

说到东北解放前的那一段，高岗比较平静，重点讲了与彭真等人的争论。

东北解放后和北京时期，重点检查与刘少奇的关系。他着重检查了东北建设时期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对北京时期所犯的错误，他归纳为：主要是反对刘少奇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散布流言蜚语，搞非法组织活动；吹嘘、抬高自己；对毛主席不说实话，欺骗毛主席；对干部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有宗派思想和宗派情绪等等。由于周恩来在总结发言中又提到"拨弄是非、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的问题，他也着重谈了与洋人交往的情况。

他反复谈这几个问题，开始谈的还比较平静，后来越谈越激动，有时情绪低沉，心神不定，最后又逐渐平静下来。

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问题也是他检查的重点之一。

下面我们着重介绍高岗对东北建设时期和北京时期主要错误的反省检查。关于他对家庭、经历和在西北的情况，以及东北解放前与彭真等人争论情况的回顾与反省，请读者参阅本书的附录〈历史回顾〉。

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 1947 年到 1952 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 1947 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1946 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

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 1947 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 20 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

二、反刘的主要言行

（一）接班人问题

“关于刘少奇的问题，比如主席对少奇的不满和担心；查看敌伪档案，了解少奇是否有自首变节行为，以及关于大权旁落的问题等等，我都跟陈云讲了。1953 年上半年，我们一起议论过好几次，一致认为：毛主席确实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把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不仅是毛主席的意愿，也是大多数人的心愿，而且最好在‘八大’以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议论过，这件事由谁出来挑头比较合适？怎么搞法？谁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陈云认为这件事由我挑头最合适；要我先搞起来，搞确实后再告诉毛主席。我都同意了。我们还说到林彪是毛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

“我也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同一些领导干部交换过意见，确实得到不少人的支持。”我说过“少奇‘左’右摇摆，很不稳。要是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验的”；“现在主席健在还好，他们不敢怎么样。要是主席不在了，那还不乱了天下！”

“关于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我向人散播说，主席讲，他只当党的主席，让少奇当政府主席、议会议长或当什维尔尼克。‘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不是主席说的，是我伪造的。现在有人说我假借毛主席的旗帜反对刘少奇，我承认这是事实。但说我‘伪装拥护毛主席’却不是事实，是别人强加给我的。我是真心拥护毛主席、效忠于毛主席的。”

“毛主席提出，他不在北京期间，是由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还是由几个常委轮流主持工作？我跟陈云、邓小平说过轮流好，不支持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杭州时，也曾跟林彪、陈正人说过这个意见。”

“其实，‘反刘’本来就是毛主席的意图，我没有领会错。我错就错在不该把主席的意图过早地宣扬出去，而且不该听信陈云的话。他叫我先干起来，等搞出名堂以后再告诉毛主席。结果现在说我‘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我怎么说得清呀！”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确实只当党的主席，也确实让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历史也证明，毛泽东确实对刘少奇不满意，并且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少奇打倒、置于死地。事实证明高岗没有造谣；他的错误在于不该随便扩散中央内部的情况。

（二）散播流言蜚语

“财经会议期间，我看到不少人对少奇和彭真、薄一波等人不满，刘少奇一手提拔的饶漱石也不例外。那时，各大区的中央局书记、副书记几次来谈工业经济建设及其他工作问题，很少到少奇同志那里去。他们说：‘你们东北局搞得好，有经验，怎么搞法？’军队的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少奇不满，而对我不错。我非常得意，向他们散播刘少奇的不少坏话，造成‘毛主席已不信任少奇’的不良影响。当时流传所谓我家里另有一个‘司令部’，并且‘大区支持第二司令部。’”

“我散播的流言蜚语，如：

说少奇进城以后没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毛主席对少奇不满意；

少奇过去搞人性论，受到毛主席批判；

在方针政策方面，说‘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少奇提出来的，是错误的。毛主席在柳树店休养时说了，校场口事件表明，根本没有‘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央工委在平山土地工作会议的决定有‘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对山西农村互助合作社的批示是右倾表现；城市资产阶级政策，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是‘右’的观点；我还让人转抄少奇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以此攻击刘少奇；说他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套；职工运动的错误不完全是李立三的，而与少奇有关；评议整党，少奇说党是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说城市共产党员可以开工厂剥削，农村党员可雇工，富农可以入党等问题，都是错误的，东北顶了他；那次去苏联时，老头子（指斯大林）对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还讲过抗美援朝决策时，少奇同志也不那么坚决等等。”

“在组织问题上，我说过少奇有宗派、有摊摊，支持华北的干部；还议论过，中央组织部尽是华北的人，有的人能力很弱，军队干部对这些人不满意；各大区应调一些水平高能力强的人加强组织部”；说“少奇打算调李雪峰去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说李是否顺手一点，陈正人不顺手”；还散播“少奇说‘陈正人身体也很差’，打算让李富春做建委主任”；和陶铸说，

“少奇对广西的工作不那么明确地支持。财经会议时，陶铸听说要调他去政法委员会，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还不是调虎离山。这些都有挑拨的意思。”

“我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看，好像少奇在重要政策上是不稳的。这是当时的认识。我把这些当成自己所需要的，抓辫子，并加以夸大，在背后议论散播，说刘少奇不稳，不能掌舵”；“我在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错误，实际上是指桑骂槐。”

“这些问题，跟大区的个别同志谈过，和中央的几个同志，陈云、彭德怀、李富春、林彪、黄克诚等都谈过，和东北的张秀山、张明远等人也谈过。”

“现在检查起来，对这些问题应该正确对待：

‘人性论’是一时的认识，毛主席指出来以后，就根本不存在了。

‘和平民主新阶段’，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形势的估计，随时十分正确是极难的。关键问题是在实际工作部署上，还是在准备战争，事实上并没有影响。

平山土地会议，是有‘左’的错误，但中央、少奇，特别是毛主席抓住这个问题，及时予以纠正。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农村互助合作，中央已作了决定，这个问题也已解决了。

党的性质和雇工问题也是解决了的。

对资本家的问题，当时是城市需要稳定，怕乱，搞乱了损失更大。”

“对这些问题，我本来应该正确地处理，向少奇同志表明自己的态度，或向主席反映。但自己却是抓他的辫子，想搞确实一些再向主席讲。”

“有的问题，我和主席谈过，他两次要我当面和少奇同志谈。主席说：‘少奇是老实人，你和少奇同志谈；别人谈，要制止。’要我当面谈，我不谈。以后谈的时候，提得不明确，谈得不清，谈得不够。”

“事实上，不论在几大运动，还是在党的建设发展等方面，少奇同志都是正确的，有贡献的。反过来，我的这些看法都是中央提出来的，不是自己看出来的。自己装懂、吹嘘，拿中央正确的东西打击少奇同志。应该和少奇谈，但没谈，已是错误；还要有意地打击少奇同志，我这人是坏极了。对少奇，采取这样的态度，根本不像个人，不像个共产党员。”

（三）关于党史和“八大”代表

高岗曾对人讲，明年（1954 年）抓四项工作：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为召开 “八大”作准备；四是制订宪法、召开人大。

关于编写党史，他说：“编写党史，我认为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割成根据地历史和白区历史两大块，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是很小很小的部分，不能和苏区相提并论”；“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扯皮促退的一面”；“要以苏区的历史为主来编写，要趁主席健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七大’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

关于选“八大”代表，他说：

“‘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否则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要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主要是要从工作成绩来考核，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他还说：“在干部问题上，少奇肯定要乘‘八大’之机安排他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将来选‘八大’代表时，我就不选李雪峰、薄一波。”

“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散布，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这些，我跟陈云、林彪、陈正人、

陶铸、黄克诚、王鹤寿等人议论过。现在想想，人家讲，你为什么把它拣起来？”

（四）“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总结发言的第三条说到高岗“利用某同志提出的政治局及中央各部名单，污蔑中央领导。”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谓“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是 1953 年春天由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提出的。

高岗反省时说：“总理说的不符合事实。那份名单不是我伪造的，而是毛主席派他的机要秘书直接送来给我看的，并等我当面看了以后就拿走了。这可以查证。”

“在这之前，大约是 2 月底吧，当时中央酝酿体制、人事问题，毛主席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碰头、学习，议一议。少奇考虑中央分工，提出一个书记处和政府党委名单，在少数人中征求意见。其中彭真为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管文委，邓子恢管农委、安子文管组织部、刘澜涛管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自己有宗派观点，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是少奇安插人，所以没有重视。紧接着，主席又送来那份‘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央各部委和群众团体分工的名单，政治局有薄一波、饶漱石、刘澜涛。虽然安子文说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我却主观地认为安子文怎么敢？这是少奇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和各部委的人事，授意安子文搞的。这是我把党内干部看成派别性的，借以攻击少奇同志。这个政治局名单，我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人谈过。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还问过邓子恢、朱总司令知道不知道这个名单。”

“问题是，我的这些想法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而没有讲，却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这是天大的错误”；“后来又不听毛主席的招呼，私下扩散了这个名单，散播自己的错误想法；再后来，当毛主席追查是谁泄露此事的？自己又不敢承认，欺骗了毛主席。”

三、“反对周恩来”

高岗看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稿后说：“说我反对周总理，这不是事实。我承认，我曾议论过总理在历史上跟着王明犯错误，也说过他检讨过分散主义错误，说他事务主义。我这样说他当然不应该，但决不是反对他。”

他一再表示，他对总理是尊重的，绝没有反对的意思。他甚至说：“即使我真的是反革命分子，真的是野心家、阴谋家，我也决不会蠢到这步田地，同时用两个拳头打两个对手，在反对少奇的同时，再来反对总理，绝不会！”

“有人说我不赞成恩来当总理，想让林彪当总理，甚至说我自己要当总理，绝没有这种事。”

“我记得只有一次议论过谁当总理的问题。那是在去年春天，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如果恩来不当总理，你来组阁怎么样？我说我不行。主席又问你看谁行？我说恐怕林彪比我行。此外，我没有跟任何人议论过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和毛主席议论总理。”

“如果我真的反对周总理，真的想取而代之，就绝不会拒绝主席的意见。我不明白，这种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传出去，并且加以颠倒歪曲，说我‘反对周总理’，‘自己想当总理’呢？”

周恩来听了赵家梁汇报后，愣了一分钟左右才说：“这是毛主席说的，毛主席说高岗反周。”

赵家梁向高岗转达总理的话后，他深深长叹，说：“天晓得！”

1954 年 2 月 17 日上午，高岗在开枪自杀之前，没有给刘少奇留下一字一句，可见他对刘少奇之绝情。然而他却给周恩来写了托孤的遗书。信虽短，却很有感情。高岗在中央，在地方，都不乏亲朋好友或亲密战友。但在生死之际，他却把身后之事托付给周恩来而不托付给别人，这说明他对周恩来特别信赖。

其实，对周恩来不满意的不是高岗，而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我们且不说在历史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什么恩怨，仅在 1952 年下半年到 1953 年春天之间，毛泽东就曾多次批评周恩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和削弱周恩来的权力（我们将在后面叙述）。到了“文化大革命”

时期，责令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

四、对干部有宗派情绪

高岗承认自己在对待干部问题上存在宗派情绪。他说：“与自己意见不合的、有成见的，如对彭真等人，理都不理，有报复心。”

“对薄一波有宗派情绪。来北京后看到一些现象，内心不服，主要在四件事上内心不服，狭隘个人主义。”“一是东北一党员的信。【注 1 此信主要是向党中央揭发东北个别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问题，未具体点名，只是泛泛说有干部腐化。高岗在离开东北前，在东北局传阅过这封信。】自己认为薄一波不应该批转这封信，他这是借‘三反’之名来敲我一下。”【注 2 当时薄一波是中央‘三反’领导小组的负责人，‘东北一党员的信’由‘三反’领导小组转给东北局。】“二是 1952 年 8 月间，一波在颐年堂批评东北财政上不统一，要林枫回来检讨纠正。”“三是鞍山检查组。 1952 年‘三反’期间，鞍钢一个高炉发生爆炸事故，中财委、重工部、监察部、组织部等派联合工作组来调查并检查鞍钢的工作和投资使用情况。工作组尚未出发，王鹤寿即从北京打来电话，问怎么办。我说派工作组是薄一波有意与东北为难，打击鞍钢的目的是打击我高岗和东北工业部，还联系到这是薄一波对过去处理彭真问题不服气，企图报复。”

“我觉得一波认为东北工业搞得好，鞍山是最主要的。现在出了事故，就说我们把鞍钢搞得一塌糊途，派检查组来调查。这是一波借机整我，我就不配合检查组的工作。我的这种态度也影响一部分同志，使他们也对检查组产生不满情绪。”

“后来毛主席批评一波，说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上看人家游泳，指手画脚容易，要真正懂得游泳，还是要亲自下水学游泳才行（大意）。我更觉得自己正确，还向东北局的同志传达了主席的话。”

“四是去年 3 月底，中财委召开部长会议，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一波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这方面的具体事实不少。如 1950 年，对王稼祥说，总理很忙，你回来抓外交部吧。对黄克诚说，中央要你当政治局委员，我赞成。中央还未决定林彪任计委副主席之前，我就对陈正人说了。”

“一次中央会上谈到，‘七大’以后‘鼓出来’的干部要补选中央委员。后来我把会上提到的人告诉了其本人和与自己接近的人，有讨好的意思。这是组织纪律不允许的。同时，对一波提出的华北的几个同志，我说是否恰当，值得考虑。这些，我对陶铸、黄克诚、王鹤寿、张明远、陈正人等人讲过。这是有宗派观点，错误的。”

五、吹、装、偷

周恩来在中央座谈会的总结中说过，高岗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吹嘘自己。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坦言：“就是吹牛、吹嘘，不懂装懂，剽窃别人的思想、言论、文章，当成自己的”；“工作上喜欢报喜不报忧，听到说你先进就舒服，说你有毛病就不高兴。”

“在延安时，自己本来政治上是很不成熟、不高明的，但是装得自己很高明。粉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三次反共高潮，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等成就，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取得的。许多事情自己看得不是那么正确，只是跟着党中央、毛主席走。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精神，有时也还没有完全领会。但自己总是装得一切都懂，表现自己还不错。”

“在东北，与彭真的争论很多，后来证明我对、他错。但这不是我一个人英明正确，而是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等许多人的一致意见。”

“到北京后，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就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一些，调一些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强的人到计委来，表现出自己管得不错；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

上不落于人后，表现自己，突出个人。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计委的委员和各局局长。”

“财经会议前后，我散播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乘主席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

“对少奇，也不是我比别人高明，能发现他的问题，其实也是拣了别人说的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去散播。”

“1949 年访问苏联回来，我说：斯大林对刘少奇的报告不那么满意；说斯大林对我很亲热。这些都是吹嘘。这样的事例还不少。”

六、与洋人的关系

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有人揭发高岗里通外国，挑拨离间中苏关系，引起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的总结发言也提到这个问题。

近几年国内外的一些书刊都曾谈到高岗向斯大林提供关于中国共产党内矛盾和反苏情况的情报，说中共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甚至说高岗要让苏军进驻青岛、山东半岛；要把东北划给苏联，成为其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等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高岗反省时，着重谈了他与苏联人交往的情况：“在中苏关系方面，是挑拨？还是向洋人吹了不该吹的牛？我认为，顶多是在个别问题上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些事未请示中央，擅自做主，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吹了些不该吹的牛，但绝没有挑拨离间、里通外国的问题。”

他着重谈了以下情况：

（一）在东北，三次去苏联

高岗回忆说：“我第一次去苏联是 1947 年，经中央批准去伯力割盲肠，林彪写的介绍信，与马林诺夫斯基联系的。去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要点枪支子弹。那时，说过刘伯承、邓小平过黄河有信心；说毛主席是中国的斯大林。问谁是中国的日丹诺夫？我说是刘少奇。”

“后来苏联经常通过领事馆传来以‘史野’名义写的文章，或送一些关于亚洲问题的宣传材料，要中国的报纸发表，我们都转给中央了。”

“第二次是 1949 年夏，同少奇一起去的。我绝没有所谓‘抢在刘少奇前面说话，要求苏联驻军青岛和山东半岛’这类事情。当时，我在与苏联人闲聊时说：‘你们对我们旅大和东北解放帮助很大，替我们守住了大门；有必要的时候，到青岛、威海（当时青岛、威海是国民党占领的城市）。’这些话当然不恰当，但不是在正式场合邀请苏军进驻青岛，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我当时还对苏联人说过：你们的内务部在我们这里搞了 40 几部电台，都由地主、国民党的人掌握。关于这件事，在北满分局时，陈云、林彪和我就向当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过意见，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我说这话的确是带不满和批评的意思，但我说的是事实，既不造谣，也没有挑拨的意思。”

“至于就我要把东北割给苏联，变成苏联的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那更是没有的事。当年我对苏军从东北拆运机器设备和铁轨的行为很不满意。访苏期间，我很想向斯大林说说自己的意见，被少奇制止了。试想，连他们拆走我们的机器设备 【注 3 苏联红军撤离东北时，把许多机器设备、铁路等拆运回去，引起我国人民和一些党员干部的不满。】我都不愿意，怎么会主动把东北这么一大片领土白白送给他们呢？我再怎么没觉悟，也懂得这是卖国行为呀！”【 注 4 关于“高岗提出把东北划归苏联作为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 的问题，当时随刘少奇访苏的翻译师哲是这样说的：高岗这个人爱拉拉扯扯，他私下和科瓦廖夫讲了什么我不清楚。但他作为中国人，中共政治局委员，从未当众，也绝不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高岗很不满意苏联搬走东北的机器，很想向斯大林透露一下，但刘少奇不同意。会谈都是刘少奇一个人说，不给高岗等人发言的机会。高岗连我们的机器被苏军搬走都

不满意，他怎么会提出将东北变成苏联的第 17 个加盟共和国。引自李海文：《科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 年创刊号。】

“回国后，我有意抬高自己，贬低少奇，说斯大林赏识我，而不怎么满意少奇的报告，这是事实。我讲这话， 纯粹是吹嘘自己。”

高岗始终否认他跟柯瓦廖夫说过刘少奇的坏话，否认说过“少奇同志组织人打击我”这类的话。他说：“在去苏联的飞机上，少奇谈对资产阶级问题的看法，冈尔斯基翻译，柯瓦廖夫问我怎么看？我说少奇这个观点有毛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谈经济问题时，我说到薄一波的问题；谈职工问题时，说了立三问题。我这样讲，是无原则的。严格地讲，对柯瓦廖夫说这些话是错误的，但这并不是说刘少奇的坏话。”

“还有一次是 1951 年，为朝鲜和谈及苏联援朝战斗机的问题，我和金日成一起去苏联，师哲当翻译。当时，苏方有马林柯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参加。他们传达了斯大林的谈话，认为战争还要坚持两年。他们讲了一大篇，我多半是解释，并讲了一下我们的几大运动。我要求他们援助朝鲜 28 个师，以后争取 40 个，再后来是 60 个师，【注 5 这里指的是要求苏方援助我们的空军装备。】增加了一倍多。我自觉无半句挑拨。如果我要干坏事，机会多得很，但我没有干。”“斯大林的讲话是机密的。回国后，我和聂鸿钧谈了。有一些问题和东北局的委员谈了。这是极大的错误，无组织无纪律。”

（二）“与洋人密谈三天三夜”

高岗说，“这件事刘亚楼最清楚。那是在 1947 年与 1948 年之交，当时我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主持司令部工作；刘亚楼是参谋长，负责与一个叫卡瓦列夫的苏联军事情报员联系。一天，卡瓦列夫来找刘亚楼要有关东北敌我军事力量消长情况对比和部队番号等资料。正好当时刘亚楼不在，就来找我。我叫秘书刘家栋介绍给作战参谋处处长尹达去接谈的。这整个过程中，我与卡瓦列夫根本没有见面，哪来的‘密谈三天三夜’？刘亚楼有些话完全不真实。”

（三）“挑拨离间”和情报问题

“1946 年 1、2 月间，苏联派了一个上校到宾县注 【6 北满分局驻地。】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主席、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是骑在树枝上砍树，自伐其木。我说了毛主席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的指示；讲了退不退出城市的问题。那时感到东北城市很重要，和苏联红军有些不一致的地方。这个我讲了，本来应该请示中央的，没先请示，这是极大的错误。但这不是挑拨离间，也不是给洋人送情报。”

“1946 年到 1947 年，哈尔滨总领事儒洛夫廖夫自齐齐哈尔回来，在哈尔滨林彪家里，说李富春在齐齐哈尔有反苏言行。我和林彪、陈云三个人一齐质问他：这是从哪里来的谣言？并申明李富春是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他跟中央完全一致，对苏联十分友好，根本不会反苏，绝没有反苏言行。儒洛夫廖夫和我们吵了一顿。他还说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了撤机器的事情。林总讲，我们批评了立三，他已承认错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1950 年，毛主席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为了表示对中共中央、对毛主席的完全信任，把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电报和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信一并交给毛主席，说‘这是我们的蠢人干的蠢事。’”

如果柯瓦廖夫的材料真是高岗提供的，毛泽东看了以后，从 1950 年到 1953 年，为什么不但没有因此而批评或处分“里通外国”、“挑拨中苏关系”的高岗，反而对他倍加信任重用？1953 年 6 月，贝利亚事件发生后，毛泽东为什么还会派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去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紧急通报？

其实，据参加座谈会的人讲，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宣读了柯瓦廖夫给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内容是说中国有亲苏派和反苏派等，信中并未说明材料来源。周恩来读完信以后说：柯瓦廖

夫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就是高岗说的嘛。

高岗自己的说法是："1946 年前后，我们发现苏联在东北有 40 几部电台搞情报，其中有些是国民党特务打入苏联内务部，又被派回东北收集情报。那时苏联内务部在我东北各地建立了不少情报组织，其成员绝大部分是地主或倾向于国民党的人员。他们给苏方提供了不少对中共不利的失实的情报，其中就有所谓'中共在东北的大多数中央委员是反苏的'、'对苏联不友好的'之类。苏联内务部和情报部门都曾收到过这些内容完全失实的电报。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当时北满分局领导人——陈云、林彪和我，曾一起正式向苏联领事儒洛夫廖夫提出意见，明确指出他们的情报不真实。"

"1953 年我去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马林柯夫特意对我说：那些挑拨中苏关系的失实情报就是贝利亚干的坏事。当时的翻译就是毛主席的翻译师哲。回国后，我马上就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如果真是我提供的情报，苏共怎么会当着师哲的面'揭穿'我，我又怎么敢向中央汇报，敢把所谓'与高岗有关的材料'送给中央呢？这些情况都有案可查的嘛。"

（四）关于柯瓦廖夫

座谈会上，有人质问高岗向柯瓦廖夫泄露中共党内矛盾的情况，说刘少奇的坏话，说刘少奇打击他，等等。现在一些书刊也大谈此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柯瓦廖夫是 1947 年到东北的，名义上是中苏铁路的苏方代表，实际上是苏联在东北的专家总顾问。1949 年 12 月回国，以后没有回来。

高岗回忆说："当时，东北局由我负责与柯瓦廖夫联系。他曾经跟我谈起：'斯大林把东北的大城市交给蒋介石，不给你们，是要你们把力量组织起来抢天下'"，"他还问过苏联红军占领东北以后，中共干部到东北的情况、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情况，以及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过一些不利于中苏关系的话的情况等。"

"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分歧，我说确曾有过，彭真、林枫的确有错误。但 1946 年 7 月 1 日以后，中央改组了东北局，林彪负责，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柯瓦廖夫又问我：李立三在执行小组说苏军撤机器，外国报纸登了，李立三讲了这些话没有？我说，李立三的确讲过苏军把东北的机器设备拉走的事。林彪、陈云和我都批评他了，他承认了这个错误。其实，当时好多人都对苏军的这种做法，特别对个别苏军士兵强奸妇女的事件很不满意。但苏联出兵东北，总的来说是好事，对东北解放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当时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要顾全大局，正确看待苏军出兵的问题。"

"我这些话是 1948 年冬讲的，当时没有得到中央的指示，后来，1949 年春，我到西柏坡时，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这些情况，林彪和陈云都知道，怎么说我是挑拨离间，给苏联人送情报呢？"

那么，高岗是否让柯瓦廖夫给斯大林带过信呢？高岗的确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但这封信是经过党中央，而不是让柯瓦廖夫带给斯大林的，和传达情报毫无关系。

那是在 1949 年夏初，高岗访问苏联之前，曾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内容是介绍东北战后恢复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希望苏联在设备和技术上给予援助。他当然不会自己写这封信（他不懂俄文），而是由张闻天亲自起草、翻译的。这件事，张秀山、张明远、陈伯村等人都知道，并且，这封信经过东北局讨论通过以后，报送中央审批。不久，高岗与刘少奇一起访苏，东北同苏联达成了 12 个月的易货贸易协定，这封信可能起了积极作用。

"我到北京以后，阿尔希波夫（苏联总顾问）提出关于劳动工资的建议，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财经会议刚结束，他问中央的分工情况，我谈了一波的新税制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的问题。这些事，应该请示中央，由中央统一答复，而自己擅自讲了。"

总之，高岗在与苏联的交往过程中的确有错误，他作了检讨。但这些是否能构成"里通外国"和"挑拨离间"之罪呢？

（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 1954 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 年 5 月（应是 12 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 年 12 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 12 月 17 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 年 12 月 24 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注 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 月 25 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 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 年 6、7 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把总理气走了。还说高岗竟然把舞伴带到楼上去了。这怎么可能！当时李力群、秘书等都在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还要顾全一点自己的形象吧。

高岗确实通过舞会结识了一些女性，并与个别人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与高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并非来自舞会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交往的女同志，真正在舞会上认识的只有一个。再说，当时保密工作很严格，也不允许他在外边随便找女人。

李力群向周总理反映过关于选派年轻女孩子到高岗家里当舞伴的事，总理批评了这种做法。

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也引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感与不满，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高岗检讨时说，生活作风腐败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早在西安时，他看到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去逛妓院，他们认为当时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应该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坏。开始时他很惊讶，后来也曾随他们去过几次。1934 年 1 月，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因奸污妇女而受到师党委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后“在蒙古地工作，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无人监督，几乎每到一处，都有女人相陪，生活确实腐化。”当时他思想一度悲观消极，认为，反正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左”倾路线的人整死，过一天算一天。从那时养成放荡不羁的恶习。到延安以后，他见到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他的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他位高权重以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近几年，一些“作家”打着揭发高岗的幌子，大肆渲染，甚至胡编滥造其生活腐化的“细节”极尽低级下流之能事，以求掩盖高岗事件的政治实质，误导读者。笔者以为，高岗在生活作风方面确实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反映了高岗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一个中共党员相差甚远。但高岗事件的核心实质决不仅仅是生活腐化问题，这只是他诸多错误中的一个方面。而且生活腐化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党的声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重复这样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断送了多少党员干部的前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八、写下违心之词

高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认识，与中央的结论相距甚远。他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夜不是我一个人，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非要叫我承认有野心，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不可，真是冤枉！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一直到1954年4月2日，他在反省中根本没有说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及有野心的问题。

高岗心里明白，不作一个“像样的”检讨是过不去的，总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或许，如果把毛主席这些年来对他讲的有关刘少奇的话，让他办的事，以及陈云等一些中央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说的话统统都说出来，自己就能解脱？……不行！这样不但会伤害毛主席，伤害许多好同志，我自己也未必就能有好下场！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说，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吧……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争取赵家梁的帮助，搞一个能过得去的检讨吧。

斟酌再三，他最后写下：

“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在这里，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话中有话。“实质上”、“企图、”“达到”、“将来”、“欲望”都是虚拟、假定之词，联系到他对林彪，对陈云、周恩来等人一向十分崇敬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怀疑，他怎能撇开他们几个，自己去当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呢？既然不可能，那么，这就是违心之词了。

说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高岗在反省稿的“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破坏党的统一，混乱党的思想，腐蚀党，削弱党的战斗力”这一句后面，又加上“实质上已经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做了敌人所希望做的事情。”

可见，高岗的确是在认真反省，反复思考，而不是草草了事、敷衍应付。他花了不少心血，经过 40 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既希望比较彻底地实事求是地反省，也有故意上纲上线、加重自己错误的言词，以便能过得了关，得到党中央的认可，从而还能站起来“重新做人”。

然而他又不甘心情愿真的承认这些言行，所以又在字里行间留下耐人寻味的推敲之处，多少反映出委曲求全的苦衷。

在誊写反省稿的过程中，他有时问赵家梁是否要写这个或那个，但更多的是有标点符号和个别用字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需要修改补充、讲得更清楚的。例如，在西北部分，补写清楚“渭华暴动”、“临镇脱逃”和两次被捕这三件事；在东北部分，补充了个人突出和缺乏集体领导的缺点错误；在北京部分，添写了“封官许愿”等具体事例。

1954 年 4 月 26 日上午，高岗誊抄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有意歇笔，对赵家梁说：“通过这些天的反省，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是很渺小的。我出身穷苦，念书少。什么书记啦、主席啦，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其实不符。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是革命先烈。个人和他们相比很渺小。这次反省很有收益，认识更清楚。”

“咱们相处快两年了，关系不错，工作上得到你很多帮助。这次你挽救了我，我从心里很感激你。为了我的事，把你栓了这么久，我觉得很抱歉。请你不要误会，我说这些不说虚伪，这是有啥说啥。多少年来，我很少对人说这样的话。”

“我这个人个性很强，‘本性难改，脾气依然’。人有脸，树有皮，人总是有脸皮的吧，还有点自尊心吧。既然习仲勋、贾拓夫他们都不来，我也不把反省稿送给他们看了。”

1954 年 4 月 28 日下午五点一刻，高岗终于把《我的反省》誊抄完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又认真通看一遍，在个别地方添了说明性的字句。

尽管他对习仲勋有抱怨情绪，但 4 月 29 日上午，还是把反省稿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来，说“在关键问题上检查很不深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个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习仲勋的看法后，激动、气愤一下都涌上心头：别人不理解我，难道连你习仲勋也不理解我么？他涨红着脸，举起双掌猛击太阳穴，愤愤连呼：“送走，送走!”

赵家梁劝慰他：你不要这样激动，再好好想想嘛。

他呆呆地望了赵家梁一会儿，似在调整情绪，又似在思考怎样修改。稍平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写上吧，写上吧!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己无法思考问题，望着赵家梁，茫然而又无奈地说：“你帮我考虑考虑，添上一句吧!”

赵家梁想了一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高岗斟酌。

这天深夜，高岗独坐沙发，凝视着那张纸条，良久良久。上床以后，仍长吁短叹，一夜未睡好，不时起床翻阅反省稿。

他反复想：他们硬叫我承认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叫我怎么承认？可是现在谁还相信我呢？

但是，不承认肯定过不了关。

就算违心承认，真的能过关吗？……

他恍恍惚惚，似醒似睡，好不容易有熬过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1954 年 4 月 30 日一大早，高岗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刚刚五点多钟，高岗把一张字条交给赵家梁，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它加在哪里？”赵家梁帮他找出来写上。

高岗经过这一夜的斟酌，把赵家梁写的那句话添上了“实质上”、“企图”；去掉了“国家的”这些词。可见其用心良苦，很值得推敲。

他这里用了“实质上”和“企图”两个词，意思是，“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只是一种推论，是分析上纲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从一开始挨批判时就顶着，他一直申辩说：“根本没有”，但却无用；

他以自杀相抗，不仅无用，反而“错上加错”，被管教；他认真地如实检查反省，还是不行。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在自己的反省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违心的千钧重语，却又特意添上那些虚拟词，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去认真推敲其中隐藏的真实的含义。

他最后一次仔细看了一遍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赵家梁说：那就只好这样了，送走吧。

这时正好是 1954 年 4 月 30 日上午九点。

第三章　经济内阁

1952 年秋，随着全国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和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负责组建“经济内阁”，就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

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使人民共和国长兴不衰？如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困扰他整个后半身的重大问题之一。

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多少帝王将相，“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们有的打天下时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坐天下时却勾心斗角，争夺权位；有的骄奢淫逸，“政怠宦成”，坐失天下；有的即使是“明主”，也不过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后继无人、“人亡政息”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全党上下一致的，虽然各解放区长期处于分散割据的局面，也造成一些分散主义，但并不影响解放全国的大局。那么现在呢？

毛泽东认为，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地方又，中央也有，而且建国以后还有所抬头。地方的分散主义来自各路“诸侯”（大区）；那么，中央的分散主义来自哪里？

当初，是他把刘少奇推上了自己助手的岗位。然而，“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刘少奇的一些表现不能令他满意。这几年，刘少奇经常未经中央研究同意，就擅自发表讲话，发表文章，甚至连一些中央文件都不经过他看，就发出去了。 【注 1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0 页。】其中有些未必是代表中央的，或代表他毛泽东的意见。

还有周恩来。毛泽东曾对人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什么党的总干事会，　【注 2 1950 年 1 月 9 日，政务院成立中共党组总干事会，周恩来任书记。】他要干什么？

一种“有人想要脱离中央领导”的预感令他不安。

地方的情况也令他担忧。过去的 19 个解放区，犹如 19 个山头，19 路诸侯。如今是六个大区，哪一个不听指挥都会出问题。新中国会不会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呢？现在还很难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昔日诸侯称雄天下，天子徒有其名的故事屡见不鲜。如今，有防患于未然，他不能做那被架空了的荣誉领袖，不能任由分散主义泛滥。

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步调。不允许自立门户，各行其事。

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喘息未定，又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那时毛泽东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可是他何曾有一时忘怀！

1952 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来到，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势在必行。

一、五马进京

1952 年 9 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准备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个大区书记（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中，高岗的职位最高。董必武赞叹道："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呀！"

1952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第 19 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一是把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其二是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人们戏称其为"经济内阁"。党中央接受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计委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这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包括 11 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注 3 [这些委员的职位不全抵御计委副主席，他们大部分属于顾问性质，如前十名，都在中央另有职务，不到计委办公。这些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主要职务是：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等；邓子恢，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李富春，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中央候补委员，华北局副书记。】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心，也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计委是何等重视。

毛泽东的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用心良苦。他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不：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确实是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担任计委主席，主掌"经济内阁"，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恩来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财经委员会 【注 4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因陈云长期生病，实际上是薄一波主持财经委的工作。】薄一波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制约、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 1980 年 3 月，邓小平所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第三，毛泽东把各大区首领都调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随时观其动向，防其不轨。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也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之举。虽然高岗也在被削弱的"诸侯之列，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主要担心的还不是高岗。高岗到中央工作，在东北的原职务不变。这既可使高岗放心地接受新使命，也表明毛泽东对高岗的格外倚重。

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 1949 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吧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 1952 年 10 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 年 9 月 13 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 月 23 日、25 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 25 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再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补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辫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对秘书说：邓子恢同志长期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这次毛主席叫他担任计委副主席，还是负责这方面（指农业）的工作。

后来得知，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高岗在东北，工业方面搞得不错，你们两人在一起，一工一农，搭配起来最合适。

李立三到高岗家来过多次，主要是谈工会问题。工会工作不归高岗管，但他还是很诚恳地与李立三交谈。他认为工会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并向李立三谈了自己对刘少奇的看法。

李立三说：我了解少奇同志，你可以找他谈谈。

这件事，李立三可能对毛泽东说了，不久，毛泽东叫高岗和刘少奇谈谈，但他没有谈。

在高岗反省期间，管教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刘少奇谈？他说怕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毛主席。

计委的筹建工作，包括制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调配干部，以及机关选址、购置房产、设备等等，也在紧张进行。

行政事务购置由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大家上下齐心协力，艰苦朴素，不讲排场，踏实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到翠花湾东北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就安装了与中央联系的电话，中南海各区的通行证很快也办下来了。选办公地，买宿舍房等，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很大的支持。办公地选在南河沿原北大三院，地方不大，房子也很破旧。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个买一个楼房做宿舍，不够住，一部分人就把办公室兼做宿舍。高岗和秘书都住在翠花湾东北办事处。高岗的房间布置也很简单，没有地毯、沙发等。当时私人企业听说计委要购买家具及办公用品，认为有油水，很高兴。由于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私商都很守规矩。大到桌椅橱柜，小到文具纸张，大批购进，质量好，且没有回扣。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二人都是新任命的计委委员），进行得很顺利。安志文根据陈云的意见，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绝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央组织部还从其他地区调配了一些领导干部，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及副省长韩哲一，张玺担任计委专职委员，等等。马洪负责联系从东北地区调配干部，基本都是德才兼备，且有相当经济工作经验的骨干，经高岗同意后，再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东北局组织部对于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凡是计委要的人，一律放行。仅从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一百多人。

高岗对计委的班子非常满意，说计委的人都是优秀的，要文有文，有武有武；计委的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后来，有人说他是在计委“拉山头”。他自己在反省时说：“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我希望吧计委机构加强，调一些人。想调陶铸、郭峰、伯达到计委做副主席。伯达来，理论上加以指导，有能力，有理论。派人下去能解决问题。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表现自己管得不错。我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人后。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各局局长和委员们。我剽窃人家的文稿，表现自己，个人突出，吧计委当成自己的资本。”

可见，他既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参杂着一些个人的成分，但还不是单纯的“拉山头”。爱才用人是他一贯的特点。东北的经济建设开展得较早，高岗又特别注意经济干部的培养，经过三年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骨干。在组建计委时，东北的干部多一些，主要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且，把有经验、有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调到北京，是对中央工作的有力支援。

还有人说，高岗排斥某些干部。事实并非如此。如朱理治，过去在陕北曾执行过“左”倾路线，整过高岗。但高岗并没有因此而排挤他，仍把他留在物资局任局长。顾大川和宋劭文来自华北，高岗也没有排斥他们。宋劭文原是中财委的副秘书长和计划局局长，很有才干，对计划工作也很熟悉。但调入计委不久又调出去了。于是有人议论说，因为宋劭文是“薄一波的人”而被高岗排挤，进而推广说，高岗“排挤华北的干部”。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宋劭文调走另有原因。

1952 年秋，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宋劭文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当时这是绝密的事，但外国报刊却报导了。

是谁泄露了管教机密？中央查来查去，原来是宋劭文的妻子和妻兄（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传出去的。因此，中央认为宋劭文不适于留在计委工作，决定调走。然而，调动的原因又不能对宋劭文明讲。为了不给宋劭文造成思想负担，高岗亲自找他谈话，说为了加强对轻工业部的领导，调他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云云。这件事其实与“拉山头”、“排除异己”毫无关系。但高岗不能对别人讲明；宋劭文至死也不明白那次他调离计委的真正原因；旁人就更不明白了。于是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联想，以致引起对高岗的误解。

高岗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工作之余，常到办公楼前的球场与工作人员一起打球，到他们的住处串门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争输赢，赢了拍手大笑，输了照样钻桌子；新年团拜时，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十分快活。他与大家相处很融洽，毫无国家副主席的架子。

计委的筹建工作于 1952 年底基本完成，1953 年 1 月，各部门的工作全面展开，高岗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组织干部学习；编制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八个工业部的工作，以及中央交给他的其他任务。

二、备受器重

1952 年冬至 1953 年上半年，高岗几乎每天下午到中南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小会，既谈工作，也有学习，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学习苏共“十九大”文件等，也结合中国经济建设中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当时，中央办公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对面围墙内的新西楼（1 号楼），高岗的办公室安排在二层，中央小会的会议室就在高岗办公室的斜对面。【注 5 这种安排时间很短。】这样，高岗与毛泽东见面很方便，两人私下交谈机会较多。从高岗后来自我检查反省中可以看出，他们说过不少“私房话”。这也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高岗是多么重视。

（一）组织干部学习

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个新课题，当时可以借鉴的只有苏联经验。高岗到京以后，加倍努力学习，以使自己不落于人后，也要求计委的全体干部跟上

新形势。因此，高岗对计委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他与负责日常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制定学习计划，内容有理论方面的，也有业务方面的。如政治经济学、苏共“十九大”报告、计划工作中的平衡法、编制经济计划的方法、制表方法，等等，一切从头学起。他叫主管部门印发两本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的约 80 万字的材料，还找来人民大学的有关教材印发给大家；请了一位人民大学的讲师来讲课，每两周一次。当时没有礼堂，在饭厅上课，他同全体干部一起站着听一上午。平时，只要有机会，就请专家或懂行的人介绍科技知识、苏联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定期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既务虚，又务实。他要求计委的干部要“钻进去”，成为计划工作的内行。

那时苏联的计划工作也有不少毛病，主要是“卡得太死”，重工轻农，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等。但在力求综合平衡和指标不能过高、须留有余地等方面，也确有正确的、值得学习的方面。

高岗始终坚持与计委的同志们一起认真听课，参加讨论，注意同志们的学习经验。

当时，中央小组会上正讨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他随时把在中央的学习所得带回计委，指导计委的学习；又把计委学习中的问题和经验及时反映到中央去。例如，高岗把毛泽东批评“巩固新民主主意秩序”等观点的话传达下来，引导计委的干部进行讨论。又如，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过程中，局长刘明夫结合我国实际写了学习心得：认为我国商品库存太多，积压资金 20 亿，影响了经济发展。高岗听了秘书的汇报并看了刘明夫的发言提纲，非常欣赏，随即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时加以引用。【注 6 高岗在学习苏共“十九大”马林柯夫报告的发言中，结合报告中谈到的苏联商业工作中存在的极少研究居民需要，服务态度较差和经营管理不善三个问题，联系我国商业工作的实际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为改善贸易企业的经营管理，搞好经济核算的三条意见：(一) 很好地研究居民需要，加强产、运、销与商品分拨的计划性；(二) 理清贸易企业的财产和账目，核定各级公司的资金，制定一些主要定额；(三) 加强政治工作，培养与表扬模范，建立超额奖励制度，从而改善商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后来发现，高岗的这个发言，实际上是当时计委贸易合作局局长刘明夫关于商业工作的一个发言提纲。】由于当时他没有说明材料的来源，毛泽东误认为是高岗自己的心得，当场表扬他善于理论联系实际，要大家向他学习，而商业部的同志却因此受到批评。【注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对高岗报送的在苏共“十九大”文件学习讨论会上的发言的评语：周、邓、陈、薄、曾山同志阅。退高岗同志：此件很好，使人一看知道我们商业工作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知此次商业部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否与高岗同志在此件所说明相同，请曾山同志告我为盼。毛泽东，1952 年 12 月 25 日。】他也十分关心西方世界，特别是美英等国的情况，每天吃早饭时，他都要让秘书把“美国之音”等外台广播的消息讲给他听。一次，高岗在中央的学习会上发言，分析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地区的消长情况时，引用了下边工作人员提供的资料，同样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然而，一年后批判高岗时，这些都成为他“沽名钓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例证。

（二）编制五年经济计划

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从 1951 年春天开始，在周恩来的主持下，由中央财经委着手进行。当时把工业发展速度提到 20%以上。后来斯大林建议要留有余地，不要冒进，工业速度不要超过 20%。

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成了后，此项工作改由高岗主持。

1952 年 12 月下旬，党中央提出关于制定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必须以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为出发点，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

1953 年 1 月，毛泽东提出三项原则：

1、由于抗美援朝战争仍未结束，经济发展计划要从战争和经济两个方面考虑；

2、不能百废俱兴，要有重点的发展；

3、要留有余地。

1953 年 2 月中旬，随中国代表团访苏的宋劭文和白杨回国，带回李富春的信、中国代表团与苏共领导人谈话记录、五年计划的项目协议草案及斯大林等人对五年计划草案框架的意见等文件，向高岗汇报。

高岗认为事关重大，决定立即召开计委全体委员会议，计委的有关局长都参加，听取宋劭文和白杨的汇报。

此时正值春节前夕，时间紧迫，会期便定在 1953 年 2 月 14 日春节这天。会议的地点却费了思考。当时计委办公楼（南河沿）没有会议室，最大的屋子也只有一间小教室那么大。虽有一个小礼堂，却破旧不堪，四面透风，不能使用。想来想去，想到高岗刚搬进去的住所——东交民巷八号院。这里原是法国大使馆，有一座尚未住人的大楼，一层有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厅，原是法国大使举办宴会、舞会用的，现在正好可派作此次会议之用。

这是计委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也是最后一次）。除彭德怀在朝鲜，李富春在苏联未归，林彪因病请假外，全体委员都到了。朱德虽不是计委委员，但很关心这件事，也放弃春节假日，参加了会议。此外，计委的局长、副局长也列席会议。汇报完了接着讨论、气氛十分热烈。会议从上午九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结束。中午没有休息，服务人员从北京饭店买了一些烧饼给大家充饥。

这次会议的时间在春节当天，与会者职位很高，又是在高岗的家里举行，都是“打破常规”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开得好，开得及时，这是雷厉风行、分秒必争作风的反映，为 1953 年开了一个好头，是新气象。也有人说是标新立异，何必搞得那么紧张，玩新花样！认为是高岗炫耀自己。其实这个会议事先经过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意，毛泽东赞成高岗来个“破旧”。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次会议之所以在高岗家里召开，完全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并无什么“不正常”。此后几乎每周星期六上午，他都要在这里召开办公会议，直至他停止工作。但是后来，这件事却被加上了浓重的“阴谋”和“野心”的色彩。

1953 年 3 月份以后，开始起草财经会议报告（计划工作）。高岗几乎每天上午去南河沿办公室，主要是研究五年计划的项目设立、厂矿选址、城市规划、长远计划的设想等。高岗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并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主持修改五年计划框架草案，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把经济发展速度定在 18%。当时，苏联已经同意援助我国 156 个建设项目，几乎全部是重工业，其中国防工业又占主要地位。1953 年 6 月 29 日，他在财经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与李富春的报告一起提交会议讨论。

这段时间，计委的日常工作比较繁忙，高岗每周至少有四天到城西三里河的计委新址开会，听取各局的汇报，参加讨论。往往从上午到下午两三点钟，午饭也不吃。

（三）主管八个工业部

除了计委的工作外，根据 1953 年 5 月 15 日政务院通知，【注 8 1953 年 3 月 15 日，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发出通知，对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进行重新分工：1、所属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划归计委主席高岗领导；2、所属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3、所属农业部、林业部和水利部，划归财经委员会 主席邓子恢领导；4、所属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5、所属财政部、粮食部、商业部、对外贸易部和人民银行，仍属财经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高岗还分管重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的工作（原来中央人民政府一办管各工业部）。他对此项工作抓得很紧，平时除了处理各部门来的电报、电话外，还接待各部的来访者，解决他们的问题；各部的部长、副部长们直接打电话向他报告情况；每周星期六上午召开工业部负责人办公会议。为了开好办公会议，事先

要做充分准备。

平时，他随时让赵家梁将中央有关指示和情况记录下来，每 星期五晚上由赵家梁邀集计委的主要干部进行传达。然后听取一周来的工作情况汇报，大家凑出明天要谈的问题。经赵家梁整理，确定高岗次日在办公会的谈话要点。

星期六早八点，高岗边吃饭，边让秘书汇报昨晚座谈的情况，他时而插一两句问话，时而叫秘书在他讲话要点中作些补充。九点，在东交民巷八号院大楼的大厅里召开计委有关负责干部好八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参加的办公会议。高岗传达一周来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或讲话后，一面听大家发言，一面修改补充他要讲的内容，提出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具体措施，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等。办公会议有时长些，一般 12 点结束。这样一直到 11 月底。

高岗这种当场拍板，及时解决问题的做法，受到计委和各工业部负责人的好评，有问题愿意找他解决。但因此招来了一些非议，甚至得罪了一些人。

1953 年 3 月，计委的工作尚处于交接阶段，一些部门的问题虽然向中财委反映多次，但没有得到解决，便来找高岗。他立即给薄一波打电话，以商量的口气说，下边的同志反映了一些问题，我看能解决的局给他们解决吧？

高岗没有料到，由此竟得罪了薄一波。

3 月下旬的一天，薄一波召集财经部门各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在中财委小礼堂开会，大发雷霆说："什么事都去找高主席，你们知不知道还有个中财委？中财委有个主任叫陈云，还有个副主任叫薄一波，还有个副主任叫贾拓夫？……"他令一机部部长黄敬、冶金部副部长吕东等逐一站起来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就那么站着，不让坐下，会议的气氛十分尴尬。到了中午 12 点，建筑工程部部长陈正人见薄一波讲话仍无很快结束的可能，便悄悄地沿墙向外走。薄一波发现，喊道："正人，正人！回来，回来!"陈正人只得又怏怏地退回坐位上。

这次会议令大家极不愉快。当天下午，陈正人等来高岗家向他报告，添油加醋谈了很多，还联系到薄一波在"三反"运动搞 扩大化，还要把陕甘宁划归华北局统由 薄一波领导等等，并说薄一波后面是刘少奇在支持，情绪很激愤。

晚饭后，秘书陪高岗在院子里散步时提醒他说："今天陈正人反映的情况言过其实，有挑拨关系的口气，你要注意。"

高岗不以为然："人家陈正人是长征干部，经常去见毛主席，政治上很强的。"

这件事对高岗的震动很大，也是他所说的对薄一波"不服气"的一件事。后来在财经会议上。他批评薄一波作风跋扈，这是例证之一。高岗在反省时提到此事时说："1953 年 3 月底，中财委开部长会，一波讲话出格。我认为他对我采取这样的态度，自己也就不是 采取正确的态度，而采取错误的态度，说他批批点点，不解决问题，认为自己在经济方面有办法，吹嘘自己。"

从 1953 年 6 月中旬到 10 月初，会议特别多，先是全国财经会议，整整开了两个月。期间，高岗从代表中共中央去了一趟莫斯科，听取关于贝利亚问题的紧急通报；回来后，在会上作了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8 月下旬、9 月初，参加两次关于财政问题的政治局会议；10 月初，关于粮食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商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

与此同时，这年秋天，他让计委派有关干部下去检查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征求意见。回来后，又着手制定 1954 年年度计划、海军装备计划、抗美援朝计划。

紧张的炎夏过后，中央批准高岗休假一个月，从 1953 年 10 月 3 日岛 11 月 2 日，他经南京、上海，到杭州、广州，开开心心地玩儿了一个月。

三、黯然离岗

高岗于 1953 年 11 月 2 日返回北京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整个 11 月特别忙碌。平时，他几乎每天下午都要去计委，或听取各局的汇报，或处理日常工作。星期六上午照例在他家召开各工业部负责人办公会议。下午主持计委各局局长参加的学习。

这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大楼在修建，刚建成的宿舍权充办公楼，一座二层小楼是将来的幼儿园，现在暂做计委主席、副主席们的办公室。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高岗在停职前最后两个月的工作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高岗的确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1953 年 11 月 5 日下午，高岗在办公室与计委的几位负责人商谈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安排，谈增产节约、基本建设、组织机构等问题，主要是着手编制 1954 年的年度计划，检查1953 年计划执行情况，并联系考虑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 年 11 月 6 日上午，部署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准备工作。下午学习会，谈总路线、国家资本主义、阶级斗争和稳步前进等问题。

11 月 8、9 日，高岗阅处 11 个中央文件，其中有中朝铁路协助草案、中央关于批判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指示、空军司令部对有关工业部门修理任务的意见等。

11 月 10 日，批阅七个文件，有关于增产节约的报告，及援助朝鲜修复铁路方案等。

11 月 11、12 日，批阅 12 个文件，听取军工项目在西安选厂址问题的汇报。

11 月 13 日，阅处六个文件，听取海军司令部关于三年建设计划的汇报。

11 月 15 日，与金日成会谈。这天是星期日，本该休息，但却格外繁忙。那天一大早，高岗尚未起床，李富春就打电话叫赵家梁到他家去谈问题。

李富春住在万寿路一栋日本式的平房里，不到七点钟，他已坐在办公室等着了。一见面就说，“有几件事，你记一下，回去向高岗同志汇报。”接着，他用了半个多钟头，谈了以下五个问题（大意）：

1、计划分口问题：12 月底以前提出讨论，送中央。

（1）过渡时期，计委负责搞工业，搞国民经济的综合。其他归各口各委负责。

（2）各口各委的工作机构，就是计委的各专业局。

（3）计委要有一个副主席或委员负责综合计划局，单靠杨英杰不够。张玺同志觉得面太大，搞不了，要求先窄一些。增加一个副主席或驻会委员来管综合，很有必要……这样，拓夫、张玺可多注意生产，志文、马洪可多注意基本建设。这个问题请高主席考虑。

（4）物资分配问题。目前机构不够，如不想办法解决，要被动。内容和机构都要加强。生产资料的分配，要统一地有计划地掌握；对私营和地方工业要求加工订货计划。物资机构要扩大，物资局以上，计委以下，组织一个物资分配委员会，由商业部、对外贸易部、粮食部参加，执行机构为物资局和商业部。这是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不搞委员会，就加强物资分配局的领导，分为综合物资调拨局、专业物资调拨局，物资计划局就把商业、外贸扭在一起。这个问题，今年 12 月内解决。

2、1954 年计划的投资方案问题。

首先是确定利润，各有各的数字。最困难的是重工业方面的……以倪伟为主，把帐算清楚。小平说，各部的增产节约利润，超计划的部分，可以转入明年投资，增产节约外的超额，可以有百亿元。在包的原则下面，百分之七八的预备费可酌量减少一点。最好 11 月 20 日左右搞出来。

3、141 个项目问题。

苏联设计专家来，一是搜集技术资料，待专家来鉴定；二是设计任务书的制订；三是各部为主，计委各局参加，确定各个项目的各部门之间的协助问题；四是厂址的选择布局问题，要考虑战略要求、工业布局、城市规划等。基本建设的设计计划工作，拟于 12 月 3 日至 5 日开会，请专家讲一下。

4、1954 年的计划问题。

下达情况要通盘作一次检查，哪些还有意见，检查一下帮助订计划的情况，规定的时间不松口，可考虑让下面的时间多一些。

5、干部问题。

（1）3000 名干部的配备问题，吧根据搞清楚。

（2）实习生问题，1954 年 997 个。关键是：第一，各厂不愿抽调；第二，公安部的审查。

（3）对专家的关系检查，各部的，计委的，要催一下。

（4）刘某去苏联，拓夫找他谈话，要刘澜涛参加。

（5）各部的情况，“重工业部和一机部的干部提拔有偏”的说法不一定对。轻工部、纺织部的领导弱，需要主动把各工业部的情况了解一下。有几位同志拟担任一些部的副部长，如同意，请中央组织部办。

本来，作为计委的副主席，【注 9 1953 年 9 月，中央任命李富春、贾拓夫为计委副主席。】李富春完全可以直接和高岗谈，不知为什么，却要通过秘书转达他的意见。高岗对李富春的意见很重视，只是当天他要与金日成会谈而无暇顾及，便让贾拓夫考虑，以后再另找时间与李、贾一起详谈。

事后听说，李富春当时已知道，由于高岗在毛泽东面前为饶漱石说好话而挨了批评。他担心高岗要挨整，所以用这种方式，既提醒高岗慎重小心，又不落下与高岗又什么干系的痕迹，可谓用心良苦。遗憾的是，粗心的高岗并未注意这一点。后来在揭发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果然有人提出“李富春与高岗关系不正常”的问题，可见他并非多虑。

外交工作本由周恩来主管，但毛泽东却把一些事情交给高岗处理。一次，外交部给毛泽东一份关于参加世界经济互助会问题的请示报告，他转给高岗阅处，问他是派代表团还是派观察员去参加？请高岗提出意见。

与金日成会谈的工作也交给高岗。

会谈安排在 1953 年 11 月 15 日上午，高岗与金日成是老熟人、老朋友了，会谈中自然是坦诚相见。先由客人详细介绍朝鲜的人口、农业、工业等情况。16 日上午继续会谈。客人着重介绍食油、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并提出要求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其中包括建筑材料、钢材、铁路、铝材、燃料、粮食、食油、副食品、棉花布匹、及生活用品、文化用品等等；还要我国派技师、技工去朝鲜，他们派 2000~3000 个人来华学习。

中国政府非常同情朝鲜人民的困难，经过会谈，对他们的要求给予了尽可能的满足。

金日成对此次会谈，尤其是中国答应给予无偿援助，非常满意。他一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感谢。归国途中，在列车上还打电报，说此行极为满意，谈得很顺利，很成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满地解决了重大问题，再次表示对中国领导人，特别是对归国十分感谢。

铁道部修建鹰厦铁路，是邓小平主管的工作，因其中涉及军事方面的问题，毛泽东也批给归国处理。后来将此项工程纳入了国家建设计划。

山东省委关于开展“新三反”运动的报告，毛泽东首先将草拟的批示征求归国的意见。

这些本不属于归国分管的工作，毛泽东却批给他去办，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的器重和着意培养，但另一方面却让一些人感到高岗的手“伸得太长”，竟到别人碗里抢饭吃，难免有“抓权”之嫌。

1953 年 11 月 21 日至 22 日，修改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稿。

彭德怀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毛泽东曾让他去找高岗帮助，说高岗手下有一批秀才。高岗也确曾帮彭德怀修改过这个稿子。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发展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1953 年 11 月 21 日下午三点钟左右，他带着报告稿来到高岗家。

“老高啊，这个稿子我又改了一下，你再帮我看看吧!”

高岗也不推辞，送走了彭总，立即与赵家梁一起研究，整整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是星期天，从上午九点开始，高岗又和赵家梁一起花了四个钟头仔细推敲。下午三点不到，彭德怀就来了。赵家梁陪他到楼上高岗的起居室。

高岗说："你这个稿子，我们花了一个晚上，一个上午"

彭德怀十分诚恳地说："哎呀！真是抱歉，太感谢啦！"

"这个报告总的看，写得很好，内容、架子都可以。有些具体意见，由赵秘书说说，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赵家梁就逐一讲述了上午准备好的内容，最后说明："这是上午高主席跟我交代，请彭总参考的。"

"哎呀，你可真是帮了大忙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这个二三万字的报告仔细地看了，还提了修改意见！还耽误了你的休息！"彭总惊叹高岗又如此充沛的精力，如此认真地看了他的稿子，不但提了意见，还花了很大的力气亲自动手修改。他一再表示，非常感激高岗真心诚意的帮助，非常钦佩高岗敬业精神。临走时，他双手紧握高岗的手，再次表示深切感激之情。

1953 年 11 月下旬，高岗召开地质部和燃料工业部的会议，解决关于勘探工作分工合作问题。

同时，在军委扩大会议前夕，高岗根据中央的意见，注意抓了海军建设。11 月 26 日，海军司令肖劲光汇报海军建设规划，在考虑三年计划的同时，也初步考虑了五年和十年计划的要求，以求与形势发展相适应。事实上，海军的建设规划不可能单独考虑，还要与整个军事建设、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相协调。

1953 年 12 月初，听地质部李四光、刘杰、何长工等谈地质部工作；听西安、兰州、北京等地区城市规划问题的汇报。

12 月 14 日，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叶季壮等根据与苏联谈判的情况，商议与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贸易问题。

12 月 15 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毛泽东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高岗主张轮流。

12 月中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三大工程竣工典礼。17 日上午，高岗、李富春和贾拓夫在计委办公室商量由谁陪同苏联客人去鞍山。他们三人都愿去，互不相让。争议了好久，最后还是李富春、贾拓夫让了步。按理说，李富春去比较合适，高岗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坚持要去是另有原因，但当时并没有讲明。

12 月 21 日，高岗主持计委局长会议，讨论 1954 年的财政计划。他认真听了财政计划局倪伟的汇报，以及有关各局局长和马洪、张玺、安志文等委员的意见之后，讲了以下意见：

1、速度多少，把有利、不利因素都要考虑在内，应是百分之几，就是百分之几。

2、成本，今年能否降到 7.2%，明年是否可降至 6%，要和各部一起算，不要自己偷偷在房子里算。

3、明年收入，我倾向 220 万亿元，各部硬不承认，就不要搞翻了。

4、开支，还是照原来的，不开口子，确有问题的，摸一下，开个单子，必要时再商量增加一些。

5、城市建设，大的是水源问题。新的城市确实需要的，可以；一般可由各地附加解决。

6、现在突出的矛盾是：到处要增加投资，减少利润。要集中解决这个问题。综合局要研究解决，要分主次，要从几个年度结合考虑。

7、基本建设，分哪些列、哪些部列。至于设计，一定要列上，不能耽误。

这是他最后一次比较认真地参加的计委会议。直到此时，高岗还能把思想集中在工作上。

但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已对高岗产生了严重的怀疑。一进入 12 月，毛泽东就开始找一

些高级干部谈话，调查高岗的“反党言行”。

高岗察觉到毛泽东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几次会议之后，他显得心神不安，参加计委的会议，听取汇报时，思想不能集中，听不进去，常常要秘书坐在他身后，给他准备即时发言的提要。

12 月 24 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在讲到加强团结的问题时，突然不点名地把高岗端了出来，说他另有一个司令部，根据之一就是“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

毛泽东的话，对高岗犹如晴天霹雳。但毛泽东不容他解释，会后即连夜南下，去了杭州。第二天，高岗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陪同苏联客人捷沃西安去参加三大工程竣工典礼。

会后，他于 28 日匆匆忙忙到沈阳召开东北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加强团结的指示，强调刘少奇在历史上的功绩和重要作用，要求大家拥护刘少奇在毛主席外出休假期间主持中央工作；也要求东北全党团结在以林枫为核心的东北局周围，把工作搞好。这次沈阳会议可以说是他对自己过去反刘言行的一次补救，但为时已晚。

1954 年 1 月初，他回到北京。当捷沃西安要离京去上海、杭州时，本应他去送行，但他向总理表示不愿去。

深夜 12 点，周恩来给马洪打电话说：“请你告诉高岗同志，中央已经决定，由他送捷沃西安同志上飞机，一定要去!”这是他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此后，他再没去计委上班，开始准备反省检查。

至此，我们对高岗到北京以后的活动有了基本了解，下面两章讲叙述 1953 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并由此说明高岗为什么会从高位上掉下来，以及他是怎样掉下来的。

第四章　跌入漩涡

1953 年，毛泽东提出了当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党和国家的体制改革与人事安排也提上了日程；接班人问题成为重要话题。然而，这一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加深，斗争明里暗里，时现时隐，中国政坛可说是风诡云獝。

高岗到北京参加中央的高层领导工作，虽然没有看到让他参加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文件，但他实际上确实参加了书记处的会议和日常工作。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就在毛泽东办公室的对面。毛泽东不仅可以随时和他谈工作或聊天，还把许多本来不属于他管的工作交给他处理。

经管他为自己定下“约法三章”，一心要把自己分内的工作搞好，“搞少不搞多”，但在毛泽东和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这是高岗对某些高级领导人的称呼）的影响下，他原来对刘少奇的意见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更有所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毛刘之间的政治漩涡而不能自拔，最终葬身其中。正如他自己所说，“来北京时，带来了对少奇同志的错觉。”

那么，他所说的“若干自由主义空气”是什么呢？长期以来，许多书刊文章把高岗的反刘言行说成他的个人行为，即“个人野心”和“反党阴谋”。其实，他的反刘活动，固然有其自己的责任，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行为，而根子在毛泽东。邓小平在 1980 年 3 月 19 日的讲话明确指出：

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家解放初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样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西北是彭德怀同志。【注 1 引自张明远记录的《邓力群传达邓小平讲话》。】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53 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北京的政治舞台发生了许多事情。

一、暗流涌动

（一）谁来组阁

1953 年的第一个话题，是由“新税制”引出的。

1950 年颁布实行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企业在税收上给予很多优惠。随着这两类企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税收方面也出现许多问题，由此导致对税制的改革。1952 年 9 月，财政部提出修改税制的方案，经政务院批准，于 12 月底公布执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新税制”。

不料，各地对新税制的反响极大，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马上进行严厉批评。1953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信说：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注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234 页。】

周恩来感到了问题之严重，连夜写信解释，并采取补救措施。许多年以后，薄一波回忆说：

周总理收到信后，连夜给毛主席写回信，谈了处理的办法……我当时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出台刚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我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看了也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注 3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234 页。】

1953 年 2 月，财政部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了关于信税制问题的调查以后，毛泽东又批评说：

“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注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235 页。】

显然，这次批评比 1 月 15 日那次更加严厉，并且把错误的性质提高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高度。他怎能容忍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无视中央的行为？

1953 年 3 月 10 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强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经中央正式批准执行。其中明确规定了“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并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分为计划、政法、财经、文教、外交和其他，共六部分，进行了分工，以明确责任。周恩来负责外交（含外贸、外经、对外联络和侨务）工作，原来由他担任书记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也撤销了。

1952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于 1953 年 3 月 10 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对于中共中央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 年 1 月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已无存在的必要，当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属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做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现特规

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1953 年 5 月 15 日，政务院根据这个决定发出通知，根据中央的上述决定，5 月 15 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

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一）所属的铁道、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二）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三）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四）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对政府所属各财经的工作进行分工，高岗分管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等八个工业部。

这两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怕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出问题，也担心政府工作脱离中央领导的复杂心态。

这大概就是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对周恩来有意见”的一个重要方面吧。

正是这种心态，使毛泽东产生了更换总理的想法。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在 1953 年春天和高岗关于更换总理的那段谈话：

毛：“要是恩来不当总理，是否由你来组阁？”

高：“我不行。”

毛又问：“你看谁行？”

高答：“恐怕林彪比我行。”

毛泽东是真心想让高岗取代周恩来，还是对高岗的一种试探？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据高岗说，毛泽东与他议论周恩来，正是唯一的一次，而且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件事。后来怎么就成了“高岗反对周总理”，“高岗想当总理”？如果高岗真的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何不紧紧抓住这个大好机会呢？而且，这次只有两个人说的“私房话”，怎么会被第三者知道，并被颠倒歪曲呢？

（二）改变传阅文件顺序

1952 年冬到 1953 年上半年，中央机要文件传阅的顺序，一般都是毛、刘、周、朱的后面第一个是高岗，往下是彭德怀、彭真等。可是有一段时间，周恩来签送传阅的文件顺序却改成了“毛、高。刘……”，或干脆写成“毛、高”或“主席、高岗”。赵家梁发现了这一变化，立即提醒高岗：“你注意到传阅文件的顺序了吗？”他指着一份文件说：“这样不好，不得了。你要小心，不要造成你一来就独霸天下的印象！”

高岗盯着赵家梁愣一会儿神，又看看文件，明白了他的意思，笑着点头道：“你说得对！”顺手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总理！最近传阅文件，怎么把我的名字放在少奇同志的前边去了？这样不好啊，请你千万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是周恩来对高岗的试探，还是为他设下的圈套？或许仅仅是对毛泽东的迎合?或许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所授意？以周恩来的精敏谨慎，他敢自作主张么？这件事，

当时并没有人注意，以后也从未有人提起。但不管怎么说，高岗总算躲过了这个小小的漩涡。

（三）斯大林逝世引出的话题

1953 年 3 月，突然传来了斯大林逝世的噩耗，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为之哭泣。中共中央在酝酿派谁去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时，曾考虑由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前去，后来决定由周恩来总理前去，高岗等跟随毛泽东主席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

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在中国，毛泽东“之后”怎么办？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不能不想。这个问题毛泽东想到了，刘少奇想到了，还有相当多的人都想到了。

毛泽东不得不正视现实，他毕竟已经六十多岁，身后之事必须及早考虑。

于是，在中央高级领导层中，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 1953 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毛泽东与刘少奇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了整整 50 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1916~1921 年，从相识到比较熟识，这是他们关系的第一阶段。

刘少奇生于 1898 年，比毛泽东小五岁，湖南宁乡人。

毛是湖南湘潭人，他们一个在长沙西，一个在长沙南，相距百里。

1916 年，当时刘少奇叫刘渭黄，到长沙求学，通过何叔衡认识了毛泽东。1917 年冬报考湖南讲武堂，改名刘少奇。1918 年，刘少奇申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对他加深了印象。1920 年，刘少奇从保定留法预备班倒上海参加留俄学习的工读辅导团。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个“真同志”（这是毛泽东当时对社会主义革命青年的称赞）。1921 年秋，刘少奇与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起去苏联学习，毛泽东对刘少奇有较深的印象。

1923~1943 年，他们相互在革命实践斗争中有了较多的了解和较深的关系。这是他们关系的第二阶段。

1923 年，刘少奇从苏联回来，经中共湘区书记毛泽东安排，与李立三一起在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去安源七次，刘少奇的工作和才干，深为毛泽东赏识。

这以后，毛泽东主要搞农民运动、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刘少奇主要搞职工运动。1932 年冬，刘进入中央苏区，曾担任过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刘少奇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1935 年冬天以后，刘少奇先在华北，后到华中主持工作，在创建和扩大华北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卓越成绩，为全党所公认，也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所赞赏。

1941 年 9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毛泽东是中央苏区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他还说，有些被错误路线领导人所错批核压制使用的干部，应当提升起来，委以重任。人们当时认为，陈云主要指的刘少奇。不久刘少奇被调回中央工作，这当然也是毛泽东的主张。

第三阶段是 1943~1953 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泽东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毛泽东开始对刘少奇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少奇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了他以后的命运。

1943 年初，刘少奇回到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热烈欢迎。3 月，党中央机构调整，刘少奇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帮助毛泽东处理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当时中央分别成立了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担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担任组织委员会书记，分工管理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刘少奇实际上成为党内第二把手，

毛泽东的主要助手。毛泽东曾多次赞扬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1945 年"七大"会上，刘少奇作修改党章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从此，党内公认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1947 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等留在陕北指挥解放战争，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委员会，转移到河北，指导各解放区的工作。1948 年，党中央转移到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刘少奇依然协助毛泽东处理党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

这期间，毛泽东十分倚重刘少奇的同时，开始对刘少奇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刘少奇日益不满。

引起毛泽东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怎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 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 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泽东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置"。

他不止一次对高岗讲这些看法，高岗由此认定毛泽东对刘少奇这个接班人不满意。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吧。

1953 年财经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接着又打算通过组织路线的整顿来清除刘少奇的影响。但是，他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转而强调团结。

此后，1954~1964 年，是毛刘关系的第四阶段。毛泽东与刘少奇貌合神离，一方面维持与刘少奇团结合作的局面，一方面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积蓄力量。

1964~1969 年，毛刘最后决裂。1964 年，毛泽东提出警惕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先后发动了"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公开号召"炮打司令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刘少奇作为"叛徒、工贼、内奸、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开除党籍，放逐开封，致其含冤去世。这是他们长期交往的第五阶段，是个无情无义的悲惨结局。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毛泽东看好。毛泽东认为高岗对他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少奇右倾，"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岗却打架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原版田。而高岗则由于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心目中，把高岗看成毛泽东的"心腹"。

从 1935~1953 年，从山西到北京，毛泽东对高岗一向很器重，一手提拔。毛泽东曾说过，高岗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创建的陕北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那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外来户"必须依靠高岗这个本地的领袖人物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高岗在毛泽东的领导扶持下，把陕甘宁建成全国的模范根据地，自己也随之成熟起来，并被誉为"西北人民的领袖"。后来，毛泽东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 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

是派周恩来去的）；6 月，苏共发生“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岗备受毛泽东的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如邓小平所说的“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在中国共产党创业的众多草莽英雄中，毛泽东对高岗情有独钟，除了由于高岗对毛泽东特别信赖和忠诚，以及他的才智与功绩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毛泽东和高岗又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

他们都是生长在中国农村（虽然一个是富农家庭，一个是贫农）封建落后、贫穷的环境中，受着传统的农民造反打天下的思想熏陶。高岗的故乡也是闯王李自成的故乡，【注 5 高岗的故乡武家坡与李自成的故乡李继迁寨相距仅 25 华里，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1914 年设横山县后，二者同属横山县。】他受的影响可能更多些。他们都只读过师范学校，都因为参加学潮而被学校除名。在投身革命以后，他们都坚持农民武装斗争，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们一个江西井冈山，一个在陕北桥山，创建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且取得很大的发展；他们都曾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击和迫害，毛泽东失去权位，高岗差一点丢了性命。多亏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高岗才得以再生，并逐步显露出自己的才智，成长为中共的高级领导干部。没有毛泽东救高岗于危难，没有毛泽东后来对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与扶持，就没有今日之高岗。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没有陕北根据地和后来的陕甘宁边区，便没有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也就没有以后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没有夺取全国胜利的辉煌。正因为有了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高岗对毛泽东感恩载德，视毛泽东为救命恩人、朋友、导师，对他无限崇敬信赖，步步紧跟，誓死效命。他把毛泽东对他的信任，不仅仅看作一种殊荣，更是一种鼓励，一种责任，他要报答毛泽东的知遇之恩。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泽东远非高岗所能比。毛泽东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奇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他从一开始就跻身于革命领导人物之列，有深厚的理论造诣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当高岗还在陕北的梢林里拼搏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党内一位出色的军事指挥家和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泽东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有细心地观察、考验他们，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少奇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这种多疑心态，早在延安时期就表现出来了，到晚年则更甚。在延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一位从白区来的同志时，他私下对高岗说，谁知道他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是真共产党，还是假共产党？还有一次迎接潘汉年时，他也说过类似的话。1937 年 11 月，他看到陈云和王明、康生一起乘飞机从苏联回延安，便疑心陈云与王明是一条线上的……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泽东深信不疑，对其他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泽东一开始相识，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不同于朱德、林彪、彭德怀，又不同于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都是毛泽东的同辈人，是一起跌爬滚打出来的战友。他们可以称毛泽东为“老毛”，和他一起讲经论道，当面顶撞，争个面红耳赤。而高岗却不能，也不敢。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他们两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高岗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对该国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表现在对他的使用方面，更表现在他们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毛泽东喜欢这个“猴气十足”的“陕北王”，因为他自己也有许多“猴气”，他们有不少共同语言。他把高岗当作一员爱将，一个开路先锋，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毛泽东道路”的样板。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要依靠高岗来实现在“八大”之前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战略部署。

高岗到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毛泽东见面，颇多交谈。毛泽东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泽东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左右摇摆，不怎么稳；

少奇要架空他毛泽东，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人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惊。后来他对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时说，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1953年5月，毛泽东就此事两次批评刘少奇、杨尚昆：“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要求“检查自去年8月1日至今年5月5日用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是否有及有多少未经我看过的”，“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注6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激怒之情溢于言表。高岗因此认为，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进行封锁，要架空毛主席；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泽东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国书等事务）。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中央分为一线、二线问题，无论从他想摆脱繁缛国务，还是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

1953年2月，毛泽东提出对党中央书记处所属的办公机构进行调整，并委托刘少奇考虑一个方案。

斯大林逝世后，刘少奇等人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影响太大了，中国共产党要防止个人崇拜，要加强集体领导，并且提出相应的组织措施；党中央设总书记，或增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部长集体办公制；国家实行部长会议或议会制。刘少奇并提出书记处分工负责人名单征求意见。

对于一再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毛泽东来说，刘少奇的主张和措施显然不合时宜，不能接受。他批评有人搞分散主义，说“只有西花厅，哪有颐年堂”，认为政府系统有脱离中央领导的危险，着即撤销政府系统的总党委（周恩来任书记）。同时严厉批评刘少奇、杨尚昆不经过他就擅自发中央文电。

所有这一切，都使高岗明白无误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刘少奇很不满意。但是，他在传播毛泽东的这些话时加以发挥说，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当“什维尔尼克”（苏联苏维埃代表主席团的秘书）。后来在揭批高岗时，有人说他“伪造毛主席的话”。他承认“当什维尔尼克”这句话是“造谣”，但不承认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和“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这些话是造谣。

其实，毛泽东的话虽然不是这样说的，但要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的意思是明确的。历史后来证明了这一点，1959年，他真的把国家主席的位子让给了刘少奇。

（四）绝密任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交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泽东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离开毛泽东，直接到陈云那里，吧事情告诉他，并谈了自己的看法：看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刘少奇的革命品质发生了怀疑。这可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呀。他由此认为，刘少奇是党内的“危险人物”。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再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

然而，这种想法一经产生，就再也无法抹去。他要为党和国家，为毛泽东办一件大好事，帮助毛泽东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至于谁来接替刘少奇，他并没有想那么多，正如他在反省时所说：“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这就是高岗在 1953 年财经会议前后才开始进行反刘活动的重要原因。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泽东送交了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 14 年后，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1953 年春夏，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万一我不在了，怎么办？”这话，他对高岗说过，也对其他人说过。

在高岗经常接触，并能与之深谈的领导干部中，陈云是他特别信赖的一个。他曾说：“我把陈云当圣人。”

他与陈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1938 年春，高岗出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时，陈云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在配备干部方面被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很大的支持，因此高岗对陈云有较好的印象。后来，陈云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当副主任，作了很多工作，也得到高岗的赞赏。他认为陈云很有才干，不计名位，是个难得的好干部。到了东北以后，他们的关系更为亲密，陈云任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高岗任副书记。军区司令员，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很出色。

在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中，陈云全力支持林彪、高岗、黄克诚等人的意见。通过那场争论和建立北满根据地的工作，高岗更加认为陈云很有水平，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信赖备至。1946 年 5 月，他与林彪、罗荣桓三人一起向党中央建议，力举陈云出任东北局副书记。此后，凡遇重大问题，他总愿意向陈云请教。

到中央工作以后，高岗与陈云几乎每天见面或通电话，随时向陈云通报情况，交流看法，得到陈云的支持和鼓励。这次，高岗也赶紧把毛泽东的担忧及自己对设总书记等问题的看法告诉陈云。

陈云说：“设总书记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

高岗拍一下大腿：“对，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治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泽东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

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泽东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这些谈话，借以说明他的确没有要篡党夺权的野心。

陈云的说法是，高岗“有野心”，“进行非组织活动”；为了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了“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

周总理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死无对证了。

历史事实是：1956 年，中共“八大”确实增设了几个副主席，陈云果然入选党的副主席（当选的几位副主席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是邓小平），林彪于 1958 年 5 月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历史的巧合呢，或者原本就是毛泽东的意思呢？

（六）一次失败的谈话

这些事情加在一起，更使高岗认为刘少奇“不怎么样”。有一次他对毛泽东说到不少人对刘有意见，毛泽东说：“少奇同志是老实人，你对他有意见，可以找他当面谈，不要背后议论。别人讲，你要制止。

但他没有和刘少奇谈。当刘少奇来找他谈时，他也采取躲避、敷衍的态度。

那是一个黄昏时分，李力群接到王光美的电话：“少奇同志要来看望高主席！”不一会儿，警卫室便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说刘少奇已经出发了。

当时高岗正在楼下会客室看电影，听说刘少奇要来，即匆匆乘车离去。秘书只得赶忙道门口迎接。

那天正好下着濛濛小雨，秘书告诉刘少奇：“高主席已到你那里去了。”

刘少奇说：“不要紧，我在这里等他。“于是便在客厅里坐下。

过了一会儿，高岗从外面回来，两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据高岗事后说，刘少奇没有什么自我批评，更多的是解释。

这次谈话没有好效果。

（七）“有薄无林”的名单

关于名单问题，许多书刊炒得很热，也很离奇。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1953 年 3 月，刘少奇曾起草一个中央各部门领导人员分工的名单，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有意试探他，这个名单只是安排人员，没有新意，不解决实际问题。高岗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刘少奇，也报告了毛主席。

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个名单，而是 1953 年 4 月间，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拟的一个“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高岗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单的？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 1953 年 4 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送，由秘书签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泽东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

这个名单如何到了毛泽东的手里？传说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毛泽东的。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认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定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他以为毛泽东一定还会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所以在遇到朱德和邓子恢时，便问他们是否看到这个名单？令他惊讶的是，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后来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安子文说："你一个组织部的副部长，有什么资格拟定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安子文承认错误，作了检讨。毛泽东没有深追，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

高岗出事后，有人说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搞的，并且事先看过，也告诉了饶漱石（言下之意，高岗是贼喊抓贼）。还说安子文拟的名单中，其实是有林彪的，所谓"有薄无林"，完全是高岗造谣，是别有用心。

这个名单是高岗授意的吗？

首先，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毛泽东即使有改组中央政治局的打算，也只能是在党中央少数人中间议论的极为机密的事情，他首先应当与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刘少奇商量。而考虑中央领导机构的人选问题，本不归高岗管，但他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毛泽东征求他的意见也是正常的。

高岗主管计划和工业工作，与组织人事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与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副部长安子文，都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高岗与安子文虽然是陕北同乡，但是他很清楚，安子文是刘少奇的老部下，在思想上。感情上都有相当的距离。无论从工作上还是从私人关系上说，他都不可能向安子文透露这类消息，更不会向他"传达"所谓"毛泽东要改组政治局"如此极为机密的讯息，或"授意"他搞这个名单。相反，刘少奇无论从工作关系还是从各人关系上来说，向安子文透露这一讯息，或是布置这类任务，都是顺理成章的。

其次，从名单的内容来看，如果这个名单真是高岗让安子文搞的，如果真是安子文事先给高岗看过，那么，高岗怎么会同意这样一个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的名单呢？那应该是一个有很多"高岗亲信"的名单才是。

其实，安子文在检讨时根本没有提到是谁向他传达的讯息，也根本没有提到事先给谁看过这个名单。安子文当然知道，这样一份极为机密的名单，在送交党中央、毛泽东之前，绝不允许传出去或事先送给某人看。他确实根本无权自己搞这个名单，难怪毛泽东对此很生气，严厉批评了他。但毛泽东为什么不深追这名单的授意者呢？其实他心里很明白，不便说穿罢了。

名单中究竟有没有林彪？

有些书刊肯定地说，名单中有林彪，而且很具体地说，安子文把名单分为两组，一组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是：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 7 张聿温：《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第 128 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名单的一组里，既有中南局第一书记林彪的名字，又有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的名字。如果这个名单真是安子文所拟，那么，列入两位中南局书记，显然不合适。

为什么会这样?林彪从 1950 年起就因病休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工作一直由第二书记邓子恢代理主持。1953 年 3、4 月间，安子文拟定这个名单时，自然而然地写上邓子恢的名字作为中南局书记，而没有写上已休养三年的林彪，是完全可能的。高岗当时所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名单——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

然而，这个名单后来被某些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加进了林彪的名字，不料却又露出破绽。

名单扩散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很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泽东谈，也没有在中央的小会上谈，更没有找刘少奇谈。尤其是"有薄无

林”这个问题，更是有关向毛泽东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他在检讨时说：“问题是，应该马上给毛主席讲，却没有讲，真是天大的错误。认为书记处不能解决问题，彭真搞政府党组书记，习仲勋搞文委，邓子恢农业，安子文组织，刘澜涛财经，饶漱石管工青。我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是安插人。政治局名单和中央各部委的分工，我认为是少奇同志搞试探，认为少奇在政治上没有新的东西，现在抓组织。而我把这些看法和一些信得过的同志谈了，我和陈云同志谈过。”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泽东“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泽东对他的怀疑和警惕。

1953 年 11 月，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向毛泽东问起“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非常惊讶，也很生气：“你们从哪里知道的？”

后来在中央的小会上，毛主席追查此事，没有人承认。毛泽东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小会上查清楚！”高岗心里明白，是他在广州时泄露出去的。但是，他没想到毛泽东会如此重视、如此生气，所以他不敢承认。这更激怒了毛泽东，认为有人对他阳奉阴违，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

会议结束时，毛泽东把高岗单独留下，强压怒火，和颜悦色地笑问：“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

高岗很紧张，还是没有勇气当面认错，只含混地说：“饶漱石？恐怕不会吧？”

其实，毛泽东心如明镜，而高岗却一错再错，并且一次又一次失去认错、改错的机会，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不能自拔的深渊。

毛泽东如此重视这件事，不仅是因为高岗不听招呼，违犯了纪律，他怀疑高岗还背着他散布了别的言论，怀疑他到广州与某些军界人物进行了“串连”。而高岗的吞吞吐吐，更加深了他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

二、自铸大错

高岗沉浸在毛泽东对他的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了毛泽东的明言与暗示，有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少奇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少奇“挪位子”、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泽东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经验，心甘情愿但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泽东尽忠尽力，除去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毛泽东对他的知遇之恩，是为党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泽东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他没有看到当时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安定团结；也错估了力量对比，既过高估计自己，又过低估计对手；没有相应的对策，更没有想到一旦失利，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如何应付。他盲目地沉浸在一片赞扬和吹捧声中，对财经会议后政治形势发生的细微征候毫无觉察。他也没有认真对待那些不利于他的流言蜚语，反而很得意。殊不知有人正在暗中收集他的“反刘言行”和“另有司令部”的材料，准备对他进行反击呢。总之，他犯了兵家大忌，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泽东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毛泽东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泽东的“天机”，打乱了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造谣污蔑”、“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他就是这样盲目乐观，错估形势，轻举妄动，犹如盲人骑瞎马，结果一头栽下马去，跌下悬崖，落得身败名裂，丢了性命。

三、财经会议

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工作会议期间发生的所谓“批薄射刘”风波，至今一直被说成是高岗为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而故意挑起的。

果真如此吗？不!

制造这种舆论的人，恐怕连自己也不会相信，高岗又那么大的能量，足以操纵会议的进程么？就算他高岗确实有意“杀偏凤”，还有毛泽东掌舵嘛。散布这样的舆论，把毛泽东至于何地？

其实，只要认真回顾一下这次会议进程，就不难看出，会议始终是按着毛泽东确定的路子进行的。

（一）毛泽东谈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按照原定计划，财经会议的议题是讨论财经工作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等问题。【注 8 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216叶。“1953年6日毛泽东关于全国财政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给陈云等同志的信：陈云、一波、富春同志：五月廿日开始的财政会议，应讨论些什么问题，请你们考虑一些，并在发开会通知中写进去，使各地有所准备。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杨立三应参加），均应有讨论，除由你们对每项问题准备方案外，各大区财委最好能在本月中旬召开一次财政会议，收集意见带来（已闻者如西南当然不要召开）。”】但由于毛泽东在会议之初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使这次会议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会议。

在毛泽东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前，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的理解各有不同，党中央内部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设想，就已经产生了意见分歧。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建国方针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没有说明“恢复和发展生产”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说明两个“转变”从何时开始，怎样实现。

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再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阶段。他在1951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会会议的讲话明确表达了他的 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6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说：“我们必须努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使中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社会主义，我们不仅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此，“保存富农经济是一种长期的政策”;“工农业过早的国有化，集体化，是违背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违反进步的，是反动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与这些思想相一致的具体主张是：在农村允许“四大自由”；城市实行“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新税制等。

毛泽东的设想完全不同。他认为，从中国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1952年，当工业化的蓝图即将付诸实施时，毛泽东提出，全党全国必须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要有一个纲领指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那就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

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思逐步成熟，明确提出，用 10 年~15年的时间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几年以后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

对于大多数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些甚至根本不懂马列主义，而又急于过上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来说，毛泽东的设想极具吸引力，绝对受欢迎。

高岗就是毛泽东这一设想最热心的拥护者和实践者这一。无论他在东北率先推行农业合作化也好，实行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方针也好，或是对私人工商业实行改造的政策

也好，无一不是在毛泽东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刘少奇的主张格格不入，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如果这种认识上的意见分歧也可以称之为“反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与其说高岗反对刘少奇是为了“篡党夺权”，不如说他是在极力捍卫毛泽东的建国思想。毛泽东说：对于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要推着他，拉着他走。高岗就是要帮助毛泽东去推、去拉，去实现毛泽东的意愿。

1953 年 6 月 15 日，财经会议开幕后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京参加财经会议的各大区负责人列席。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指出，这条总路线是“引导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灯塔”、他从批判新税制入手，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人“离开总路线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注 9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1 页。】从而打响了“批薄射刘”的第一枪，并把他与刘少奇的分歧公诸于全党面前。

毛泽东这次讲话的部分内容，已在毛选第五卷发表。【注 10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1 页。】下面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供读者参考。

过渡时期党的任务：

过渡时期是共和国成立至社会主义基本完成，时间 10~15 年或更多的时间。少奇第一次讲，资产阶级寿命 30 年，现在看来，大约 10~15 年。

过渡时期的任务，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工业化，工业比重超过农业，实现工业改造。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人口世界第一，但汽车、拖拉机、飞机、坦克，一辆都不能造，非常落后。现在究竟工农比重多大？是否达到 28%？尚值得怀疑。解放以来增加了一些。但工业化总要达到 70%才行。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还不能出拖拉机，七年后才能出 19000 辆。此外还有对资本主义的改造。过渡时期究竟要多长时间，还得几年考验。

概括地说，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在 10-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注 11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与总任务，正式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9 页。】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要脱离这个原则，否则不犯“左”倾的错误，即犯右倾的错误。

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的错误。“左”的毛病是在基本建设、私人资本工商业等方面均有急躁情绪。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的错误。

右的错误，第一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每天均在变动，如何确立？每天均发生社会主义因素，很难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如商业公私比重不断变化，今年下半年“立”，明年就不“确”了。变动时期的斗争是激烈的、深刻的，按其性质说毕过去用枪炮还深刻。因为过去用枪炮只是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现在是彻底埋葬一切剥削制度的决战。第二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虽无大错，但不明确、不妥当。年年走向，一直到 15 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第三是“确保私有财产”。因为农村有些人怕冒尖，就提出这个口号，是不对的。

恰当的提法是：“由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提逐步过渡容易理解，手工艺亦如此。初步目标是基本上过渡，方法是逐步的办法。如何逐步过渡，对农业、手工业的概念容易了解。资本主义如何过渡？——社会主义因素可以逐年增长，不是几年不变，到了

一定时期大变。即资本主义企业中社会主义因素逐年增长商业每年攻，挤掉一些，使商业资本家走向工业，其店员由我们收容就业；对私人工业，两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是增长的形式，特别是公私合营形式，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合作商业逐年增长。明年对大的私人企业要派干部直接抓。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学理论。我党的路线，基本上就是联共党史第九章的路线。

关于资产阶级改造问题，毛泽东说：

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以教育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有三部分，一是拖进来的，一是被打进来的，一是直接要求进来的）。基本部分，民主人士，是可以教育的，应该肯定。

中国资本主义是产生在半殖民地，革命胜利前是反帝的，现在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下，受其领导并受个人监督的资本主义，即是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还有其很大的作用，需要与之联盟。但如不与之斗争，领导它，资本主义就会泛滥。对中国的资本主义，不能用没收的办法，即使对帝国主义资本也不能一律没收。中国的资本主义有可能逐步改造，直到消灭它。

对资产阶级，不看作是敌对阶级是错误的，但不承认其可以改造也是错误的，对反革命阶级都可以改造，对资产阶级也可以改造。但不是必须用强迫的办法，几年社会主义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率大为提高，生产力发展的事实，正给资本主义树立榜样，使资本家愿意向这方面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业与商业的处理与改造是不相同的，对工业如上所述；对商业，教育资方，加强店员工作是必要的，但是要挤掉它。

资本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小生产者，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

对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要有所解释，不同于大体相同之处。在此原则下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不是相等。兼顾。两利，目的在于消灭资产阶级。

“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是公私比较幼不同，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一为高级，一为低级；一是领导，一是被领导。二者完全相同是不可能的，基本上作到私营企业与国营企业相同是可能的，必须的如果忘记这种可能，认为不可能，就是没有看到我们党的领导，把工人阶级分为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两部分，一部分是光荣的，一部分是倒霉的。私营企业如不与国营企业一样增产节约，工人福利就会没有，党也将分裂为两个。私人资本主义的数量其中工人店员 380 万人是不可忽视的(国营 420 万)。目前我们还有许多东西不能制造，如果此时想发野心，一脚踢开资本主义是冒险的，不对的。我们采取逐步改造政策，正是便于我们集中力量于重工业建设。

政治上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统一领导，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

这个问题，应集中在中央及各级党委领导，日常工作归统战部。

接着，他批评了新税制：

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

（二）批薄射刘

毛泽东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批评刘少奇。

这个讲话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以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一波，而且联系到刘少奇。于是，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开始，只是在领导小组对新税制进行批判。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领导小组会议出现的

“批薄射刘”倾向后，毛泽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加了一把油。周恩来在 1953 年 7 月 12 日写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事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召开桌面上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注 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240 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于是，薄一波不仅成了“桌面上的斗争”的目标，而且要“从思想、政策、组织、作风上”说清楚。如此一来，更大范围的“批薄射刘”也就不可避免。从 1953 年 7 月 13 日到 8 月 1 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两次检讨都难以过关

（三）高岗的发言

会议期间，高岗又两次发言，一次是 1953 年 6 月下旬作了关于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一次是批评薄一波的发言，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观点。

高岗对自己的发言是比较谨慎的。他不仅对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说过，东北的发言要谦虚谨慎，要多听听其他地区同志的意见，而且自己的发言稿也是经过几个人认真讨论研究后写出来的。相比之下，有些人发言用词之尖锐激烈，上纲之高，远胜于高岗，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

高岗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把安志文、马洪、张玺等人召集在一起，提出：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理论上对右倾思想进行批判，要批深批透。几个人讨论研究以后，又分头查找资料，最后由马洪执笔写出发言稿。其中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思想时，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言论加以批评；也引用了毛泽东著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一些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早民众运动……”【注 13《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 1966 年，第 512 页。】

高岗的发言稿，毛泽东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凡提到薄一波的“个人主义”之处，都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高岗原稿的提法更高了。

周恩来也看过这个发言稿，没有提出异议。刘少奇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以后，要求和他谈一次。有人说他没谈，但高岗说他与刘谈了，并说刘承认了错误。究竟如何笔者已无可考。

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主席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周总理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后来，有人说高岗的发言是“鼓吹枪杆子造党”，是“制造军党论”。高岗自己则说：“‘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类话，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的发言中，我讲过。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有关内容。”

也有人说，高岗在会上跳得特别高，反刘特别起劲，以此说明高岗为了“篡党夺权”而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是其重要的“阴谋活动”。其实，“批薄射刘”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谁不踊跃响应？以高岗历来对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以其思想观点与毛泽东相一致的情况而言，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高岗明白，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贯彻总路线最大的障碍。而薄一波的新税制等错误，不过是揭开刘少奇“盖子”的一个导火线而已。他对薄一波主要是在工作方面有一些具体意见。他在反省时承认：“财经会议，批评一波，是指桑骂槐。”

会议后期，毛泽东问他：“你看薄一波的错误是什么性质？”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党内性质”。

毛泽东说“好!”

后来毛泽东在 1953 年 8 月 12 日的大会上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工作中的政策性的错误”。而在会议开始时，他曾说过薄一波的新税制是“路线错误”。

（四）“批薄另有后台”？

会议的进展令一些人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涉及党的总路线，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无论是被批的还是被“射”的，都不便公开对抗；加之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明里暗里便传出一些与高岗相关的流言。这些流言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却也颇多似是而非。

那么，会议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高岗突然赴苏

财经会议前夕，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要求派人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

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

他兴冲冲地对赵家梁说：“你准备一下，咱们到苏联去!”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临行时得到中央通知，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与他同行。他指的抱歉地对赵说：“没关系，这次去不成，以后还有机会。”

这既是对秘书，也是对他自己的宽心话。然而，今后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这样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对苏共方面来说，派两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同去，足以表明高岗是代表毛泽东前去的，表明中共中央对这件事够重视、够规格、够隆重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不那么放心，派两个“自己人‘陪同前往，以便更好地观察其 在苏联的言行，了解苏共的意图。即使当时毛泽东还未必对高岗有所怀疑，这至少不失为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表明上无所谓，但内心却感到尴尬不安，他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微妙。临上飞机时，他私下对赵家梁流露：这次恐怕有人要把我搞掉。他也对李力群:“这次为什么要我去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当时，高岗正如日中天，何以会有如此的危机心态？他虽然未必怀疑毛泽东，但至少已感到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威胁。

由于这次紧急任务，他甚至没来得及参加 1953 年 6 月 15 日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他完全知道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思想，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借批薄一波而达到批刘少奇的目的。

2、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作了汇报：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紧急通报，并上交了有关文件。这是当时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动。

高岗突然赴苏，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一些好奇者纷纷到他家里来打探事件的内幕。还有一些地方首脑，特别关心自己地区在五年计划中占有多少份额；一些为能参加会议的人像了解会议的情况，也纷纷前来探询。而那些高岗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也乘开会之机前来探望……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高岗家的宾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高岗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丝毫没有察觉其中潜在的危机。他们很自然地在一起议论会议的情况，议论薄一波，也议论刘少奇。期间，他向一些人散布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安子文拟定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也散布了毛泽东要让刘少奇“挪挪位子”的打算，说让刘去当“什维尔尼克”等等。如果正赶上用餐时间，而大家又谈兴正浓的话，他也会留他们一起吃顿便饭。显然，高岗这样随便扩散中央内部情况，尤其是对刘少奇的非议，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应当受到批评。但是是否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在搞阴谋活动呢？

3、集体探望林彪

林彪作为计委委员和中南局书记。华中行政委员会主席，因病没有参加财经会议，当时正在北京西山休养。

军队的一些负责人想乘此开会之机去看望他，叙叙别情，也想听听他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和财经会议的看法。那几天，高岗让赵家梁替他参加会议，自己到会议代表驻地北京饭店和大家联系，相邀一同前往。那天，除个别大区外，几个大区和军队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总共去了二、三十人。

在那个年代，一切活动都会被加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何况这些非常之人（众多高级将领），在非常之时（正值“批薄射刘”高潮，又刚刚发生“有薄无林”名单的事），举行这样的大聚会，怎能不引人注目？当时就有传言说，这是向刘少奇等人示威：你们不是搞“有薄无林”吗？我们偏要如此看重林彪。后来高岗在反省时承认确有这种想法。

他们在林彪家里都议论些什么？我们不得知其详。事后，参与探望林彪的王鹤寿曾对别人说：“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

怎么大的活动，高岗事先是否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是否报告？有人说，高岗与部队领导人的频繁接触，特别是他这次与众多高级将领的集体行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因而引起毛泽东对高岗，甚至对林彪和一些高级将领的猜疑和高度警觉：他们背着我搞什么名堂？但也有人说，这正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甚至得到他首肯或授意。事实究竟如何？即使当时毛泽东真的不知道，高岗出事以后，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也会有人揭发。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竟无一人提及此事？

这些现象引起某些人的特别关注，一时间流言四起，说什么“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

这些流言，丝毫没有动摇毛泽东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注 14 张明远回忆材料。】

显然，他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

但批薄一波容易，批刘少奇难。毛泽东感到了重重阻力。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最后以刘少奇作检讨而暂时告一段落。

（五）批判还要继续

1953 年 8 月 9 日，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总结作了多处重要修改：【注 15 以下四点修改内容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第 245 页。黑体为原文所有。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89 页。】

1、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他指出：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 1949 年 3 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认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2、关于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问题，他补充：

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

3、关于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作了以下修改：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好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

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

4、关于薄一波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指出：

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此外，他还补充道：薄一波同志……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黑体字尾毛主席所加）

1953 年 8 月 11 日，在怀仁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不仅检讨了“天津讲话”等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错误，还说关于过早地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提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关于土改说了过“左”的话，等等。总之，他表示接受批评。

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

1953 年 8 月 12 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⒃[⒃《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0 页。]

说到对薄一波的批判，他说：

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注 17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1、92、94 页。】

他认为：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注 18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1 页。】

因此，他要求：

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 19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1~94 页】

正是高级他的这些意见，后来在全国开展了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群众运动，把原来是党内的，甚至在中央领导人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全民的大辩论。他还讲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

展，全国有许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注 20《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4~96 页】

直到 1953 年 11 月 4 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的重要意义：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 7、8 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 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注 2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16 页。】

所以这些都说明，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他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

（六）毛泽东接见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的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以下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注 22 以下谈话要点引自张明远回忆材料。】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有人操纵，与中央唱对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地区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又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是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政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说罢，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高岗说：“不会吧？”张明远没有回答。

其实，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怎么放心，怀疑人家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在延安如此，建国后，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更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今，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但他认为这些流言反映了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的情绪，令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明知高岗嘴巴不牢，却故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高岗，既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也想进一步观察军队的反映。

果然，高岗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非常兴奋。离开毛泽东后，直奔陈云家去通报情况，议论一番。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布过。”

这就是高岗后来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的“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并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实这谬论的发明权不是他，最先传播的也不是他。他不过是捡了别人的东西，加以宣扬罢了。

正是由于高岗坚信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

收兵”很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在财经会议以后，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而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后来已经更弦易辙。

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政治局会议，并以此说明他有政治野心。

事实是怎样的呢？

1953 年 9 月，财政上已出现了 40~50 亿元的赤字，怎么办？财经会议结束后不到一周，怎样政治局即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高岗介绍了东北的经验，说过去东北也曾出现财政困难，后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但克服了困难，还增加了收入。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东北的经验值得认真研究，下次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下次就到高岗那里去开会，统统都去，我也去。”

在一片赞同声中，大家说：“谈具体事，主席就不必去了，不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饶漱石等在内的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来高岗家开会，计委有一部分局长参加，饶漱石等讲了话。高岗没怎么讲话。

会后，由李富春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作为中央正式文件发到全国各地，指导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财政工作本不属于高岗的职权范围，当时邓小平是财政部部长（财经会议后，薄一波被撤销财政部部长职务），而且根据“3.10”决定，财经工作由陈云主管。年度计划出现缺口，自然应由 邓小平和陈云负责解决。毛泽东为什么要提议到高岗家里去开会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而且，计委还查了具体的赤字数。对此，邓小平怎么想？

令人不解的是，在高岗家里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中央会议，并且形成中央文件指导全国的工作。这种做法在党内是没有先例的，也是异乎寻常的。这件事令高岗头脑发热，也引起某些人的许多猜测。

不过在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注意毛泽东的这个提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直到三个多月之后，当毛泽东说高岗家“另有司令部”，而且是“一股地下水”的时候。他纵有千口，也难辨是非了。

五、南方之行

高岗的南方之行，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是毛泽东心目中极为重视的一件“不正常”的事。

在之一节里，笔者将不厌其烦地详述高岗南行的过程，目的就是想与读者一道，随着高岗的足迹，看一看他在南方究竟干了些什么。

紧张繁忙工作，筹建计委，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计划，特别是经过 1953 年 6 月到 9 月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后，高岗打算休假。

陈云问他：“你打算到哪里去呀？”

“还是去大连泡泡海水澡，轻松轻松。唉！这几个月，快把人累死了！”

“我看你不如到南方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去看看嘛。现在林总正在杭州，你可以随便去看看他，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去广州转转，找些人聊聊。”

“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他立即给中央写报告，请求从 1953 年 10 月 3 日至 11 月 2 日，到上海、杭州、广州休假一个月，得到中央批准。

1953 年 10 月 2 日晚上，他参加了关于粮食征购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会上研究决定在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1953 年 10 月 3 日上午十点半，高岗带着他的小女儿和保姆来到前门火车站，随行的有秘书赵家梁、董文彬，计委办公厅主任梅行，以及高岗的卫士长等。

车快要开了，大家进入站台准备上车。忽然，罗瑞卿匆匆赶来，把高岗拉到一边，神情紧张地悄悄说："告诉你，毛主席昨天生病了!"

"什么病？现在怎么样了？"高岗一惊，感到很意外，有些语无伦次。

"不知什么病。他突然昏倒在地上，口吐白沫，好吓人哟！现在稍稍稳定一点。"

"那，我不走了吧？"高岗还是不放心。

"你还是走吧。如果需要你回来，或者毛主席的病情有变化，我再打电话到济南站通知你。"

"那好吧，有什么情况，你马上通知我!"

高岗带着很沉重不安的心情上了南下的专列。火车开动后，他对梅行和赵家梁讲了毛主席生病的消息，明显流露出心情极为不安。直到济南，一路很少说话，也没有睡着。

火车开出不久，张鼎丞来看高岗。张鼎丞是华东局的领导人之一，正准备调到中央工作。他这次是去无锡休养，正好和高岗一路，乘坐在专列后面的一节车厢里。他作为礼节性的拜访，寒暄几句就告辞。当时高岗没心思聊天，就没有挽留，也没有告诉他毛主席生病的消息。

傍晚，专列停靠济南车站，听站长说北京没有电话，高岗才稍稍安心。

晚上 11 点到南京，刚住进招待所，高岗就急忙和罗瑞卿通电话，得知毛主席的病情没有打问题，这才放心。

这件事，高岗始终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十分担心，但是，后来在揭发高岗时，有人却说高岗听说毛主席病重，"非常高兴"，"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

是谁看见他"非常高兴"？又怎知他"以为夺权的机会到了"？当时只有罗瑞卿在场，而且是把高岗拉到一边悄悄说话。那么是他亲眼看到"非常高兴"，亲耳听到高岗告诉他"夺权的机会到了"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们不禁要问：罗瑞卿与高岗是什么关系？高岗既然是搞"阴谋活动"，就该"不露声色"才是。为什么对罗瑞卿却不保密？这只有一种解释，即"罗瑞卿是高岗的同伙"，而且是专门来与高岗"策划"、"乘机夺权"的。这个推论，罗瑞卿肯定反对。

那么，只能是罗瑞卿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见，所谓"非常高兴"和夺权的时机到了"之类，统统都是胡说八道，是造谣陷害。

1953 年 10 月 4 日上午，高岗在招待所楼下的会议室与江苏、南京的领导干部会见，讲了中央关于实现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决定（当时正式文件尚未发下来），并就这个问题与当地领导人交换了意见。接着，参观了中山陵、无梁殿、天王府遗址、玄武湖等名胜古迹和蒋介石的总统府。当天下午去无锡，住在蠡园。

5 日上午，高岗参观梅园、坐小汽轮游览太湖、登鼋头渚，在太湖湖滨小楼梨园午餐。正好肖华也在那里，下午就一起去上海。

在上海，住在高乃依路招待所。当天晚上，到当时上海最高的上海大厦屋顶观看全市夜景，晚饭后又去游"大世界"。6 日上午游城隍庙，下午参加在华东俱乐部举行的舞会。晚饭后在锦江饭店，由当地领导人陈毅、谭震林等招待。饭后去华山路丁香花园看电影。7 日上午去闵行参观机床厂，下午游西郊公园。翌日上午游黄浦江后，下午即去杭州。在上海期间，主要由当时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尧山陪同，梅园与什么负责人深谈，也没有什么会议。　　临离开上海的那天上午，谭震林和陈丕显曾陪着高岗游黄浦江，谈了经济建设问题。

到杭州后，高岗一行住在刘庄，他始终惦记着毛泽东的身体，又打电话询问，得知毛主席已康复，才完全放下心来。

毛泽东此次"重病"，从 10 月 3 日到 7 日，仅仅五天时间，来得突然，去得突然。有些令人费解。他真的得了重病吗？后来有知情人士说，不知道毛泽东生病，更没听说什么"口

吐白沫”的事。那么，罗瑞卿为什么专程匆匆赶来告诉高岗这样的消息呢？

到杭州不久，高岗即去看望正在杭州养病的林彪。他们上次见面是在 1953 年 8 月间，那次去的人较多，谈得也较深。他这次顺便向林彪介绍了政治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两个会议情况。

在杭州期间，他游览了名胜古迹、庙宇庵堂，参观工厂农村，也参加舞会，欣赏戏剧。这期间。李力群因公出差途径杭州住了几天；恰巧东北局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德尊也到杭州来休假，曾看望过高岗一次，并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自始至终陪同活动。

1953 年 10 月 20 日，高岗通知马洪等来杭州向他汇报在上海调查工作的情况。24 日上午，马洪等一行六人来向高岗汇报。不一会儿，一位个子不高的老同志兴冲冲地跑进来，一进门，就旁若无人，很兴奋地嚷道：“高主席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了！”

在座者见汇报不成，都自觉地退到后边的一间小屋子去聊天，只有马洪留下陪他们。

这位老同志就是陈正人。他所说的“盖子揭开”，是指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批评，并联系到刘少奇。他说得眉飞色舞，添油加醋，也散布一些有关安子文和刘少奇的流言。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意见。

后来在揭发高岗时，这位老同志把自己说的话栽到高岗头上，并把这次很平常的工作汇报会说成是“有赵德尊参加”的所谓“杭州八人会议”。

当天中午，中共浙江省委在刘庄宴请高岗；晚上在大会堂举行舞会。11 点左右，高岗等人上了专列，由王芳陪送，前往广州。

25 日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住的小楼就在陶铸的西邻。他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一谈就是两三小时，期间自然会谈到刘少奇的问题。

在广州，高岗受到很热烈、隆重的接待。

26 日，广东省委交际处举行午宴和晚会，当地许多负责干部都去了。午宴十分丰盛，茅台酒、“龙虎斗”，杯觥交错。舞会在露天，秋夜凉爽，花香醉人。

27 日上午，他们乘扫雷艇去虎门，未靠码头，已见两行官兵肃立。刚上岸，鼓乐齐鸣，欢呼骤起。穿行夹道，掌声不绝。高岗当场就劝请停止如此欢迎。午饭在虎门，鸡鸭鱼肉，“大块文章”。傍晚回黄埔，在海军司令部礼堂晚宴，至少 30 来桌；接着举行盛大舞会；极尽热情招待。听说这次招待是叶剑英、谭政等安排的，他们都与高岗有所交谈。

高岗在广州前后不过四天，确实受到十分隆重热烈的接待。他丝毫没有想到，两三个月后，会发生“高饶反党事件”。

1953 年 10 月 29 日，高岗结束了他为期一个月的南方之行，登上了北归的列车。

从广州回北京的路上，高岗在长沙下车，到湖南省委招待所休息。当天，他怀着一片虔诚和崇敬的心情，冒雨去湘潭参观了毛泽东故居。然后去武汉，住军区招待所，李雪峰等前往相见后，由李水清等陪同参观黄石市的工厂和矿山，查看武汉郊区青山的武汉钢铁厂选址。在郑州，住河南省招待所，参观纺织厂工地。邙山大桥选址，和吴芝圃等当地领导干部谈了治理黄河的设想。可见他关心的是各地的经济建设。

读者想必还记得，高岗离京南下时，由于惦记着毛泽东的病情而焦虑不安、忧心忡忡，一路上很少说话的情景。而当他归来时，却是兴致勃勃，心情特别好，不时同赵家梁和梅行聊天、讲笑话，或是谈一些他所想到的重大问题和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在 1953 年 10 月 24 日去广州的路上，虽然白天忙碌了一天，上车时已是夜间 11 点左右，但高岗却毫无倦意，叫赵家梁和梅行到他的包厢里又聊了许久。他谈话的内容广泛，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高岗在杭州的这段日子，赵家梁和梅行主要是在上海搞调研，10 月 20 日才到杭州。而他每天忙于应酬各方面的人和事，一直没有机会和他们交谈。现在只有他们两个在他身边，他更像是随意，又像是早有准备地和他们聊起来。

他的思路似乎还在上午的汇报会上，话题也似乎由此而发，但有超出了汇报的内容。他说：

关于明年（1954 年）的工作，主要抓四项，一是经济建设，二是编写党史，三是选“八大”代表，四是制定宪法、召开人大。他说这是别人提出来的，他觉得不错，是为召开“八大”的准备工作。

说到经济建设，他说：

我们领导经济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可不行。现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农村党员占很大比重，不少老干部也来自农村，他们文化低，缺乏现代科技知识，甚至不懂现代生活方式。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搞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学不行啊！

说到这里，他停顿下来，沉思片刻，笑着问：你们知道崔田夫吧？就是铁道兵的那个崔田民的哥哥，是陕北的农民领袖。抗战前，有一次他到北京汇报工作，北方局安排他住在旅馆里，第二天早上起来，茶房（服务员）送来一杯水，一把小刷刷，一喜爱管“糊糊”。崔田夫心想，那管“糊糊”大概是早点吧，他觉得城里人真怪，这么一点东西，咋能填饱肚子？他把“糊糊”挤出来，咽下肚，凉凉的，有点甜，不好吃！又把水喝下。小刷刷是做啥用的？猜不透。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给他刷牙漱口用的牙膏牙刷。可是他从未见过，从未用过，也没人跟他说过。后来他来到大街上，更是惊诧不已——只见一座座“房子”在马路上跑，跑的可快哩！他想：这北京城咋这么怪哩，房子还会跑?原来那是有轨电车，农村人没见过这“怪物”，还以为是房子在跑呢。他回到陕北，说起这件事，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高岗一边讲，赵家梁和梅行一边跟着笑，笑出了眼泪，笑弯了腰。等他们笑够了，他又接着说：

这些生活上的事情，学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在城里住上一阵就懂了。难学的是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没文化不行，文化低了都不行，那要下苦功夫钻进去才行啊。就说咱们鞍山钢铁厂，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复杂的设备，谁见过？更不要说掌握它了。那年，王鹤寿从鞍山回来讲三大工程建设，讲到轧钢机的地脚螺丝，一、二吨重的东西，上下对孔，摆正水平，不能有分毫差距，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觉得新鲜得很。后来到中央开会时讲给大家听，也都没听过，没见过。像这样的新东西，该学的多着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要学，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建设知识也要学。可是，不提高文化，什么也学不成。你们说是不是？作为经济建设的领导人，更要努力学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成为经济建设的内行。否则，还用过去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来指挥建设是不行的。有些领导同志不懂经济建设，有不学习，只 满足于浮在面上，批批点点，那不行，要掉队，要误事！所以，对党员和老干部的培训工作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定要抓紧，不能拖，要安排到明年的计划中去。

说到这里，他话题一转，说：明年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召开“八大”做好准备。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党的历史，搞一个完整的党史稿子；二是考虑“八大”代表的人选问题。

关于总结党的历史问题，他说：我们党经过了 30 多年的历程，这是个艰难曲折的，然而是胜利光辉的历程，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苏联党曾经搞过几次党史，最后写了个简明教程。我们也应该写出个像样的、反映实际的党史来，内容肯定要比苏联的更丰富。我们“七大”时搞了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只是个片段。我们需要一部完整的党史。不过我们党的斗争历史牵涉到各个方面、各个山头。各个根据地，要写好它，也不容易。这需要做好各个方面的工作，而且一定要做好。总结好党的历史，对统一党的思想、教育全党、全国人民，都是头等大事。

对待我们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前的历史，要有统一的认识，不能把党的历史分切成两大块，一块根据地的历史，一块白区的历史，而应当是统一的革命斗争的历史。实际上，白区斗争在党的全部斗争史中来说是很小很小的部分。把白区斗争和根据地斗争对等起来相提

并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就是根据地的斗争历史，过去只讲南方的斗争，不讲北方的斗争，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有些人一讲到革命斗争，就好像只有南方，北方的革命斗争只是些“痞子”、“流寇”（说到这儿，他有些愤愤不平）。至于白区和根据地的党组织，有相互配合促进的一面，也有互相扯皮促退的一面。比如当年陕北的革命斗争，名义上是北方局领导，实际上北方局只搞城市工作，没有搞农村根据地斗争，甚至相反，对根据地斗争又害无利。1935年，在敌人十几万重兵围剿陕北根据地的紧要关头，北方局先派郭洪涛，后来又派朱理治，到陕北强制推行“左”倾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杀了那么多好同志，把陕北根据地搞得一塌糊涂，险些断送掉！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赶到，及时抢救，后果不堪设想。这些历史情况，大家都知道。上海的中央，主要也是搞城市白区的工作，对于江西苏区的斗争也是害多利少。这个历史没有认真总结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际上主要是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或者说，应该以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为主线；白区工作有成绩，有作用，但作用不大，不能与根据地相提并论。根据地的发展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党领导的人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史。南方是这样，北方也是这样。

他一边抽着烟，一边侃侃而谈，时而停下来深思，时而直视着他们，似乎是想看他们是不是在注意听他讲，又似乎在琢磨他们是不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两个小时，赵家梁打断了他的谈话，说该休息了，到广州还有很多应酬呢。他看看手表，说：好吧，其他问题另找时间再谈。

但是，到广州以后的活动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直到返京的路上才有机会继续未了的话题。

关于党的“八大”代表问题，高岗说，“七大”的时候，毛主席为了照顾各山头，有意把井冈山一军团的人压了下来，让其他军团和地区的人上去。所以，当时一军团只选了林彪一个，其余像邓华、肖华、刘亚楼他们都是年轻有为的师长，虽然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毛主席都把他们压下来了。这是毛主席的伟大之处。现在全国统一了，不能再像“七大”那样。如果再以照顾山头为主，那就会把真正有功的、有本事的人埋没掉。这次“八大”，应该从全国通盘考虑，从实际出发，适当照顾山头。就是要选有功的、有能耐的人上去。除了军队的和原来的老代表以外，还有选一些优秀的新代表上去。比如各省的省委书记（他一一历数了各位书记的名字），他们各有千秋。毛主席经过对他们实际工作成绩的考察，认为比较突出的有这么几个：广东的陶铸、山东的向明、河南的张玺、山西的赖若愚。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原则和思路，我认为在咱们东北的几个省委书记中，比较能干的，突出的是赵德尊和郭峰。尽管有的书记比他们资格老、年龄大。中央各部的部长中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主要是要从工作实际来考察，要通盘考虑，不能光从资格、山头来考虑。

接着，他讲了对一些中央同志的看法，讲得比较多的是对刘少奇的看法。他说：

“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主席的接班人。但后来，毛主席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主席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主席不“合拍”，毛主席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

他说，少奇不那么稳。“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他提出来的。土改时，中央工委的决定由“左”也有“右”，主席在晋绥的讲话纠正了他的错误。富农可以入党的问题，东北顶了他。农业合作化，对山西的批示是右倾的表现。对东北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政策的批评也有问题，东北的情况不同，不能拿全国来套。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总之，“左”“右”摇摆，很不稳。要不是毛主席掌舵，而由少奇掌舵，那是危险的。有些理论性的东西，回北京以后，再好好琢磨琢磨。

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摊摊，主要是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不是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危险的。

高岗在讲毛泽东对刘少奇不那么满意时，带有一种深为忧虑的表情。

显然，他所谈的这些问题都十分重要。这些意见如他所说，是别人提出来，他觉得不错而捡来的，但也都是经过他自己深思熟虑的。他是否同林彪、陶铸等人交换过意见？我们不得而知。

1953 年 11 月 2 日，高岗回到北京，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他的周围已是杀机四伏，一场灭顶之灾正等着他。

高岗的南方之行，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后来他专门派陈云去进行调查。【注 23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陈云年谱》中记载：陈云于 1953 年 12 月，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委托，代表中央专程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并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其中，毛泽东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陈云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六、组织会议

1953 年秋，财经会议之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爆出了所谓的“讨安伐刘”风波，会议后期，毛泽东改变部署，风向陡转。

财经会议开了两个月，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所以，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委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批评讨论，讲清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 24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94 页。】以造成更大的声势。然而，仅有舆论还不够，政治路线确定之后，还要进行组织路线的整顿。

过去，陈云兼任中央组织部的部长，【注 2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第 601 页。】由于他身体不好，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一直由副部长安子文主持。1952 年底，饶漱石接替陈云出任中组部部长。

早在 1953 年 7 月财经会议期间，中央就发出了召开第二次组织会议的通知，要求对中组部的工作进行一次检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在组织工作中的表现，消除其在组织部门的影响，以切实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因此，组织会议必须按照总路线之命的方向进行；检查的内容及方式也要像财经会议那样，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开展“桌面上的斗争”。

（一）张秀山、郭峰发言经过

1953 年 9 月上旬，中组部向各大区组织部发出通知，会议议题为：

1、关于抽调干部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重要厂矿工作问题；

2、关于加强对干部的管理问题；

3、关于审查干部的问题；

4、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此外，还有研究一下关于干部的培训问题。

参加会议的人员为各中央局、分局的组织部长、干部处长、各省市委组织部长。

根据通知要求，东北局决定由组织部长郭峰率团参加会议；因现任干部处长新来不久，不熟悉情况，原干部处长李正亭（已调任东北财经部任副部长）也参加。

在此期间，安子文几次给张秀山（东北局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打电话征求意见。张表示，郭峰会把意见带去，自己就不讲了。

1953 年 9 月 7 日晚，郭峰找张秀山（他正卧病在家）请示对这次会议有何意见，东北怎么发言。

张秀山说：主要是要干部，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东北地区 68 项重点工程所需的干部。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发言要慎重，不要过分尖锐，最好让别的地区先说。

郭峰问：这次会议要检查工作么？

张秀山：会的。

郭又问：若检查工作，有什么问题需要提？

张秀山：我看就是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有人说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前我们党员没有标准，是错误的；另外，使用干部有不当，等等。究竟怎么讲，你到北京以后再到高岗那里去请示一下。

1953 年 9 月 8 日，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主持东北局开会（林枫已去北京，张秀山卧病），讨论去中组部开会所要准备的问题。主要是讨论 68 项重点工程缺少地级干部的解决方案，最后张明远总结。除干部问题外，他还说到，如果检查工作，东北应注意不要骄傲，安子文的错误缺点与薄一波不同，主要是组织工作业务上有些问题，调干部到工业方面晚了些，干部政策（管理）上可能有些问题。并说会议半个月不够，可能延长。

1953 年 9 月 9 日，郭峰到北京，住翠明庄招待所。第二天上午开预备会，领导小组成员有：刘少奇、朱德、饶漱石、李富春、胡乔木、习仲勋、杨尚昆。在去开会的途中，郭峰绕道到高岗处汇报请示。

一见面，高岗很奇怪地问：“你来干什么？”

郭峰：“来开组织工作会议，谈调干部问题。”

高岗哼一声，没说什么。

郭峰：“如果这次要检查工作，我准备对调干部到工业战线晚了些，农村整党中过分强调副作用的问题提提意见。”

高岗说：“不提吧，解决不了问题”，“我看还是不提吧”，“有问题，叫别的地区讲，咱们不讲了，不解决问题。”

关于富农党员的问题，他说毛主席有指示。说着，叫机要秘书董文彬找来文件给郭峰看，其中有中央文件，也有毛主席的电报。主席开始说对发展富农党员要慎重，后来的电报说不发展富农党员。

郭峰一边看文件，一边听高岗说：“开始时秀山同意少奇的意见，和我争吵得很厉害，我说秀山糊涂。后来见到主席的电报，秀山才服气了。”

开完预备会，郭峰又去请示林枫，林枫也说要慎重。

1953 年 9 月 12 日预备会议，安子文说，根据毛主席指示，他个人也要求，检查一下中组部的工作。要各地多作酝酿准备。

会后，安子文说：“你给秀山打电话，再征求一下他和陈伯村的意见。郭峰只好再打电话转达安子文的要求，说如果你不能来京，书面发言也行。

张秀山还是不想谈，说：有些意见过去都谈过了，不谈了。

13 日上午，刘少奇召集会议，进一步明确组织工作会议内容，并指出，第一次组工会是基本正确的，有某些不妥当的提法已纠正，或在此次会上加以纠正。他也谈到要检查工作的问题。

会后，安子文亲自打电话给张秀山，说毛主席有指示，这次会议，中组部要检查过去的工作，要听取各大区的意见。他一再说：“你多年做党的工作，一定要对组织工作提出意见。”

张秀山听说是毛主席的指示，才经过认真考虑，给安子文写了一封信，讲了八条意见。因为是他个人的意见，所以没有经过东北局的讨论，只是给张明远和凯丰看过，他们就个别地方提了点意见。这封信与 9 月下旬发出。

1953 年 9 月 23 日，在领导小组会上，饶漱石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一再指示，对中组部工作上有什么问题，都应坦率提出，摆在桌子上，要召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安子文也再次强调，要各大区认真酝酿，准备对中组部工作提意见。

会后，郭峰向东北地区与会同志作了传达，又给张秀山打电话，除谈到调干部问题及中

央将要调他（郭峰）去中组部工作外，再次请张秀山早日把意见写来。

东北地区与会同志听了传达以后，一致要求认真检查总结经济恢复时期组织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今后建设时期如何进行组织工作。

这期间，郭峰和李正亭到高岗家汇报了会议情况，请示关于几个主要干部调动问题，问他对此次组织会议上检查工作问题有何指示。

高岗说："这件事，中央开会了，毛主席指示，要彻底检查与批判中央组织部的工作，一切都拿到桌面上来。所以不要有任何顾虑，一切要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只要坚持原则，如何风浪也不要怕。"

显然，由于毛主席发了话，高岗的态度也有了转变，但他还是没有多大的信心，又说："你们的发言要认真准备，有把握的就说，没把握的不说；要有根据，不要被人家抓住小辫子。""你们看能展开吗？我看不行，华东。西北大概可以讲讲。关于给工业调干部和厂长制问题，我已和富春同志谈过，要他去会上讲一讲。"他分析说，估计华东、西北可能提意见，华北西南不会提，中南在两可之间。最好由华东和西北来讲。

9 月底，郭峰接到张秀山和陈伯村的书面意见（张秀山提了八条，陈伯村提了四条），让他给高岗看后再转给安子文。

1953 年 10 月 2 日上午，郭峰去高岗家，谈了张秀山的书面意见和安子文要秀山来京参加组织会议，并问：有些已经改正的问题（如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否还提？还有，说薄一波同志有圈圈，纪律等问题，似乎不应当提。

当时高岗正准备南下休假，心不在焉地一边听，一边翻阅着张秀山的书面意见。这时王鹤寿来谈工业计划问题，高岗随手把书面意见递给王鹤寿，并以商量的口气对王说："秀山提的都是大问题，不提吧？叫秀山别提了。"王鹤寿看后也说，有关纪律问题和薄一波有圈子等问题，不应该谈。

郭峰问："秀山提到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问题是有关党的性质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

高岗说："这与在延安起草党章时曾有'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党'的提法之间是有思想联系的。当时我与林彪同志不同意，才改正了。"

郭峰还觉得对富农党员处理问题根据不足，张秀山的信中提到安子文有一封给高岗的信可参看。他便向董文彬要来看了一下。

最后，高岗对郭峰说：秀山的这个意见我就不看了。哪些该讲，哪些不讲，你和鹤寿一起商量吧……你告诉秀山，最好不要谈，我看这次会上展不开，可用大区与会同志名义谈，不要乱扣帽子，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他又对王鹤寿说：你去鞍山路过沈阳时和秀山谈谈，他若是谈，在富农党员问题上也要作自我批评才有说服力。

郭峰随即打电话向张秀山汇报了情况，并说王鹤寿去鞍山路过沈阳时会和他详谈。张秀山说他马上要到北京开粮食会议，他的书面意见暂时不必转给安子文了。

1953 年 10 月 9 日，张秀山到北京，因郭峰正在开会，由李正亭向他简单谈了会议情况。当张秀山得知高岗没有看他的书面意见时说："算了，算了，不写了，当面谈吧。"

1953 年 10 月 10 日召开大会，安子文发言，对八年来的组织工作作了检讨。11、12 日两天分组讨论。

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者对安子文的发言不满意，认为缺乏政策性、思想性。

小组会后，郭峰向张秀山汇报了大家对安子文发言的意见，再次建议他最好不讲；要讲的话，也要少讲些。张秀山表示同意，并说要找安子文谈谈。

1953 年 10 月 13 日晚领导小组讨论大会发言问题时，提到张秀山的发言。饶漱石说：秀山已同我和子文谈过，就不准备在大会上讲了。我已同意秀山不讲了。

刘少奇说：我听子文同志讲，秀山同志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让他在大会上讲讲

嘛。

饶漱石：秀山说他是来开粮食会议的，要赶着回去布置。

刘少奇：不要紧，只要他来讲一个钟头就可以了。不会误了什么。

饶漱石当即让郭峰转告张秀山准备明天发言。但会议结束时饶又对郭说：你不必去了，还是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吧。

当晚七点左右，郭峰去张秀山住处，说领导小组会议决定要你明天发言。在发言前，你是否先找少奇同志谈谈？

这时接到电话，说饶漱石要来，郭即辞出。饶漱石向张秀山传达了领导小组会的意见，让他准备明天再会上发言。

不一会儿，郭峰接到张秀山的电话，说毛主席找他们谈话，马上就得去。

直到夜里 12 点左右，张秀山才回住处，郭峰和赵德尊即去询问情况。

张秀山说：主席找参加粮食会议的部分同志谈粮食问题和农村互助合作问题。会后我向主席请示：说安子文和少奇要参加组工会并发言，问他有什么指示。

主席问：你准备讲些什么？

张秀山谈了自己准备的意见（已由八条压缩成五条）：

1、认为中组部在对于共产党员可否剥削这一重大问题上，曾发生过动摇；

2、在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上，也曾发生过动摇；

3、中组部对检查执行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

4、对保障党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问题。

缺页 162 页、163 页

安子文同志的这些话给东北各省市委组织部长传达后，曾经在部分干部中引起了思想混乱。

2、关于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中央组织部也曾发生过动摇。

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关于党员八条标准的第一条,曾提出“中国革命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会后,各地区及军队中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只是在毛主席亲自批示后,才解决了这一争论。

1950 年 1 月,安子文同志给赴苏组织工作参观团作报告,讲到我们党的成分时说:“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合起来占三分之二,因此,我们党是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的党。”这样就模糊了党的性质。把党的性质与党员成分混为一谈。

以上两项,经毛主席批评批示,均已正确解决,现在只作为经验教训提出,就是说组织部门的同志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党的决议和党章,否则就会犯错误。

3、中央组织部对检查执行二中全会的决议抓得不紧。二中全会曾决定领导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搞生产建设。这是全党的政治任务,也是组织任务。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央组织部抓得不紧,甚至没有以二中全会决议、党的总路线检查各部门、各级党委的工作……因而也就必然使组织工作与政治任务结合得不好,甚至发生脱节的现象。比如党的基层组织在工厂企业内应当如何工作,虽然各地都创造了不少经验,但中央组织部却没有很好的加以研究总结,以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如对厂长制与党委制的争论早就应该作结论的而未作结论。其次,组织工作没有很好地保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也表现在干部的配备、培养和管理上。这几年来,及时地逐步地统一干部管理做得很不够,也未及时地有计划地大批地抽调干部到工厂企业及其他财经部门中去(当然也抽调过一些)。从全国范围看,干部的配备使用有很多不适当的地方,而中央组织部也未能及时作合理的调整。

4、对保障党的组织的严肃性、纯洁性重视不够。对于一些曾经在革命严重关头脱党、退党、叛党而在革命高潮时又回到党内来的分子,以及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

用这些人时,处理得不严肃。如内战时期在黄河岸上杀过红军干部的、做过“双料”特务的以及做过反共活动的分子,现在却担任了我们国家的重要职务,甚至混进了党内。

5、关于安子文同志的思想方法方面,我觉得也是有缺点的。

……安子文同志对接受新事物的迟钝,对党内问题是非不清,即马列主义与非马列主义的界限不清,甚至颠倒。对党内情况、干部情况的了解是用一种静止的观点,而没有以变动的观点来看问题。

安子文同志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延安整风和“七大”阶段。“七大”以来的八年当中,情势已有很大变化……在伟大的革命运动中考验了领导干部。有些同志在战争中、土地改革中、经济恢复和建设中,犯了严重的路线性错误。对这些问题安子文同志是看得不明确的。现在看来,整风以后是出现了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人物,这些同志在整风中背上了包袱,觉得教条主义的人不行,经验主义的人也不行,觉得自己差不多,就自以为是,不采纳别人意见,不和人商量问题,因此在革命斗争中经不起考验,陆续翻了船。党的组织部门应该看到这些问题,应该从运动中来看干部,看组织。如果停留在八年前的观点上看问题,则必然要犯错误。

张秀山讲完之后,在小会议室休息时,刘少奇同志对他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自我批评。”安子文也说张秀山讲的这些问题基本正确。

（三）郭峰的发言

1953 年 10 月 10 日安子文作了关于中央组织工作检讨发言后，东北地区大多数与会同志不满意，认为哪个检讨缺乏政策思想性，不认真。在酝酿与讨论大会发言时，只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主要是说要照顾到中央组织工作历史发展情况，不能要求过高，责备更多。郭峰在准备大会发言时为采纳这个意见。

发言稿写成后，由大区与会同志再度讨论，作了某些辞句修改。1953 年 10 月 14 日下午，张秀山在大会发言后当场看了一下，提出要加上两点，一是对党员八条标准问题提法的意见，一是对整顿基层组织决议中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不妥当提法问题。但郭峰认为似乎没有必要，故两条意见均未加进去。

因为巩固在 1953 年 10 月 3 日就去了南方，他没有看过郭峰的发言稿。

1953 年 10 月 15 日，郭峰在大会上发了言。

张秀山的发言，涉及的都是大问题；郭峰的发言主要是业务方面，其内容大致是：【注 27 1954 年东北高干会议简报。】

安子文同志的个人检讨……从检查过去组织工作方面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检查工作的前提，没有检查的标准，因而也就难于辨别是非，也就必然缺乏思想性、政策性，质量不高。

现在就东北地区小组对安子文同志发言的讨论中所提出的意见，综合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下。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几年来，三次调动干部到新解放城市搞接管，到新区搞土改，接着，又调干部支援抗美援朝的斗争，之后又集中一批力量建立中央机关，并按照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大力地组织与指导了全国范围内的整党建党工作，是有成绩的。但要从保证党的总路线的贯彻及恢复时期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和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上来检查，也即是从党在恢复时期的组织工作任务的执行上去检查，我们认为是有着严重的缺点和某些错误的。主要表现在：

1、从贯彻二中全会决议，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的规定，及时组织力量转入城市工业，为以后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做准备上来检查则做得很差。对于如何从组织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好地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认识不够，研究得很少。中组部对中央有关组织工作方面决议执行情况的检查，贯彻很差。

2、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如何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上，对于二中全会决议精神领会与贯彻不够，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引起的新情况认识不够。例如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的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上，有“中国革命是中国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的错误提法，这显然是对党的工人阶级性质的一种摇摆。又如在同一会议上，没有强调指出当时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将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危险。之后，在对农村整党要求上，也没有及时地提出防止与反对富农思想的影响，直到“三反”、“五反”时期才为中央指出与各地实践所补正。又如在是否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这样的原则问题，子文同志在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是有错误的。又如在党的干部政策掌握与贯彻上，“三反”以前，对任人唯亲，特别是对于只重文化、才能，忽视政治品质的倾向，没有及时地发现与纠正，没有展开必要的斗争。这实质上是一种“右”的观点。

从党的组织建设上来看，也还表现出对于坚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组织原则的严肃性，认真地、有效地贯彻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决议不够；对于认真执行中央历次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与提拔工人干部的指示，对工业老干部的培养提高与关心做得很差。如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议对于警惕和严格防止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富农、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分子混入党内，以保持党的组织的纯洁性方面注意不够。在对待叛变自首分子的审查上，也还不够严肃，使用也有不够妥当的，这自然就增加了领导骨干中的成分不纯。反之，对农村、工厂中党员所存在的问题却估计得很严重，仅仅根据某些地区农村支部的典型调查，就估计农村有 30~4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对工人党员也不适当地估计有 25~30%是不够党员条件者。事实证明农村不够条件者至多不过 10%左右；而工厂中党员不够条件者以旅大为例，至多也只有 4%、5%。为什么对于叛变自首分子却严格不够，而对工人农民成份党员的问题却估计得过于严重呢？这是否仅仅是个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问题？是否与政策思想指导上存在的某些偏差有关？

关于积极地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与大量提拔培养产业工人干部，生长优秀的工业管理人才，以便更有力地保证经济恢复与工业建设任务的完成，这正是党在过渡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组织任务。对此，中央在 1948 年底即有指示，党的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以及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也均有所规定，但作为中央组织部职责上来检查，自 1951 年以来很少看到中央组织部都对这方面工作的系统检查与具体指导。没有认真组织执行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工人党员的精神，仍然只是把整建党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而未转向城市工矿。这样也就大大地影响了工人干部的生长与提高。

3、中央组织部在组织工作的业务指导上，或多或少的存在脱离当前中心任务，而孤立静止的进行工作的现象，对苏联共产党的组织工作经验学习不够的严重缺点。

我们认为中央组织部最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组织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导上，对党的总路线，对恢复时期党的组织工作任务存在着不明确和模糊的地方，甚至有某些“右”的观点。因而对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贯彻就很不够……因而在组织工作业务指导上也就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脱离当前中心任务去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组织工作的现象……再加上个人领导上的“打杂”思想，钻研不够，应该认为这是政治责任心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才是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基本问题。

（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 28 这里暗示所谓 61 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 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 年 10 月 23 日，毛泽东在刘少奇 10 月 22 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 15 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 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第 373 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第 373 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 1953 年 10 月 27 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 1955 年 3 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 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6 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说，毛泽东本打算借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东风"实现他的战略计划，那么：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可以看着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的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个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时收兵，作出重大让步，险些成了败局。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撤销大区，把各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各省市的直接领导；"五马进京"，特别是成立计委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把各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组部任副部长，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中央对中以人民政府系统的领导。这一切都从组织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义状态，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可他没想到，在进行思想政治较量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两大战役"中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表面看来，财经会议的形势很好，但仔细想想，虽然是借批新税制批薄一波，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虽然他们表面拥护总路线，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其实对总路线并不认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戚本禹说过，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之类的流言，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很不

服气吗？他明白，虽然这些流言是针对高岗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对此，他公开给以反击，否认批薄“另有后台”和“两个司令部”之说，强调他就是批薄的“后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

他没料到财经会议竞争了两个月，最后是以高岗受批评，刘少奇作检讨而草草收兵。

组织会议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打算在财经会议批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后，再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从而保障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和张秀山的发言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造成了“讨安伐刘”的局面；而刘少奇的检讨，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这使他陷于被动，以至在会议后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把组织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变成了解决“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决团结问题。

在他看来，什么“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全是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水搅浑，他们把刘少奇推到前面作挡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的。他尽管这样想，但还是顺应形势，转而强调团结，批评饶漱石。

经过两个会议的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办，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我们党就会分成两派，还有什么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将会被搁浅，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将成为泡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联刘除高”

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半年多来，特别是财经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财经会议期间的两种流言，都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说的那个司令部，不用说，是指刘少奇的。那么，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东交民巷八号？都是什么人去了那里？去干什么？他明确一点，就是高岗和军队的人来往频繁，这正常吗？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岗同彭德怀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报告时对高岗大加赞扬，还说抗美援朝胜利的功劳，后勤工作占60%，前方占40%，而后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岗和洪学智）。彭德怀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却令毛泽东非常反感：什么话！难道党中央就没有功劳？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负责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件事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怀疑！

引起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1953年11月下旬，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曾问他，“有薄无林”名单是怎样回事？

他非常惊讶，反问道：“你们听谁讲的？”谭、叶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关于安子文拟的那个名单，他明明打过招呼不许扩散，是谁这样违反纪律，不听招呼？这不是阳奉阴违么？此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查清楚！后来在中央的一次小会上，他严厉追查是谁泄露的？竟没有人承认。会议结束时，他把高岗单独留下，问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其实他已怀疑是高岗南下时讲出去的，他这样问，不过是要试探高岗的诚心而已。

高岗吞吞吐吐地说：“饶漱石？不会吧？”这更加深了毛泽东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第三，他很自然地由此想到高岗去南方一定还有别的活动。林彪当时正在杭州，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一定会去见他。联想到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带那么多人去西山看林彪，不仅有军队的人，也有地方的人。他们谈了什么？

最后，他想到高岗受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赏识与支持，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斯大林不是称他为“张作霖”么？还有那个金日成，不久前来北京谈判，就是高岗和他谈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谈了些什么？金日成临走时一再表示对我们的感谢，是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感谢高岗？

凡此种种，他觉得高岗的确不正常；而且问题严重。后来，他在 1955 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把这形象地说成“一个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鬼火，一股地下水”。【注 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7 页。另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 320 页说明所引的这段话，是毛泽东 1953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既然如此，下一步怎么办？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如何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现。

中央已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财经会议又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也作了检讨；现在全国正在掀起批判右倾思想的热潮，所以，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公开跟刘少奇走了。再说，刘少奇在军队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由此看来，这个人暂时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因此，他更相信，组织会议后期及时停止与刘少奇的论战，转而强调团结的决策，顺应了形势，争取了人心，也争取了主动。

然而，高岗就不同喽！他位高权重，在地方和军队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比刘少奇危险得多！当务之急，应当先解决高岗的问题。至于刘少奇嘛，可以暂且放一放，现在不妨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高岗。

就这样，“联刘除高”的设想形成了。当然，舍弃高岗这员爱将，他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以此换来团结稳定的大局，还是值得的！

麻烦的是：高岗可不会轻易认错！闹不好，他还会把一切都捅出去，拼个鱼死网破！依他的性格，这种事很可能发生，必须防止！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 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这时他主要是在建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11 月至 12 月中旬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权衡利弊，到 12 月下旬，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二、风云突变

方针既定，从何处着手呢？首先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军队，才能把握住大局，还要充分利用高岗的错误去制服他。

（一）调查与定罪

1、高岗要当“万岁”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

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个“危险人物”。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初高岗不那么自信，对一些人不是那么深信不疑，而是能够深谋远虑，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他认真地和毛泽东一起共商“倒刘大计”，一切照计行事，步步为营地去干，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那“野心家”、“阴谋家”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也许就不会戴在他高岗的头上。

2、关于“反党联盟”的设想

高岗被财经会议的“批薄射刘”之风吹得昏头昏脑，从南方回来后，丝毫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组织会议后期改弦更张、强调团结的新动向，仍一心想着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召开之前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愿望。

所以，当他得知饶漱石受了批评之后，就跑到毛泽东前面替饶漱石说好话。殊不知，毛泽东心情欠佳，一肚子气正不知向哪里发泄，听了高岗的话，便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注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6 页。】后来高岗挨了批评，饶漱石又去替高岗说好话。

这样一来，已经对高岗疑心重重的毛泽东又怀疑高岗与饶漱石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不太正常。联想到组织会议上张秀山、郭峰的观点与饶漱石的观点一致，便怀疑他们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协议”、“有预谋”、“有阴谋”，再联想“张秀山、郭峰的后台是高岗”，他们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呢？后来的事实和他在 1955 年党代会的讲话，【注 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6 页。】都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设想。

其实，高岗一直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也不怎么瞧得起饶漱石，平时与饶漱石很少来往。高岗既没有参与张、郭的发言，更不知道饶漱石的发言。他后来反省时，根本就没有检讨他与饶漱石有什么“预谋”的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给自己雪上加霜。饶漱石也一直不承认他同高岗有什么“预谋”，只说他与张、郭的发言是“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毛泽东想到了他们之间“不正常”，有“联盟”，那就在劫难逃了。

（二）毛泽东设计钓“大鱼”

在进行“调查”之后，毛泽东又设计要钓高岗这条“大鱼”。

他对高岗说，他打算到南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

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

陈云心里没有把握，一边思量，一边说：“照过去的惯例，主席生病或外出，都是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次他提出轮流主持，是不是另有考虑？”

“就是！他对少奇已经不信任了，怎么还能叫他主持！”高岗说得斩钉截铁。

陈云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看可以轮流？”

1953 年 12 月 15 日，中央开小会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今天的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

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

高岗马上表态：“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

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散会后，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地一边向停车处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还是轮流好。"他还提到，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

邓小平反驳道："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

本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在问题未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之间继续交换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邓小平却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搞非组织活动"，"高岗来找我谈判，拉拢我"……

高岗在座谈会上否认去过邓家，说他根本不知邓家在何处。他在反省时也说，他从未去过邓小平家，与邓小平讨论此事，仅此一次。

（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 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 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 年 8 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 年 11 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 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 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 年 8 月 27 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 1954 年冬至 1946 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注 5 关于东北局在 1945 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1949 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 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 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统陈云等人谈话：【注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第 191 页。】

12 月 17 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 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注7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注8 《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注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

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 1953 年 12 月 26 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 日下午即去陈云处。【注 10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第 90 页。】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三、四中全会前后

毛泽东不参加七届四中全会，把北京的事交给刘少奇处理。实际却密切注意，步步遥控。高岗对毛泽东抱有很大的希望，求见不成，便给他写了一封绝密信……

七届四中全会是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以来唯一不参加、不主持的一次中央全会。他为什么要在此关键时候远离北京，而把关乎党的团结的重担撂给刘少奇？他真的相信刘少奇能但此重任吗？他就不担心高岗这匹“犟骡子”不顾一切地“犯浑”，把他们私下议论的话都捅出去，甚至挑起军队的不满而发生意外吗？其实，他对北京的事情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撒手不管，而是始终进行着遥控。

（一）遥控北京

毛泽东于 1953 年 12 月 24 日夜离京南下；26 日半夜到上海；27 日下午即去见陈云（想必是了解陈云南下的情况，特别是林彪的态度吧）；当夜 12 点到杭州，28 日下午就到刘庄见林彪和陈正人。

1953 年 12 月 29 日，刘少奇派人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定。

1954 年元旦刚过，1 月 3 日，毛泽东就把捷沃西安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到杭州，接连两个下午同他们长谈，并透露了一个惊人信息。他说：

我们党内，或许也许是国内要出乱子。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发展，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指了一下翻译师哲），楚就是我们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样？还要等等看。【注 11 1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第 489 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是何等紧张忙碌！他不但已经给高岗定下了“要造反”的大罪，并通报给了下面，而且又急急忙忙向苏联客人透露这个连中共党内都尚未正式定案、公布的消息，这是为什么？

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毛泽东主要是关注四中全会的问题。他接二连三地给刘少奇写信、发电报，千嘱咐万叮嘱，交代如何开好这次会议，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事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往返穿梭于北京与杭州之间，传达着两地的各种消息。

1954 年 1 月 7 日，杨尚昆带着毛泽东修改过的决议草案和两封信返回北京。两封信对四中全会的议程及刘少奇如何检讨，都提出了具体建议。【注 12 12 两封信的内容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第 432~433 页。】

第一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的：

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 1 月下旬为宜，会议的议程可有三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第二封信是给刘少奇个人的：

如各同志同意开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拟宜接着宣读你已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要扼要，有四五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担并非错误者为错误。

这样无微不至的关怀，对一个党的副主席来说，实在显得有点多余了。

相比之下，他对高岗却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冷淡。

高岗看到《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以后，认为是针对自己的，急忙给毛主席又打电话又写信，要求到杭州面谈，他总是从好的方面着想，以为根子并不在他本人；以为毛泽东对他只是有些误会，只要好好谈一谈，把问题说清楚，误会就会消除，他还会像过去一样受到信任。

毛泽东在电话中对高岗说：你不必来杭州了，就在北京好好检讨吧，以后还是有出路的。有什么话，对刘少奇讲是一样的。

这里，他既表示出对刘少奇的信任，又让高岗感到一点抚慰之意。他明知高岗想和他谈什么，却故意装糊涂，好像自己与高岗的种种行为毫无关系。他也分明知道高岗无意与刘少奇深谈，却偏把他推给刘少奇。

关于中共中央核心层在四中全会前的一些活动，已公开发表的《杨尚昆日记》有一些非常精彩，非常生动的记载。但这个谈话记录非常简要和隐涩，不了解内情的读者很难理解。在此笔者愿同读者一起尝试着解读它。【注 13 《杨尚昆日记》，第 100—103 页。】

1954 年 1 月 19 日，高岗将他给毛泽东的信交给杨尚昆，杨转手给了刘少奇。刘即约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一起研究并提出意见。

当晚，杨尚昆带着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和高岗的信登上南下的火车，于 21 日晚上十点到达杭州，当即向毛泽东汇报。

22 日，晚八点，杨尚昆去主住处商谈毛泽东给刘少奇回电，电文说：

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注 14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 440 页。】以后，毛泽东分别于 1954 年 1 月 23、25、26、28 日同杨尚昆谈话，同时，杨尚昆除了参加讨论，修改全会文件和刘少奇的报告及检讨等文件外，并给刘少奇打电话通报情况，还要同林彪、陈正人等谈话。

下面是 1954 年 1 月 28 日下午毛泽东与杨尚昆谈话记录的相关部分（括号内除注明外，均为笔者所加）【注 15 《杨尚昆日记》第 100 页。】

1、如何处理高岗请求去杭州于毛泽东面谈的问题？

杨尚昆汇报刘少奇等人提出的“四个方案”：

（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

（2）主（席）回（京）——也不好处理。

（3）由主（席）指定书记处谈话，组织（出面），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

（4）主（席）指定刘、周与（高）谈，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具体提议：如主（席）同意第一方法，请回（复）高（岗），并告刘（少奇），周（恩来）：来信已转，（高岗）不必来（杭州），委托什么人（与他）谈。

毛泽东确定同高岗“谈话方针”：

听他说，避免“对质”。

按决议精神“自我检查”。

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

（高岗）应作检讨，一次不好，二次可说；这次不好，以后可说。

小平可以参加。

2、对于会议可能发生的情况估计及相应措施：

杨尚昆汇报：

“冲”：（冲突）

（1）几位主要同志不冲，可保证。

（2）到会人不冲，事先招呼好，这可以。

（3）他（指高岗）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

（4）他攻刘，自己拉开，牵涉多人（可能不大，但准备着——原注），则会期拉长，开小会，报告主（席）回（京）处理。

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事先打）招呼——可以不发生问题。

准备有人冲，可以避免。

（高岗发动）攻势——也不要紧，力求避免主（席）回（京）。

“全会方针”：

照主（席）指示，只作正面说明，说话人不要太多，开两天。

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高（岗）之目的在于“过关”。先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

（陈毅说：高岗）“无改悔之心，有蒙混之意”。

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三天为好，必要（时）四天，看情况。

方针：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争取：逐步改变，改变环境，决议后就会改变，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增强教育、说服力量；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薄（一波）亦要作（自我）批评（财经错误——原注）。

林枫应讲。

彭（真）、薄（一波）、林（枫）重点应放在自我批评上，分配人帮助。对林（枫），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由）小平帮助。

他（指高岗）力免不冲（突），自己是不愿扩大的，如向彭真攻，让其攻下去，也可以过去。自己避开，说不清楚。扩大，开小会。

其目的在过关。

我们从这个谈话看到，无论毛泽东还是刘少奇，都是千方百计地稳住局面。他们既不愿激化矛盾，激怒高岗；又担心高岗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牵涉别人；更担心万一高岗或军队的一些人不顾一切公开发难。这是他们最不愿看到，也是最为担心的事情。所以，要尽量让会议开得和风细雨，避免火药味，以达到“和平会议”。

这次，毛泽东与杨尚昆还谈到关于是否向苏共通报，及如何通报四中全会内容的问题：【注 16 《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第 100 页。记录中，括号内字除注明者外，均系笔者所加。】

文件应交尤金、报告、决议（登党刊——原书注）。

问：（高、饶的）自我批评，（是否）交（尤金）？登（党刊）？

答：请考虑。准备登（党刊）、交（尤金），在必要时。

问：对尤金是否说内容（会议或高饶问题）？说就要泄密。

答：会后考虑，书记处或说，或不说，或另一次说，（团结问题或高饶问题）同我们党是息息相关的。看情况急否，即三种可能情况。

这里，至少可以肯定两点：1、会议文件应交尤金；2、高岗、饶漱石自我批评的内容，在必要时也可交给尤金。

正是根据这次谈话精神，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决定在 1954 年 2 月 1 日，将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问题的决议》（草案）交给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第二天（2 月 2 日，农历春节）

下午，即四中全会开会前四天，刘少奇、周恩来邀请尤金进行了三个半小时会谈，让苏共中央了解召开此次会议的原因和文件（草案）准备的情况，以及中共党内出现高岗、饶漱石派别活动的严重的状况。出席会议的还有朱德，陈云和我驻苏联大使张闻天，苏联驻华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 17 《尤金日记》，1954 年 2 月 23 日，绝密、正本。文号：14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7；案卷：379；卷宗：7；第 25~35 页。《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2 辑，第 128~130 页。】

值得注意的是，本来，1953 年 12 月 24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已经正式通过，毛主席如果不在北京的话，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刘少奇要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是否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高、饶的派别活动主要是反对刘少奇，他跟周恩来等人一起同尤金会谈，至少可以避嫌，是较为妥善的做法。会谈时，刘为主，周为副；刘主持，周唱主角；而朱、陈、张的参加，则表明这个会议十分隆重，是中共中央的一致作为，也表明高、饶是孤立的。【注 18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2 辑，第 128~130 页。】

周恩来通报了召开全会的目的；高岗、饶漱石的错误及其性质和根源；高、饶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以及我党中央对高、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议期间，在报告和决议里都不点他们的名字，全会对他们也不做任何组织结论。如果高、饶在全会上根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党将对他们继续批评教育，并观察他们以后的表现。周恩来还说到，高岗可能会拒不承认全会上揭发的事实；也不排除他自杀的可能性。【注 19 四中全会前，高岗在毛裤裆里藏了 20 粒安眠药，被李力群发现。】

四中全会结束后，1954 年 2 月 13 日，尤金受莫斯科的委托，拜会刘少奇和周恩来。谈话进行一个多小时，师哲和使馆参赞瓦西科夫担任翻译。【注 20 《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2 辑，第 130~133 页。】

刘、周向尤金通报了四中全会的情况，并说全会结束后，将继续对高岗、饶漱石进行批评，力争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进行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还说到高岗仍坚持错误，并扬言要自杀，向中央施加压力；也说到最近高岗有精神崩溃的迹象等。周恩来最后说：如果高岗或其他人在反党宗派活动中走得太远，蓄意危害党的事业，那么，无论他们在过去有过什么大的功绩，党中央都会逮捕他们。

（二）一封绝密信

求见不成，高岗仍不死心，他又让安志文转告王鹤寿，找个理由到南方去给林彪带口信，请他在毛泽东面前说说话。但此时王鹤寿已是避之犹不及，哪还愿意再为他效劳？他把此时告诉陈云，陈叫他不要去。

1954 年 1 月 24 日，高岗在别人的帮助下写出了《我的检查》稿，内容有四部分：

1、完全拥护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2、对照决议草案检查自己，承认自己有宗派情绪、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有非组织活动和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言行；党没有说有宗派活动和分裂活动。

3、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组织修养差，政治原则性差，骄傲自满等；

4、今后方向：加强学习，提高修养。

这就是高岗后来在四中全会的检查提纲。它与毛泽东定的调子相差甚远，自然过不了关。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言提纲的旁边，有两行批语：“不要涉及别人，除非他自己提到”；“问题说清楚，实事求是，主动积极”。从语气和 1954 年 1 月 22 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报，以及毛泽东与杨尚昆的谈话内容来看，两行批语极像是毛泽东的意思。那么，这“别人”又是指谁呢？

遵照毛泽东 1954 年 1 月 22 日电报的指示，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于 1 月 25 日和 2 月 5 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希望他“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作出深刻检讨。然而，他认为自己只有错误，没有“罪行”，无论怎样深刻检讨，也达不到他们所要求的“要造反”的高度。

在此期间，高岗曾给陈云打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场。

随着会期日近，高岗的心情也日益烦躁不安。他认为刘少奇不会放过他，而且很可能在会上逮捕他（从 1954 年 2 月 13 日刘少奇、周恩来向苏联通报的情况看，高岗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他不止一次对别人说，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算了；对陈云说，他准备去见任弼时（1951年去世）了；并偷偷把 20 粒安眠药“速可眠”胶囊缝在毛裤裆里，幸被李力群及时发现。

他很不甘心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决定再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清楚一切，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企望得到理解，消除误解和怀疑。

1954 年 2 月 2 日（农历大年三十）下午，高岗把赵家梁叫到起居室。

“赵秘书，你坐!”说着，他自己也在赵家梁身边坐下，点燃一支烟，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你帮我写封信，我说，你记下，先空着抬头和落款，不要写是给谁的和谁写的。”

他停下来，又是老半天不说话，屋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

“这件事，这信的内容，是极机密极机密的，你要以党籍保证，绝不能泄露出去。”

高岗的态度十分严肃，声音低沉缓慢，给人的印象，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赵家梁从未见过他这样，深为吃惊，当即点头表示保证绝不泄露。

于是，他打开思想的闸门，从三点半钟一直讲到黄昏掌灯时分。最后又叮嘱一句：“整理好以后，把记录和草稿全拿来销毁。”

他首先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多次沉痛表示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犯了严重错误。

说他错误主要是反对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并列举了大约有十来条具体错误事实；对一些他认为信得过的高级干部议论刘少奇的缺点，并加以夸大；怀疑安子文拟的名单是少奇授意的；传播、扩散“有薄无林”名单，借以攻击刘少奇；主席追问扩散名单问题时，谎说不知，欺骗主席；一线二线问题，在杭州告诉林彪；跟陈云、邓小平讲轮流好；跟陈云讲“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与刘少奇、陈云谈话，不谈本质问题等等。

错误的性质与危害性，是破坏了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情绪，骄傲自满，错误地估计政治气候等。

接着，他讲了中央一些“自由主义者”【注 21 高岗当年在检查反省时，常这样称呼同他一起议论刘少奇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名字，以及他们同他谈论过的一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言论的具体内容。如林彪怎么说，彭德怀怎么说，陈云怎么说……但他有意回避了毛泽东怎么说。

他最后说，这次犯错误，主要是自己负责，别人对自己有一定影响，是自己同意别人的，并加以传播。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主席。表示相信党，相信主席。决心改正错误，希望留在党内，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弥补给党造成的损失。

两天后，赵家梁把大约三千字的信稿整理誊清，交给高岗，记录和草稿都当着他的面烧毁。办完这件大事，他稍稍松了口气，觉得不管四中全会上将发生什么情况，只要让毛泽东知道自己的心思，事情就好办了。

显然，这是高岗在他已身处逆境，预感到将遭厄运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思想准备，决心向毛泽东坦陈一切，写下了这封对毛泽东满怀真诚情意的。至关重大政治责任的绝密信，也是他为自杀准备的绝命书。

但信中涉及许多人，他很矛盾，所以迟迟没有发出去。在高岗开枪自杀前两三天，他把信给安志文看，并问“发不发出去？”

安志文对于信中说的许多事，从未听说过，感到非常震惊。当即问：“这些是不是事实？”

高岗说：“都是真的。但我向中央反映，人家不承认，不相信，怎么办？”

安志文说："你一定要慎重!"

直到 1954 年 2 月 17 日中午高岗自杀之前，才下决心发出去。他亲自认真地添写了信的上款"毛主席"、下款"高岗"和日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交刘少奇转毛泽东。但在他开枪之前，又把这封信追回来，让人烧掉了。

当天下午，安志文和赵家梁向周总理汇报时提到这封信。后来，赵家梁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复述出这封信稿，经安志文看后，由他们两人共同署名，于 1954 年 2 月 20 日左右送交周总理。事后周总理曾问赵家梁，还有谁看过这封信？赵说除了他和安志文，没别人。还有一次周总理对赵家梁说，这封信在中央也只有极少数人传阅过。

1954 年 2 月 25 日，周总理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时说："高岗临死还要血口喷人，咬人一口"，显然是说这封信。

1959 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时，毛泽东多次说彭德怀是"高饶反党联盟的漏网分子"，也和这封信不无关系。

（三）四中全会与高干座谈会

七届四中全会于 1954 年 2 月 6~10 日举行。除全体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出席外，还有部分党的高级负责人列席会议。

会前，周恩来受命作了必要的、极机密的安全部署，以防不测。例如在罗荣桓等一些军队领导人的住处周围增加了警戒部队；叫宋某某和陈某等带手枪参加会议等。

在刘少奇主持下，会议完全按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进行。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了报告，其中包括他对合作社问题、老区土改中"左"的错误问题、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和天津讲话问题等的检讨。高岗、饶漱石也都作了检讨，许多人作了自我批评。全会开得和风细雨，没有对任何人进行点名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 决议》。当时，一些部了解内情的与会者，甚至不知道四中全会的这个决议是针对高岗、饶漱石的。

正是在毛泽东如此这般地指导下，四中全会开得很顺利、很成功。

但是，高岗、饶漱石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很不到位。所以，四中全会结束后，按照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两个高级干部座谈会，继续揭发批判高岗和饶漱石的错误。关于饶漱石的座谈会由邓小平主持；关于高岗的会由周恩来主持。

座谈会从 1954 年 2 月 15 日到 2 月 25 日开了十天。

座谈会一反四中全会"和风细雨。各自作自我批评"的原则，变成了急风暴雨、狂轰滥炸，不再"等候犯错误的同志的觉悟"。于是，人们纷纷表示与高岗划清界线，有的"反戈一击"，交代揭发；有的甚至歪曲事实、胡编乱造；有重有轻，有真有假，有实有虚，一股脑地向高岗头上砸来。当然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但在这种气氛下，哪有说话的份儿!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许多人或不少文章都把这两个座谈会与四中全会说成一个会议，说是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但实际上是两个会议。四中全会的议题，是 1953 年 12 月 24 日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的，他在 1954 年 1 月 7 日给刘少奇的信中又重申一次。而中央高干座谈会则是根据高、饶在四中全会的认错态度，由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的。四中全会及其决议都没有点高、饶的名字，也看不到"反党集团"或"反党联盟"的字样。在座谈会上才公开点名揭发批判高、饶的问题。而正式在党的决议中提出党内有一个"高饶反党联盟"，则是 1955 年 3 月的全国党代表会议的事了。有些人抹杀了这两个会议的"时间差"，把两个会议混为一谈。

有人问，召开这两个座谈会，刘少奇事先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从刘少奇、周恩来同尤金的谈话，以及毛泽东对周恩来总结发言的批改意见（详见下一章）来看，这是毛泽东的精巧部署。另外，在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到刘少奇在座谈会前曾告诉他："还是避嫌不参加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为好。"这也说明，刘少奇在座谈会开始之前，就已知道座谈会将怎样进行和有怎样的结果。

座谈会进行到第三天，发生了高岗自杀未遂事件。从此他不再出席会议。

1954 年 2 月 25 日，周恩来作总结发言，他综合 43 人的发言和他们揭发的材料说：“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他把高岗的主要错误归纳为十条，并分析了其犯错误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告诫全党引以为戒。他认为高岗的自杀行为是自绝与党和人民，是“外部性质”的。对高岗应实行长期管教。【注 22 周恩来总结提纲，详见本书第一章。】

四、自杀未遂

1954 年的早春 2 月，高岗只感到严冬的冷酷，不觉得一丝春意。

揭批高岗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东边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连日来尖锐激烈的揭发批判使高岗极为震惊，寝食不安，每天开完会回来，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深思、叹气。

他没有想到，刚刚开过强调团结的四中全会，怎么紧接着又开这个座谈会？又为什么一味地叫他“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不容他作任何解释和申辩，把他打德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真是墙倒众人推呀!——他愤愤地想。

他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

他又想起，也是在座谈会前，陈云到他家里来的情景。因为陈云的身体不好，也因为他特别敬重陈云，平时陈云极少到他家来，都是他去找陈云。虽然他对陈云最近的表现很有意见，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得到陈云的帮助。于是他请安志文转达了他的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便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

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急忙辩解。

“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陈云反击：“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忿忿而去，出门时满脸冰霜。

高岗也不送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脸红红的，十分激动。

高岗这样“死牛筋”，使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这里所说的“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毛泽东既然已经给他定了“造反”的死罪，他还能逃脱么？

每当他走进会议室，听到那些不实的“揭发”和强加给他的罪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再次萌生了以死相抗的念头。

1954 年 2 月 16 日的会上，陈云的发言，最后同他划清界限：【注 23 《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第 197 页。】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但他仍很清醒：无论如何不能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让他办的事抖出来。可是不说，他自己就择理不清。他没有和陈云争辩，也无意去争辩了。什么阴谋呀，野心呀，反刘反党呀，随他们说去吧！不就是个死罪吗？就让一切都烂在我肚里吧！

第二天，1954 年 2 月 17 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天气晴朗、干冷，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过去，远处不时传来零星鞭炮声，人们有序地工作、生活着。座谈会进入第三天。可是，对高岗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高岗吃罢早饭，便打发身边的人分别外出办事。十点多，宿舍里只剩下他和值班的警卫战士。他来到值班室对卫士矫洪良说：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为人忠厚老实，他们一起沿院中的小路走着，高岗指着卫士腰间的枪问："你这新枪性能咋样？"

"那还用说，好着呢!"

"给我看看!"

"那可不行！这枪不能给首长，有规定。"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

矫洪良没法，只得很不情愿地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枪递给高岗。

高岗端详一番，问："好使不？"

"当然好使。"

"下午我也去练习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急了，"首长，这可不行!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气呼呼地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不相信我？"

"不是的，首长！这有规定，我要负责的。"

高岗不耐烦了："怕什么！我负责嘛，拿来!"说着，伸手就把矫洪良手中的弹夹夺了过去。

矫洪良无奈，只得说："那，首长可要小心呀，注意安全。"

矫洪良总觉得不放心，散完步一回到值班室，赶紧给计委保卫处打电话，找白俊杰卫士长报告。

"赵秘书他们呢？"

"都出去了!"

"李力群呢？"

"也不在!"

"你别急，注意他的动向，我马上回来!"

他急忙去找赵家梁。此时，赵家梁正在和贾拓夫谈事情，听白俊杰简单说了情况，大惊。对贾拓夫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说罢，匆匆出门，骑上自行车向东交民巷奔去。

赵家梁回来，刚跨进办公室，就听见电话铃响，他急奔两步，抓起话筒，只听是贾拓夫急切地说："刚才忘记告诉你，你们千万要注意，他（高岗）力气大得很，你们不能硬来，要想个适当的办法把枪弄回来!"

正说着，机要秘书董文彬进来了，两人商量一下，一致赞同贾拓夫的意见，必须先稳住他，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想办法。为防万一，他跟前一定不能离人!

"我先上去，待会儿你们再来!"董文彬说着，转身上楼。

高岗散步后独自回到楼上进办公室，脸上立即失去了刚才的轻松。他坐在办公室前，深思片刻，打开抽屉，取出一封抄写清楚的信稿，看了一遍，写上抬头“毛主席”，又写上落款“高岗”和日期“二月十七日”；套上信封，写上“毛主席亲启”，封好。然后把这封信又装进一个大信封，写上“刘少奇同志”，里面却没有片言只字给刘少奇。接着，他铺开信纸，给周恩来写信，大意是请总理念在多年的情谊上，照顾李力群和他的几个孩子。信很短，语气却很有感情，信封上只写“周总理”。

做完这一切，他舒了一口气，站起身，走过起居室和卧室，去洗漱间里刮胡子。他的手有点颤抖，刀片刮破了面颊，血沾到手指上，他也浑然不觉，在糊信封时，竟把血迹印到两个信封上！这时，他听到脚步声，匆匆把信放入抽屉，董文彬正好跨进门来。

高岗听着董文彬的汇报，表情漠然，心不在焉，什么也没说。董文彬只好下楼来。

赵家梁赶紧上去，说：“志文不在，下午的检讨搞，我们先搞，还是等志文来一起搞？”

高岗不在意地说：“等志文来再搞吧。”

停了一会儿，赵家梁又说：“拓夫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你要想开些。”

他满腹委屈地说：“人家说我反对毛主席，要夺权，我不承认也过不去呀！”

“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检讨就检讨。应该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实事求是的。”

高岗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检讨就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又是长长的沉默。赵家梁没有理由再待下去，只好说了一句：“你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这时，李力群从习仲勋那里回来，一进院子就听说高岗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枪，心里一惊，急忙奔上楼去。她两脚发软，好不容易上的第楼来，却不见高岗的人影。

咦？人呢？她忙在楼上四处寻找。正好在走廊里遇见大儿媳，忙问：“看见你爸爸没有？”

“刚才他去我房里，亲亲孩子就走了。好像进餐室的里间去了。”

餐室里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去。李力群立即去拉开餐室的门，见门把手上系着一根很长的绳子，高岗正拿着绳子的另一头，猫着腰，躲藏在餐室门后的旮旯里。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

高岗很尴尬地苦笑了一下，站起身，脸色发白。李力群拉他坐到餐桌边的沙发上，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这时高岗的长子老虎跟进了进了餐室。李力群向高岗讲她外出办事的情况，他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情况。”

李力群只好把老虎拉到身边，悄声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

高岗盯着儿子发了一会呆，说：“老虎，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他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那两封信端详着，似在思考着什么。猛听小张喊一声“报告！”他抬头望着小张，似乎想不起叫他来干什么，又似乎在犹豫着，有顷，才站起来，边走便对小张说：“这两封信不要交秘书了，直接让小王（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此时楼上只有高岗和老虎。

李力群把刚才高岗的表现告诉赵、董二人，大家觉得形势严重！

赵家梁叮嘱李力群：“你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了，师哲不在，现在去不成！”

李力群一转身，见小张拿着信进来，讲了情况。赵家梁吩咐小张：“你马上上楼，就说已交小王送走。无论如何不要离开！”

说着，赵家梁一眼瞥见两个信封上都沾有血迹，吓了一大跳！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不顾一切，拆信！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见里面是给毛主席的信；又拆薄的，是给周总理的托孤遗书！

正不知如何处置，小张又下楼来，说高岗叫把两封信追回来，不忙寄出去。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高岗并非真要追回信件，而是故意把小张支开。因为小王真的接了信，

一定会立即骑摩托车送走，怎么追得上？。事不宜迟，不能再拖延了！必须马上把问题挑开！

于是赵家梁手里拿着两封拆开的信跑在前头，李力群、董文彬、小张等紧跟在后面，跑上楼去。冲进餐室，见高岗正坐在餐桌旁发呆，又见老虎也坐在他身旁，才轻舒了一口气。高老虎见他们进来，便起身退到门口。白俊杰和警卫班的同志见他们朝楼上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都紧张地跟着跑上楼，挤在餐室门口向里张望。

赵家梁一进餐室，就激动得语无伦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绝不能呀！"

高岗见人们这样紧张地跑进来，赶忙站起来让开一步，让赵家梁坐在他刚才坐的椅子上，自己挨着他左边坐下来。听赵家梁如此说，马上惊惶地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说着，他招呼李力群和董文彬把两封信拿到餐桌对面壁炉里烧掉。

赵家梁劝他："如果你觉得冤，也不能这样，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党中央申诉。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就是现在搞不清，将来我们也会帮你申诉的，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请你把枪交给我。"说着，他拉着高岗的手，这时赵家梁和高岗都很激动，两人都哭了。赵家梁侧过脸，面向十号楼，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餐室里非常寂静，只有壁炉里烧纸的嗦嗦声。突然，赵家梁眼角的余光看见高岗从裤兜里掏出手枪，迅速举起。他下意识地急忙左转身，右手也随之向上一搪。几乎同时，高岗向自己头上扣动了板机，"砰！"的一响，惊住了餐室内外所有的的人！

大家都以为发生了流血惨事，高岗自己也以为把头打了窟窿，完了！在枪响的瞬间，他的身子瘫软，手指松开；赵家梁紧紧地抱着他，双双向后侧倒下去，手枪掉落在背后的地毯上。事后，据高岗说，枪是被赵家梁磕掉的。可是赵家梁说，他只是向上磕了一下高岗的右臂，没有直接磕掉枪。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子弹没有打在高岗的头上，而是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的墙壁上。

高岗很快清醒过来。发现并未击中自己，枪就掉在身边不远处，就拼命挣扎着去捡枪。可是他被赵家梁紧紧抱着上身和双臂，仰面压在赵的身上，挣不脱，动不得，他使劲用双脚顶住地毯，两人的身子一起向左侧滚过去，他终于用左手抓住了手枪！高岗的力气很大，但赵家梁年轻，两人谁也制服不了谁。幸亏高岗的双臂不能自由活动，左手里的枪转不到右手，否则，他肯定又会开枪，可能打到他自己，也可能打着赵家梁或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枪声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极短的瞬间，人们都惊呆了。赵家梁紧紧抱着高岗，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其实谁也顾不上打电话。这时枪又被高岗抓在手里，赵家梁又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人们完全清醒过来了，董文彬从餐桌对面壁炉那边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也迅速从餐室门口奔过来，有抓高岗右手的，有掰其左手手指的，七手八脚，终于把枪从高岗手里夺了过来！这时，赵家梁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手上都因搏斗而擦破了。

枪一夺下来，高岗马上瘫软。人们把他和赵家梁扶起来，一起到隔壁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高岗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等一会儿就来人把我铐起来带走了"，"要把我铐起来带走了！"

尽管大家一再解释说，没有人打电话，高岗还是将信将疑，喃喃不休，显得有点神经质。

从赵家梁等人上楼、烧信、开枪、夺枪，到坐在沙发上，从极度的紧张到表面平静下来，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只有半个多钟头，这时刚刚下午一点三刻。

此时，安志文来了。见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感到奇怪，忙上楼来到办公室，见这么多人围在一起，更是惊讶："怎么啦？都在这里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呀？"的确，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家属、秘书、许多卫士和服务员等，都聚在平时很少进去的二楼办公室，准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董文彬、李力群和赵家梁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志文一听，又气又急，

瞪着高岗责怪道："你怎么搞的嘛？"

高岗答非所问："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要来人把我带走了！"

大家互相看一眼，有人想笑不敢笑，忙去安抚高岗："你放心，没人打电话。"

安志文啼笑皆非，便问："到底打电话没有？"

大家都郑重地说，确实没有人打电话。

安志文严肃地说："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说！"

正说着，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 "喂？……"

"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眼巴巴地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急切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参加了！"

高岗木讷讷地复述了一遍。

话筒里又传来总理的声音："那好，你看大家的发言记录吧！"

"噢，好吧。"高岗慢慢放下话筒，似卸却千斤重负，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了。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

见高岗放下话筒，安志文站起身来对他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赵家梁也说："中午忙忙乱乱的，连中饭也没吃，够累的了，好好休息吧。"他这才真的感到十分疲惫，也才发现自己的两个手腕边有好几处被抓伤擦破，留下血迹，胸部也隐隐闷痛。

于是，李力群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赵、董二人跟着安志文一起下楼。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董二人点头称是。

赵家梁对董文彬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赵家梁上车时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赵家梁正焦急地等待着。刚才他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他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三点一刻。

座谈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大家注意到，高岗今天没来。

总理快步跨进办公室，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赵家梁说："好，你讲吧。"

赵家梁扼要地讲经过情况。刚讲了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讲！"

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安、赵二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他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家梁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家梁，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他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一刻了。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据罗瑞卿后来讲，那些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听京剧"逍遥津"（汉献帝时曹操逼宫的故事）的唱片。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沉默片刻，说："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停了一会儿又说："让他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

下午五点多，周恩来给赵家梁打电话，要他向高岗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六点半，书记处会议。会后，习仲勋、马明芳、马文瑞、张秀山代表中央向高岗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他实行管教、待遇不变等决定。同时成立了管教组，并派公安部的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增加了警卫队的力量。

晚上九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至此，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联刘除高"计划终于有惊无险地实行了。

五、株连冤案

高岗的问题定了案，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按照一些人的推理，高岗决不是孤立一人，他必定有"帮凶"，有"同伙"，还有他的"反党老窝"。那么，就去抄他的"老窝"，去揪他的"同伙"吧。于是，便株连到更多的人。

（一）周恩来谈话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注 24 这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原记录稿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在 1954 年 2 月底至 3 月上旬间，中央高干座谈会结束后，他们返回东北之前。】

群众团体应参加党委和会议。

中央对你们那个草案【注 25 指即将召开的东北高干会议决议草案。】的意见是：

对高岗在东北时期的错误，要有所揭发。

东北局应从东北角度揭发高岗的罪行，对其本质揭发应更深下，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对组织错"的事实，以引起广大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从草案的内容看，平淡无力，揭发不深，动员力量不够。原因是着重了个人检讨，而未得出集体的共同认识。高岗在东北已有反党活动，以后野心大起来，到北京后仍指导东北的工作。你们孤立的个别检讨，缺乏共同的历史的认识。决议草案未把他的反党活动集中起来，引起共同愤慨。

总的来看无动员力量。

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主要要打破高岗“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

原则上讲，不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对，组织上不对。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政治性的，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这个思想是高岗反党活动的理论。不仅如此，高岗对少奇有意见，在中央不谈，背后乱说。如说他与少奇有争论，说少奇派他到东北，是已看到彭真对东北的工作拿不下来。【注 26 日本投降后派高岗去东北，当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后不是帮助彭真，而是看着彭真垮台。少奇信任高岗，才派他到东北工作，但他却说少奇袒护彭真。

高岗说，少奇在香山说合作社可以少分红、股少入。

高岗反对中央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注 27 指 1949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事实证明少奇对，高岗不对。

在莫斯科，高岗对苏联、斯大林说，苏联海军可否到青岛活动。少奇批评了他，他即发脾气。此事刘对，高错。

高岗对少奇有意见，1949 年有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注 28 指 1949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谈话；在东北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

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 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 年 3 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 1954 年 3 月 26 日至 4 月 25 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 3 月 27 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 1954 年 4 月 24 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来。不仅如此，他和林枫还亲自去中央

汇报请示，回来后才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充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 30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 1954 年 5 月 9 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划入“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的，只有第一副书记林枫一人。在高干会上，林枫检讨说：“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注 31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 1954 年 5 月 9 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 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 1954 年 5 月 9 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 年中共中央 11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 1979 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陈云、高岗、张闻天等人的意见。以后彭真受了批评，调离东北，但并未触动林枫。后来高岗出了事，在捏造“五虎上将”这一招上，林枫起了重要作用。用张秀山的话说，林枫“狠狠地踩了我们一脚，报复我们。”

张明远是 1949 年才来到东北工作的，1952 年任东北局第三书记。他曾长期在白区和晋察冀地区工作，在历史上与高岗没有关系。他性格拘谨，不善交际，以其处事细心沉稳而受到高岗的器重。但或许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彭真等人有些工作关系的原因吧，高岗在某些问题上又总是对他“留一手”。高岗曾对张秀山说过：“明远为人正派，原则性强，工作以外的事，不要和他谈。”所以他对高岗的许多事情知之甚少。高岗在反省时说，张明远从不在他面前议论刘少奇。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和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你的情况与王某某不同。他是‘心腹’，你是‘肌肤’。但他觉悟的早，并且有行动。而你虽然对高岗的一些言行有不同的看法，但你没有行动，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

1954 年 3 月，总理去东北之前，曾问赵家梁对张明远怎么看？赵说：他为人很正派，勤勤恳恳抓工作，群众关系也很好。

周总理点头说：“我也这样认为。”

后来，他听了罗瑞卿和林枫关于东北高干会的汇报后，又对赵家梁说，东北的会开坏了，扩大了，罗瑞卿说明远是伪君子，说高岗有“五虎将”，把明远作为“五虎将”的第二号人物，他感到意外。

赵家梁说：“我看不出来。”

周说：“我也看不出来。”

郭峰是一些书刊炒的最热闹的一个。毛泽东说过：【注 3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6 页。】 “饶漱石说，‘今后中央组织部要以郭峰为核心’。组织部是饶漱石为部长，高岗的心腹郭峰去作核心。那很好嘛！团结得很密切嘛！”正因为有了领袖的这番话，郭峰不仅成了“五虎上将”，而且似乎真的成了一个“核心人物”。于是一些人便胡诌了许多关于他的耸人听闻的“阴谋活动”。然而，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里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郭峰究竟是不是高岗的“心腹”？他是不是中央组织部的“核心”？

郭峰原是辽西省省委书记，1952 年调到东北局先后任组织部副部长、部长，总共仅一年多的时间，怎么会成为高岗的“心腹”？1953 年秋，中央决定撤销大区，将原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央任中组部副部长。郭峰就这样调到中组部。然而任命是下了，郭峰还没有到任，就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可见“核心之说是何等荒唐。

与郭峰同时任命为劳动部副部长的宋平，原来是东北局劳动部部长。那么，为什么他不时“高岗的心腹”，“劳动部的核心”?在座谈会上，确实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宋平也的确莫名其妙地受到批判。但由于宋平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周说“宋平是老实人”，他因而得以幸免。

赵德尊原是黑龙江省委书记，过去与高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高岗去北京以后，他于 1953 年 3 月才调到东北局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兼东北局秘书长，总共不到一年，就莫名其妙地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

马洪也是 1949 年调到东北局工作的，调北京之前是东北局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后来调到计委任专职委员，是高岗身边的秀才之一。在日常工作中，他有时也为高岗出主意，但都是为了工作。他这次原是作为知情人来参加东北高干会的，不料却过不了关。

就是这样五个有着不同经历、不同思想水平的干部，在不同时间、从不同地区和不同工作岗位，受党中央委派而到东北局工作。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最短者不到一年），他们甚至还

说不上相互了解，怎么可能结成“反党反中央”的宗派？难道就不怕有人举报揭发吗？如此胡编乱造，必然造成恶果。受害的何止他们五人！

后来的事实表明，几乎东北各省市的负责人都受到一定的牵连，如黑龙江省委书记李长青、辽西省委书记杨易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旅大市委书记陈伯村，以及抚顺、长春的市委书记等，甚至有的下级干部也因与他们一起工作而受到株连。许多干部受处分的受处分，调工作的调工作，东北地区原来比较稳定的干部队伍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此案究竟株连多少人，有谁能说得清呢？

如果说，高岗“反刘就是反党”的话，那么，按照这个逻辑，与高岗一起积极参与反刘活动的人，甚至为其出谋划策、鼓劲打气的人，是否可算着高岗的“心腹”或“干将”呢？我们反对随便把一起工作的同志划为“集团”或同伙“。事实上他们也都没有被说成”同伙“，这里也就不亚于赘述了。

（四）莫须有的“反党联盟”

1955 年 3 月，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定》。既然根本不存在什么“高岗反党集团”，那么“高饶反党联盟”又从何而来呢？当时的确有人怀疑有没有“高饶联盟”。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了那五条理由，【注 3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146 页。】于是没人敢再有异议了。

但是，毛泽东说的这五条也只是捕风捉影，并不能说明高岗和饶漱石之间存在联盟关系。

从历史上看，高岗与饶漱石没有在一起工作过，而且由于饶漱石长期在白区和新四军工作，高岗曾认为他是受刘少奇提拔重用的人。也就是说，他们不属于一个“山头”。

1952 年夏，毛泽东对饶漱石说，东北的工作搞得好，你去东北看看，找高岗谈谈。于是，这年 8 月，饶漱石到大连休假。

那时，经常有中央或其他地区的领导人来大连度假或养病，高岗对于饶漱石来大连，并不特别重视，只让旅大市委副书记陈伯村向他介绍东北的情况。当时正在大连休假的张鼎丞夫妇也一起来听。

东北的成就确实打动了饶漱石，他不禁问，以高岗这样一位文化部高、出身行伍的人，何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使东北的工作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陈伯村说了三点看法。第一，高岗注重抓大事，抓原则问题，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第二，善于用人，不讲“山头”“派系”，不论资排辈，只要这个干部有德有才，他就放手使用。第三，高岗的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做事见成效，从不朝三暮四、拖拉扯皮，而且他要求下边的干部也这样做。因此，东北的干部很团结，上下齐心。

陈伯村的一番话，使饶漱石对高岗产生了极好的印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加上毛泽东的极力推崇，自然对高岗更加尊重。

高岗是晚些时候到大连的。他接连参加三个会议（商业会议、基建会议、青年团会议）后，才到大连休息。他虽然与饶漱石见了面，但因为是初次交往，只是礼节性的应酬而已。回到沈阳后，他曾对人说，饶漱石对经济建设的许多事都不懂。颇有些轻视的意思。

到北京以后，高岗与饶漱石既无工作关系，又无个人私交，他从没有到饶漱石家里去过，饶漱石也没有来过高岗家，他们只在开会时见面，平时连电话都极少。

因此，如果实在要说有一个“高饶联盟”的话，毛泽东算不算“牵线搭桥”的人呢？

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究竟有什么共同活动？

如果说是批判薄一波的错误，这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在于他们都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当时在会上有反刘言论的不仅是他们两个。当然，贬刘、反刘（批评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一定就是反对刘少奇）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利于党的团结，都是错误的。但由此而说他们“相互配合进行反党活动”，是有“共谋”、有“联盟”，是否有些过分或拔高又拔高呢？同样，扩散名单也罢，组织会议上饶漱石与张秀山的观点相同也罢，都不能构成他们有“联盟”的理由。

饶漱石曾说，他们的观点相同，完全是不谋而合。

如果硬要说高、饶又联系的话，那就是他们都有共同的反刘的根子，这个根子来自何人，不用说明，读者自然明白。

1953 年冬，高岗从南方回来后，听说饶漱石在组工会上受了批评，日子不好过，曾两次向毛泽东陈述意见，为饶漱石辩解；后来高岗受猜疑，饶漱石也单独向毛泽东说过维护高岗的话。毛泽东由此断定，高、饶之间“有一个联盟”。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们心中无“鬼”，彼此间没有什么“共谋”，只是不愿意因为自己而株连别人，才敢于不避嫌向毛泽东坦然陈词。他们都自以为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即使说错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却做梦也没想到，竟会因此而被说成一个“反党联盟”的头头。

（五）牵强附会的“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至今，不少人一直说高岗是中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到处飞舞，不足为奇。但在高岗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可是了不起的罪名。

笔者认为，这个结论不恰当，是把认识问题拔高为阶级斗争，吧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

纵观高岗的历史，他与资产阶级没有瓜葛。从他的报告和文章，也没有见到他为资产阶级说好话。如果说思想倾向有毛病的话，人们看到较多的是他的激进，或有些过“左”的，甚至有一些“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方面，他与毛泽东的主张很相近。更确切地说，高岗的这些思想有许多是从毛泽东那里来的。这也正是他与刘少奇格格不入之处。他认为刘少奇处处为资产阶级说话，“不愿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刘少奇则批评他以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来实现农业具体化的想法是空想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批评他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过“左”的政策等等。他在财经会议上对资产阶级右倾思想批评那么激烈，正是其真实思想的反映。

高岗这样一个对资产阶级怀有深刻反感和高度警惕的人，怎么会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呢？

唯一与“资产阶级”有点关联的，似乎就是他的生活作风腐化。这个问题，他在陕北游击战争时期就有，后来掌了权，当了领导，又有所发展。笔者认为，与其说高岗之生活腐化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还不如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农民流寇思想的反映更为贴切。从高岗的思想行为来看，他更像是中国传统的农民领袖，如洪秀全、刘宗敏等，而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代理人”。

事实表明，“高岗反党集团”也罢，“高岗反党联盟”也罢，都是围绕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产生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人为制造的政治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个违反中共党章规定、破坏党内民主团结，大搞“一言堂”的产物。高岗事件开了一个坏头，从此以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一言堂”之风，把党内斗争当作阶级斗争之风越来越盛。连毛泽东自己都说，高饶事件以后党内鸦雀无声。

由于对一个人的认识与处理往往同党和国家的命运、同革命接班人的问题紧密相连，随着毛泽东日益年迈，解决接班人的问题也就变得愈加紧迫，斗争也愈加表面化。尽管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完成对私人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内的阶级已经消灭，但阶级斗争却愈演愈烈，以至满眼都是阶级敌人，无处不有阶级斗争；动辄挥舞“反党”的大棒，打出多少大大小小的“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来。到了“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各种“集团”满天飞，害苦了多少干部群众！

第六章　最后日子

在漫长的管教期间，高岗反省、检讨，违心认罪，却无人理睬他送上去的检讨书，也没有人来找他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他的一切要求都没有回音。他深感自己已被遗弃，犹如

被打入冷宫。他在寂寞与痛苦中煎熬，在悲哀中挣扎，他终于明白：路已经没有了。

1954 年 8 月，高岗被管教已经半年了。炎炎酷夏，驱不散他心头的严寒，多日来焦虑、矛盾、痛苦，使他心力交瘁，他对这种被“打入冷宫”的管教生活，越来越忍无可忍。

看看外面的世界，正是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伟大事业。它在召唤他，他原以更大的热情去为之献身，为之奋斗。可是现在，他却被困在这深宅大院里，无人理睬，无所事事，徒劳地消磨时光。

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极端的个人主义发挥大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给中央写的《我的反省》送上去已经一百多天，至今既无人来同他谈话，也不给他一个书面的答复。当初，他曾恳切地请求面见毛泽东，希望讲清问题，消除毛泽东对他的误解，都遭到拒绝。他始终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一定会出来为他说几句公道话。还有周总理，平时对他也是了解的，也应该出来为他说句话。

可是，他等啊，盼啊，三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却毫无音讯，连个电话也没有。看起来，谁也不会出来为我说话了。如今，这满腹的冤屈向谁诉说？

他长长地叹一口气，觉得自己犹如重重地跌入了深谷，即使活着，也已是生命垂危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是自己不慎失足，还是被那个他百般信赖、尊为长者的“知己”推下来的？如今，他在这绝壁峭崖的深谷中，在黑暗、寒冷、饥饿、焦虑中，在狂风暴雨中苦苦挣扎，却得不到同伴的救助鼓励。如此身处绝境，还有生的希望么？这真是：山高谷深谁助我，何处有归途！

他觉得似乎理清了思绪，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

此后，他的心境反而平静了许多。可是一旦真的要走这一步时，他又不免犹豫起来。在这样的苦思苦想中，他越发憔悴，思绪和行为也越发反复无常。

这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可是，高岗却心灰意冷，全然不觉得酷暑炎热。他整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言，行为乖戾，和工作人员一起玩牌也是心不在焉，总是出错。

这天是星期日，没有学习。吃罢早饭，他时而在楼上随便走动，时而坐在沙发上沉思。他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的这头到那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的卧室、秘书的卧室……

上午 11 点钟，李力群从外边回来，匆匆上楼。走进卧室，只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一面墙壁的电源插座前面。她急切地问：“你这是干什么呀！”

高岗慌忙遮掩：“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想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能不能用。”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急切地说：“你呀，你呀！你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立刻色变：“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来人来把我带走吧！”

“只要你不是想自杀，我报告什么呀！”

李力群虽然已经意识到高岗有摸电门自杀的企图，但是她心里很矛盾，怕刺激他，怕对他不利，所以没有对别人讲这件事。

事有凑巧，正好这天赵家梁轮休，一早就回家去了，副组长赵光华值班。赵光华是公安部八局的干部，虽然已来半年，毕竟不如赵家梁与李力群熟悉。这也是李力群没有及时反映这件事的一个原因。她只得更加警惕，始终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高岗忽然不见了。李力群急忙到处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楼梯是通往楼下大厅去的，自从管教以来就封闭了，堆放着一些平时不用的杂物，一直没有打扫过，布满了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到那里去，显然很反常。

李力群带着责备的口气说“你来这里干啥？你知道这里有多脏，尽是灰尘和蜘蛛网！”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干啥，想干啥呀！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赵秘书，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赌气地说。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你不要这样嘛！走吧，走吧，快回去！”她连劝带拽地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讪讪怏怏，拉几个人在一起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下午六点，赵家梁回来，高岗故意拉他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赵家梁接触，以免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1954 年 8 月 17 日凌晨一点，他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 16 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

这时小女儿遭已在她的小床熟睡，李力群也已躺下休息。

高岗却毫无睡意，又跟李力群说了很久很久。

半年来，特别是 7 月以来，高岗曾不止一次在深夜和李力群长谈，多次谈过“不如死了算了”；说他最不放心的是她和几个孩子，希望她能念在夫妻一场，把孩子们带大成人。万一生活没办法，就把他们送回陕北，相信那里的人会养活他们的……

因为这样的话说多了，李力群以为他之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特别在意。像往常一样，反复劝他不要想不开，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

高岗只是摇头叹气。他觉得李力群太幼稚、太单纯了，根本不懂政治，更不会像到政治斗争有多么残酷！想到这里，一股悲悯、怜惜之情涌上心头，他掐灭香烟，重新躺下，把她紧紧揽在怀里，尽量给以温存、抚慰。

这时已过了凌晨两点半钟，怀有身孕的李力群非常困乏，实在支持部住了，对高岗说：“二点半都过了，快睡吧！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可是，他心里却在哀叹：明天，明天，还有明天吗？

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 20 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俺，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 年 8 月 17 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 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十点 17 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 1954 年 8 月 16 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 17 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 19 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 7~10 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 11~17 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 18 个高克林和第 19 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凯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 月 17 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

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 11 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 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 1100 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 月间，他曾把 20 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 20 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 12 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 年 8 月 18 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

二、简单安葬

没有鲜花，没有哀乐，也没有亲朋好友送别，人们为他举行了最简单的安葬……

1954 年 8 月 17 日深夜，东交民巷八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人车纷纷离去，院内又恢复平静，但庞大的主楼依然灯火辉煌，人影摇曳。

几个年轻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入大楼东门门厅停放的棺柩里。这棺柩是崭新的，还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当时北京市场上买的最好的本色柏木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狭长的板条拼凑起来的。

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衣裤，里面是白衬衫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方形的石灰和木炭小包，至少也有几百个。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严严实实。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具 160 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也有七八百斤，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到卡车上去，费了很大的力气。

1954 年 8 月 18 日凌晨一点，入殓完毕，大卡车权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八号大院。

自从 1953 年 1 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到现在如此这般地运走，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既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也没有他的故旧好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和其他工作人员。

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1954 年 8 月 21 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李力群原本不想去，经过劝说，还是去了。高岗的胞兄高崇义特地从陕北赶来参加他的弟弟安葬，19 日刚到北京。高岗的长子 21 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安葬他父亲。

当　　天上午九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起出来，载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这就算是灵车了。卡车头前没有按照惯例挂黑纱和死者的照片，车上也没有花圈或鲜花；送灵的人们有的扶车帮而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大家都没有戴黑纱。从外边看去，这不过是一辆极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棺柩告诉人们，它的主人绝非等闲之辈。

车上的人神态严肃，都不说话，更不谈笑。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上午十点多钟，骄阳似火，热气灼人，但卡车飞驰在郊外的田野间，地旷人稀，迎面扑来猎猎凉风，使人不觉得烈日之可畏。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卡车停在了万安公墓门前，人们跳下车来，才感到地面热气蒸腾。阵阵热浪扑面而来。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确实是个极好的地方。高岗之所以能够在此安葬，是因为周恩来有明确的交待：要善殓厚葬，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安葬高岗的墓穴，选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而且向阳，位置很好。

几个青壮年从卡车上将棺柩抬到到墓穴处，缓缓放入已砌好的水泥墓穴，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毕。没有隆重的遗体告别，没有扣人心弦的哀乐，没有覆盖棺柩的党旗国旗，没有鲜花、挽联和花圈，也没有亲人撕心裂肺的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人们最后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一切都结束时，已是下午一点半过了。

当天来不及建碑，后来做了一个由碎卵石和水泥混制的碑，外表包一层砂砾混凝土，样子极像花岗石，碑上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也没有碑文和立碑人，是一副真正的无字碑。就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至今依然残立在那里。如今，有谁会想到，在这块半截残碑下面，掩盖着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悲惨的历史故事。

1954 年 9 月 1 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给苏共中央发去通报，正式通知他们，高岗自杀身亡。中共中央还决定将“高饶事件”通知兄弟国家的党的中央。

第七章　了犹未了

高岗虽然死了，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却了犹未了，“高饶事件”也了犹未了，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明里暗里，斗争仍在继续……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是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少奇一下。

矛盾依然围绕着两个阶级与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

1955 年 7 月，毛泽东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指名的是邓子恢，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在 1955 年 10 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注 1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第 195 页。】他再次批评“四大自由”“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反对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注 2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08 页。】

1955 年 12 月，他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加的按语中说：“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注 3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 229 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批语之三。】

这是 1953 年财经会议争论的继续，不同的是，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刘少奇的主张“是资产阶级的纲领”，“是纲领性的错误”。

1956 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少奇让陆定一组织起草，并经刘少奇审定的。毛泽东不赞成，但他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少奇，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组织人事的调整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 1956 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先为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1958 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难道是巧合吗？

1959 年 3 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开会的第一天就郑重宣称：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帅，邓小平是副帅。当时人们都很惊讶，怎么不说刘少奇是副帅，而说是邓小平呢？其实，毛泽东早就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现在宣布，表示他决心要采取行动。

紧接着，在 1959 年 4 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泽东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少奇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岗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一切都在毛泽东的帷幄运筹之中，他正在不动声色地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战略部署。

但是他没有料到，此时突然杀出个彭德怀。

1959 年，大跃进的浮夸风显露出对国民经济的极大破坏，人民的生产生活陷入严重的困境。毛泽东自然脱不了责任，但他不认输。

在 1959 年 8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直言上书批评大跃进的浮夸风，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这下激怒了毛泽东，于是他像当年收拾高岗一样狠狠地收拾彭德怀，以确保刘少奇斗争的胜利。他不仅指责彭德怀的意见是“右派的猖狂进攻”，而且用算老账的手法，说彭德怀“历来有野心”，“历来动摇，直到高饶事件”； 【注 4 毛泽东在 1959 年 8 月 1 日常委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第 237 页。】“过去参加高饶集团，这次比立三路线还恶劣”，“高饶事件，有的是保护过关，是高彭联盟，彭高联盟”。【注 5 毛泽东在 1959 年 8 月 11 日大会上的谈话。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328 页。】他硬说与彭德怀持相同观点，或同情彭德怀的人有一个“湖南反党集团”来，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拱撺攮，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注 6 1959 年 8 月 10 日，毛泽东对于 8 月 4 日安徽省委关于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之事的报告所作的批语。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271 页。】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纲领式的东西”；【注 7 周恩来在 1959 年 8 月 2 日全会上的发言。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284 页。】 并且也给彭德怀加上了一项“里通外国”的帽子，号召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毛泽东这些讲话的精神直接反映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中：“这一活动（指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的意见）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其他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注 8 李锐：《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 357 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 年 1、2 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 年夏秋，从 7 月到 9 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 月 5 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 月 6 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 月 9 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 月 15 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 月 13 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 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 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 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 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 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 年 6 月 16 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 12 赵家梁：1992 年 11 月 20 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 1964 年 7 月 14 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 年 5 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 1953 年 12 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 月，在八届 11 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 年 1 月 13 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 年，党的八届 12 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 年 10 月 17 日，造反

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 天之后，1969 年 11 月 12 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 1953 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 1969 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 16 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党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 1976 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注 13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第 349 页。】

在高岗长达半年的管教期间，特别是最后一个月里，管教组多次向中央打报告，甚至打紧急报告，要求中央尽快派人与高岗谈话，均无答复。难道毛泽东真的忙得连打一个电话，或命人转达一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么？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高级干部悲惨死去，不都是在这样表明上不闻不问，实则胸中有数的情况下发生的么？

庐山会议期间，上山斗争彭德怀等人斗得轰轰烈烈；北京城里也在追查彭德怀与高岗的关系。原东北局的几个主要负责人又被召回中南海，不仅批判彭德怀的“反党罪行”，还要追查当年彭德怀与高岗有什么“阴谋活动”。李力群也被软禁起来，要她交代高岗与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的言行。

一天夜里，安志文把李力群接到彭真家里，安子文和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也在座。彭真重点问她高岗与彭德怀、林彪、陈云的关系。他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吹捧高岗，不提毛主席。说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很好，“你好好想一想，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李力群心里很害怕，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停地流泪。

不经中央同意，某个政治局委员单独秘密调查另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言行，这种做法，难道是正常的、合法的吗？反过来说，不经中央同意，彭真等人又怎敢擅自做这种秘密调查？那么，是谁批准的？目的何在?

1962 年 9 月，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再次批判“右倾翻案风”，小时《刘志丹》被说成是为高岗翻案的反革命作品，习仲勋、贾拓夫等一大批西北的干部因此受到审查，被打成“彭高习贾反党集团”。李力群再次被软禁、受到追查，要她交代高岗与习仲勋、贾拓夫等人的关系，问他：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的小说《刘志丹》你看过没有？陕北的一些高级干部到你家来过没有？他们都和你说了什么？1954 年，习仲勋在东交民巷和高岗讲了什么？习仲勋与彭德怀有什么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展，毛泽东表现出对高岗的怀念。传说毛泽东曾对起草讨伐刘少奇檄文的人说：要是高岗还在的话，他可以提供更具体、更详细的材料。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刘少奇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当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内容；“文化大革命”中所公布的关于刘少奇的许多罪证中，特别引人注意的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材料，当年毛泽东就曾亲自让高岗去查过。这些材料当时没有公开，而今，却被公布了。然而，高岗当年因反刘少奇而获罪，现在却并没有因此而翻身，这又是为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不知深浅，成了了一个全国性的“揪高饶集团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召见该组织的红卫兵头头，对他们提出尖厉批评：“你们这样做，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从此再无人敢动这个问题，当年被定为“高饶集团五虎将”的人也没有因这个问题再受到进一步的追究。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力群自然也免不了遭批斗，后来，周恩来向李力群所在单位打招呼说：“不要随便揪斗李力群。”

1970 年冬天，在高岗去世 16 年以后，毛泽东忽然对高岗的遗属表示关注。根据他的指示，周恩来于 1971 年 1 月派人把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起初，按照李力群的要求，安排她到图书馆工作，但刚去不久，就被调回当时的科教组（即后来的教育委员会）。据领导人讲，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毛主席说，在西北、东北的干部中，她是有影响的人物，应该回科教组工作（她原来在教育部工作）。周恩来还指示中央组织给她恢复原来的待遇，补发了被扣发的孩子们的生活费。周恩来逐一询问了高岗的每个孩子的情况。当了解到他们因受高岗的牵连，升学和毕业分配都遇到困难时，立即指示有关单位，把他们都召回北京，按照党的政策，根据各人的条件安排工作或升学，不得歧视。由于她的住址和身份已经公开，为了她和孩子们免遭麻烦，周恩来不让她们回原来的住处，也不让她们住公寓，而是派秘书带着她一起选择了一处独院居住。周恩来中央细心周到地安排高岗的遗属，不仅仅是因为当年高岗托孤之情，更可能是毛泽东授意的。

1974 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安排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列入国庆节登天安门城楼的名单。当时，四人帮爪牙迟群等人把持科教组，极力反对李力群党科教组的代表，周恩来便把她安排为天津选区的代表，出席全国人代会，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宴。后来，李力群又担任了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所有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毛泽东对高岗的难以启齿的歉疚，而又不愿公开认错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呢？

“高饶事件”至今已过去 50 多年，事情似已完结，但并未完结。

11 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许多冤假错案重新进行审查，予以平反纠正。人们也关注着“高饶事件”如何对待？

陈云说过：“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不要再讲了，再讲没有好处”，“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不要再提了”。在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邓小平也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刘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如土改时搬石头、反五大领袖；【注 14 土改时，一些领导干

部反对过“左”的做法，因而被当着“绊脚石”，把他们调离本地区，当时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搬石头”。“五大领袖”是指当时的村干部：即村长、村支部书记、民兵（排）队长。粮秣委员、妇女委员。】天津讲话，还是由缺点错误。”（1980 年 3 月 19 日）

但是，他仍坚持认为高饶的问题不能翻。人民都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笔者认为，最“复杂”的恐怕一是高饶对毛泽东的看法。邓小平是不是“投鼠忌器”，怕“泼脏水的同时，把孩子也泼了出去”呢？二是由于邓小平和陈云这两位当年揭发这一事件的人都不愿“翻”，而他们是那么的权威，中国人有恰恰最信奉权威的话。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思想，1981 年，中共 11 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高饶反党联盟”或“高岗反党集团”等字样都从文字上消失了，只保留了高、饶两个人。对当年被打入“高岗集团”的五个人，中央都给予“实际解决”，而未予公开平反。这也许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的体现吧。不过，只要中共中央对高饶问题没有实事求是的说法，那么，这个问题还将会以讹传讹，谬误流传，遗患后代。

总的来说，笔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对于毛泽东在中国历史的伟大功绩，必须给以充分估计。本书的宗旨并非全面评述毛泽东的功过是非，而仅仅是多“高饶事件”本身提供一些事实真相和思考而已。

附录一 ：历史回顾

如今，50 岁以下的人，对该国其人其事知之甚少。可是岁数大一些的人都知道，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乃至 50 年代初，他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这本书里着重讲述了高岗在 1952~1954 年所发生的事情，分析了他从权力的高峰跌至无底深渊的内在与外在的，历史与现实的因素。然而，似乎还缺少对其全貌的介绍。这个附录，就是概括地讲述高岗到北京之前的主要经历。之所以作为“附录”的原因，一是为了使正文的叙述更连贯，不致因高岗回顾历史而冲淡正文的气氛；二是为了给读者以选择的机会，如果您有兴趣、有时间，不妨一读这个附录，否则，可以忽略它。

高岗戎马大半生，曾经地位显赫，备享荣耀。有人说他是“西北起家，东北发家”。当他在管教期间回首往事的时候，对自己的辉煌依然满怀感慨，不无得意。

翻开已经发黄的。高岗反省的原始记录稿，第一页变色他回顾自己历史的提纲，两行粗大的字跃入眼帘；

西北：金边帽，东洋刀。复仇。

入党动机有报复

①西北：

胡永发、王世发、西河塔、富家山、

报复、武世晨、

金边帽，东洋刀。

入党动机有报复、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大批清洗叛党、

30 年开始搞、刘高张、32 年赶走、

33 年 1、2 间、毕口、夏源领导兵变、6 月 26 军全军没、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省委大破坏、（杜衡、小张、陈建文叛变、白区党破坏）、中心转在桥山根据地（兆金）。我说过南有瑞金，北有兆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那时觉得恢复党、军、根据地、

①大批的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狡兔三窟、兆金、南梁、陕北、集体领导和人民的创造，（？）上不容、自己在关键上恢复了、把自己估计高了、把个人的作用夸大了。

②肃反是错误路线、出来后是愤恨、正因为这样、放出后中央挽救了这个地区、到军委从事武装动员部、郭调去搞蒙古地工作、工作不好搞经常打、表现过去自己的所为是坚定不

移的、念念不忘。说苏武牧羊、流放去了、迟早要把我害了。这种情绪对郭很仇恨抱怨的情绪、很狭隘、不是从积极的方面想。

③在蒙古地工作、私人生活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片沙漠地、天天飓风、跑来跑去、生活确实腐化、社会反映是落后的。

我们的叙述就从这里开始。

一、身世、理想

悠悠无定河，如同岁月的长河，千百年来，流淌在陕北黄土高原，带着人们美好的希望汇入滔滔黄河，留下的却是无尽的苦难。这里山穷地瘠，十年九灾，战祸连连；官府横征暴敛，百姓流离失所。自古以来，这里农民反抗豪绅和官府的斗争不断，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领袖——闯王李自成就诞生在这个贫瘠而多难的地方。

早年，高岗的祖先逃荒来到陕西省横山县武家坡镇（现武镇乡）高家沟村开荒谋生。祖父高万智因贫困劳累中年早逝，高岗的父亲高仲来带着两个弟弟艰难度日，除农耕外，农闲时上山烧炭，运到长城以北蒙古地（内蒙）贩卖，有时也兼贩其他农副产品。

高岗原名高崇德，生于 1905 年 8 月 30 日（农历九月初二），兄弟姐妹四人，童年时，常随母亲挖野菜度日。八岁那年遭大天灾，母亲病逝，15 岁的姐姐出嫁；六岁的妹妹给人家当童养媳，换的六吊钱。他 11 岁就和兄长一起帮人揽工放羊，艰难度日。

他十岁上冬学，【注 1 冬学是一些进步人士利用冬季农闲举办的平民学校。】后入龙镇小学读书。1922 年，17 岁的高岗考进横山县第一高小，这期间，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风暴，把民主革命的种子播撒到这里。高岗在进步师生的影响和带动下，经常参加各种宣传活动。1925 年春节过后，因闹学潮遭到校方和县府的严厉镇压，同学们拉着队伍到榆林去告状，得到榆林各个校的支援，全胜而归。这件事不仅给高岗极大的鼓舞，并且在斗争中结识了刘志丹，并成为挚友。1925 年秋天，他考入榆林中学，1926 年加入共产党。

1926 年秋，高岗接受党的指示，只身去蒙古地(内蒙)撒播革命火种，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是年冬，又被派到西安中山军校受训，既是学员，有兼农运课的教官。这是他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共产主义理论教育和军事训练，对他后来的革命道路有着重大影响。

30 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在童年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村里的大财主武世晨，仗着儿子在外当军官，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一次，武世晨的儿子回乡省亲，头戴金边帽，腰挎东洋刀，骑着高头大马，护兵前呼后拥，好不威风！高岗的心里真是又恨又羡慕，暗暗下定决心：长大以后也要带兵打仗，杀富济贫，为穷人报仇！也要做这样威风凛凛，出人头地的人！他承认，在他入党的动机里面，就参杂着这些很原始的复仇念头。

他的老家武家坡高家村离闯王李自成的老家李继迁寨 1 只有 20 多华里，无数流传于民间的有关李闯王的故事哺育他成长；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刚毅的性格，也练就他强健的体魄；军校的生活为他实现童年的梦想创造了条件。在他的一生中，虽然离不开民主革命大背景的影响，但闯王精神始终伴随着他，给他力量、智慧和勇气，也给他辉煌。他后来虽然成为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却更像个草莽英雄，江湖好汉。

二、艰难创业

继续翻阅记录草稿，提纲中简单写着：

大革命失败、共产党员大批清党叛党。

1930 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 年赶走。

1933 年 1、2 间领导兵变；6 月、红二十六军全军覆没；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省委大破坏、中心转到桥山根据地（照金）。【注 2 照金属陕西省耀县，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南端，地势险要，梢林密布。历史上曾是黄巢起义的根据地之一。陕甘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过。（高岗反省的原始记录稿中写为“兆金”）】

我说过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那时觉得恢复党和军队、根据地、

自己有功劳。

再往后，便是他详细的叙述。

（一）“借水养鱼”计划失败

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西安的形势骤变，中共陕西省的党组织陷入混乱的状态。军校负责人史可轩（中共党员）得知敌人的抓捕名单（其中有高岗）后，立即设法通知他们转移。高岗在敌人搜捕前仓忙逃离军校，在一个朋友家里躲藏了几天，然后乘夜翻过城墙，趟过护城河，回到横山参加当地党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1928 年春，高岗得知刘志丹等在渭南、华县一带举行武装暴动【注 3 即渭华暴动。1928 年，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渭南，华县一带，率领国民党西安驻军政治保卫队和中山军校的学员千余人，配合当地农民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工农革命军和工农民主政府，坚持了一个多月，最终失败。】的消息，急忙赶去参加。途中听说暴动失败，只好返回横山。

1928 年，陕北大旱，灾荒一直延续到 1929 年春天，草根树皮全被吃光，赤地千里。饥民们卖儿卖女，四处逃荒；贪官污吏和富商大户相互勾结，乘机巧取豪夺；反抗官府和杀富枪粮事件时有发生。高岗和横山的同志们一道，领导农民抗粮抗捐，救济灾民。他因此被捕，幸被友人营救，才免遭杀害。

1928 年冬，高岗调任中共延安区委委员，从此改名为高岗；后来去陇东搞兵运时，化名高硕卿。

1929 年春，根据党的“六大”精神，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派大批党团员到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借水养鱼”，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会后，刘志丹来延安传达党中央“六大”精神和特委决议，区委进行了分工，高岗负责区委军事组。从此，延安区委加强了对各地饥民斗争的领导，建立农民武装，继续开展打土豪，分粮度灾斗争；同时，高岗利用国民党员的合法身份，在当地驻军高双成部的官兵中广交朋友，进行秘密串联，为发动兵变做准备。

然而，在即将举行兵变的关键时刻，因叛徒告密，兵变计划失败，中共延安区委遭破坏，各县的党支部也都瘫痪。一时间，延安城里风声鹤唳，戒备森严，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万分危急之时，高双成部队的一个炊事员帮助高岗乘深夜从城墙底下的排水洞爬出城去，一路北行，并把安塞的秘密游击队带往保安（今志丹县）一带寻找刘志丹的队伍。

1930 年春，蒋阎冯中原大战前夕，【注 4 1930 年 4~9 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在河南发生的战争，亦称中原大战，以阎、冯失败告终。】陕北特委乘宁乡苏雨生部扩军之机，先派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秀山等 40 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该师八旅十五团（副团长张东皎是中共党员），成立学兵队，建立了中共党支部，高岗任副大队长兼分队长，张秀山任支部书记。

是年夏秋，八旅脱离苏部，学兵队乘机夺了一批武器，到靖远、定西一带，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1 年 2 月，学兵队的学员毕业，大部分分配在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去当连、排长、司务长或文书。但我党并没有掌握这支队伍，“借水养鱼”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1 年 4 月，高岗和张秀山离队到平凉与刘志丹会合后，来到陈国璋新编十三师。陈任命刘志丹为旅长，张秀山任十一旅手枪队队长，旅部驻宁县一带。刘志丹借十一旅之名着手建立革命队伍。高岗发展十一旅与省委的联系。7 月，刘志丹收编土匪武装时，遭遇叛徒，被迫离开部队去了南梁，虽然张秀山等 18 名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十一旅，但建立革命军队的计划再次失败。

“借水养鱼”计划屡遭失败，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虽然兵运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时，要同敌人讲联合，实乃一厢情愿。建立革命武装，还得靠自己。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高岗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说：“党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很肤浅，并有

盲动倾向。多次兵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搞单纯军事行动，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依靠农村大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而是企图进行阵地战攻占城市。总之，没有当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作指导，就必然失败。”

（二）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

在保安县西南，有一片地跨陕甘两省、方圆数百里的南梁山，又称南梁堡，分属保安、甘泉、庆阳、合水四县管辖，但实际是“三不管”，而由当地民团或哥老会管理。这里遍地梢林，交通不便，常有土匪出没。这些土匪和哥老会成员，多为从横山。三边和米脂等地逃荒而来的破产农民。他们苦难深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早在1929年，刘志丹就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建立陕甘游击队

1931年7月，刘志丹从平凉来到南梁地区。10月，建立四百多人的陕甘游击队。不久，白锡林率领的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也在其中）西渡黄河，会同陕北商队的“保运武装”约二百余人，经安定到合水与刘志丹会合。11月，谢子长叶来到这里。

1932年1月，省委决定合并这三不分武装，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高岗任二支队二大队指导员。不久，就发生了“三甲原事件”。 2　 2月，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高岗任队委会（即党委）委员兼二大队政委。这是第一次在陕甘边区树起工农红军的旗帜。

游击队初建，成分相当复杂，思想觉悟和纪律也较差。部队党委利用在照金休整之机进行整军，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纪律，部队的素质明显提高。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得到较大发展，建立了包括旬邑县城在内，以寺村原为中心的72村根据地。然而，由于陕西省委的错误领导，当年4月，这块根据地就丢失了。

2、“临镇脱逃”与西华池起义

1932年6月初，部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主攻，高岗率二大队在东山寨侧面掩护。战斗失利，五支队被冲散；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东山寨，阵地被夺。部队撤到集义镇休整时不见高岗。以为他擅自离队，决定开除其党籍。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高岗“临镇脱逃”事件。

然而，高岗并未“脱逃”。部队被冲散后，他正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却被中队长党宜山强行缴了枪，拉出20来人，胁迫他一起脱离主力部队，向西转移。走到麻同川东面，天已黑，见有十几个人迎面而来。经询问，是高朗亭率领的延川游击队。于是合编一起，取名“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有高岗和高朗亭带领，进行向西寻找主力部队。

转战中，在安条岭突遭民团伏击，高岗腿受重伤，跌入深沟树丛中，昏迷过去。醒来时，部队已不知去向，敌人也了无踪影。他艰难地爬到一农民家养了几天，稍恢复体力，即转移到化池地区一朋友家继续疗伤。其间，得知1930年他所在的新编第八旅就在西华池一带驻防，共产党员高鹏飞、李树林等额仍在该部担任军官。他非常兴奋，伤未愈即来到西华池，一边养伤，一边策划起义。此时，他又获悉刘志丹的队伍就在宁县盘克原一带活动，遂派人去联系。

经过周密策划，1932年7月19日，高岗和高鹏飞利用部队操练之机，拉出两个连近二百人、枪，带到盘克原，与刘志丹会合。

这是几十次兵变中最成功的一次，全军欢庆。这次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对后来建立红二十六军起了重大作用。高岗向部队党委汇报了他离队的经过和受伤养伤、策动起义的情况，所谓“临镇脱逃”的真相大白，部队党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其职务。

“临镇脱逃”和西华池起义，是高岗政治生涯中的两个重大事件。20多年后，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又有人提出“临镇脱逃”问题，高岗专门写了书面说明。【注5 关于高岗“临

镇脱逃”的问题，直到全国解放后，阎红彦多次揭发，近年还有报刊登载阎的揭发材料，可见影响之大。】

3、红二十六军建立与南下失败

1932 年 12 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派省委书记杜衡到部队进行改编。他先后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和转角镇召开游击队党员大会，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打游击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高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等口号，要求“在西安附近建立苏区、争取全省胜利”；宣布省委的决定：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争取近期内组建一个师，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开创根据地；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等人的职务，调离部队。后经同志们力争，总算把刘志丹留下当了团政治处处长，其他人还是调走了。

这就是高岗反省时所说的“1930 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 年赶走”。

1933 年 3 月，成立陕甘边特委，【注 6 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密、秦舞山等。】同时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主要在三原、富平、耀县、高陵一带活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6 月，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

此时，杜衡不顾省委指示和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刘志丹率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省委得知后，立即派人赶去拦阻，但已来不及了。结果，红二团在敌军围追堵截下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牺牲一百余人，弹尽粮绝，在终南山被打垮，刘志丹等领导人下落不明！

4、耀县起义与省委大破坏

1933 年春，省委派高岗到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注 7 王泰吉原是中共党员，1928 年渭华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策应兵变。经过慎密策划，王泰吉于 7 月 21 日率部起义，并收编了城里的民团、警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全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一些农民参加起义队伍，总计约有千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高岗回省委汇报；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南下，沿途遭敌人的阻击，损失惨重。转而北上照金，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时，仅不到二百人、枪。

1933 年 7 月 28 日，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店开会听高岗汇报，突然闯进一群特务。贾拓夫（省委秘书长）和高岗冲出饭店，其他人都被捕了。他们二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后，贾拓夫派高岗为省委特派员回照金整顿党组织和部队，自己去北方局报告情况。【注 8 贾拓夫到北方局汇报后，奉命去上海寻找党中央。此时党中央已转移到中央苏区，贾又前往苏区，以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

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致使陕、甘两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西安城里四处张贴着敌人的布告和通缉令，报纸上赫然登着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高岗的布告。他一时无法出城，只得躲在杜斌丞【注 9 杜斌丞，教育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等职。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和抗日斗争，并做出重大贡献。1947 年 3 月 20 日被胡宗南杀害。】家里等待时机。几天后，杜斌丞以上坟为名，将高带出城。

从此，陕西省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5、陈家坡会议与包家寨会议

1933 年 8 月初，高岗辗转来到照金，此时的照金处境十分险恶。

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敌人四处散布“刘志丹已被处决”的谣言，张贴悬赏捉人的不高和通缉令，并不断发动对照金的“围剿”。留在照金的干部战士人心浮动，一些人产生悲观情绪。

在这关键时刻，高岗带来省委的指示，无疑是雪中送炭。

1933 年 8 月 14 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商讨整顿、壮大

红军主力，以及对红军和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参加者有陕西省委代表高岗、陕甘边特委领导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耀县游击队的领导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及其中的党员干部、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的领导人及其连以上干部。高岗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党组织和部队的指示，提出把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但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省委已经没有了，哪还有什么省委特派员和省委指示？既然红军垮了，根据地也没有了，不如分散队伍，各自回原地区进行秘密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主张回渭北地区发展；多数同志反对这些主张，拥护省委的指示。经过激烈的争论，统一了思想，会议决定成立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主力、游击队和义勇军，选举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会议为红军确定了打小仗不打打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红军主力部队，深入陕甘边区打击敌人，巩固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会后，在特委主持下，把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统一编为主力部队；同时组建了六支游击队，主动出击，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集中打击照金附近的地主武装和民团，夺取物资，武装自己，连连获胜；巩固、拓宽了根据地，改善了装备，锻炼并鼓舞了干部战士。1933 年 9 月中旬，高岗奉命率主力部队一举打下旬邑县城，开仓分粮，发动群众斗争反动官僚恶霸。这是红军总指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军威大震、青年农民踊跃参军，红军发展到六七百人。

1933 年 10 月初，部队带着缴获的物资返回照金，适逢中秋佳节，军民共庆。恰在此时，刘志丹、王世泰等人从终南山脱险后辗转回到照金，更是喜上加喜!

从 1933 年 8 月以来，敌人不断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围剿”。10 月，敌人又纠集四个团的兵力和附近各县民团六千余人，发动第五次“围剿”。面对强敌，红军被迫转到外线作战，来到南梁。敌人很快占领了照金根据地。

照金根据地失守后，红军向何处发展？

在红四十二师创建之初，刘志丹和高岗，张秀山等人就曾议论过：“狡兔三窟“，红军也不能只有一个根据地，除了渭北以外，还要在陕甘边和陕北创建根据地，这样，红军和游击队才有回旋之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明确了。

1933 年 11 月上旬，陕甘特委的部分成员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今后的发展方向和恢复红二十六军问题。会议总结了前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并作出三项决定：

（1）恢复二十六军，把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为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兼师党委书记；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改编为红三团，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后叛变）为团政委。

（2）建立陕北（以安定县为中心），陕甘边（以南梁为中心）和关中（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开劈、扩大根据地。红四十二师以南梁为中心，在三个地区机动作战，帮助开展武装斗争，逐步扩大根据地。

（3）由于照金地区邻近公路和西安市，且地域狭窄，不利于红军的发展。会议决定创建南梁根据地，并将红军的指挥机关转移到南梁。

陈家坡和包家寨两个会议，是西北革命关键时期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对陕甘和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与陕甘宁根据地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也是高岗最引以为荣的事之一。

从此，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在陕甘边、陕北和渭北地区展开游击战争，部队由少到多，有弱到强，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南梁根据地有小到大，红四十二师兵员千余人，扩编为五个团的建制；游击队发展到 1500 余人；南梁根据地初具规模，相继在陕甘两省

的 18 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和党组织。1934 年 11 月 7 日，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主席，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发展生产、开展文化教育、禁毒、放足等一系列政策法规，指导边区的各项工作，为后来陕甘宁边区建设创造了经验。

就在形势稍有好转时，1934 年 1 月，高岗在一次战斗结束后，因侮辱妇女而受到严厉批评，并被撤销师政委职务，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

1934 年 2 月，敌人重兵“围剿”陕甘根据地，四十二师主力到外线作战，高岗率游击队坚守南梁，配合主力部队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时整顿并扩大了游击队，主动寻机出击，并为主力部队补充了兵员和给养。5 月，主力部队胜利返回南梁。此时，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东西四百公里、南北七百公里的 20 余县。

1934 年 5 月 28 日，陕甘特委和四十二师党委在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鉴于高岗在坚守南梁期间所作贡献，会议决定撤销其处分，恢复其师政委的职务。

6、陕甘、陕北一片红

自从 1933 年 7 月省委遭破坏以后，陕北、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就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期间，他们虽然多次派人寻找上级组织，但均无结果。同时，由于中共北方局多次遭破坏，也未派人前来过问这里的情况。

与陕甘根据地发展的同时，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在陕北特委（马明方特委书记）的领导下艰苦地进行着。根据 1933 年 11 月包家寨会议决定，成立第一路游击队指挥部，加强了对这一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但由于陕北和陕甘被敌占区隔断，且敌人统治力量较强，所以陕北的形势仍很严峻。1933 年 12 月以后，贺晋年、谢子长、郭洪涛先后回到陕北，【注 10 贺晋年于 1933 年春在兰州策动兵变失败后，辗转于 1933 年 12 月中旬回到安定老家参加当地的斗争。谢子长于 1932 年月被迫离开陕甘，到上海学习了一段后，回到北方局，先后派到吉鸿昌部队和张家口工作。1933 年 12 月底，派回陕北人北方代表驻西北军事特派员。郭洪涛原在太原。北平工作，1934 年 2 月回陕北，任特委组织部长。】进一步加强了特委的领导，整顿、发展了游击队，扩大了游击区。1934 年 7 月上旬，成立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国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

1934 年 7 月，敌人调集兵力准备“围剿”陕北游击队。谢子长和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共商反击敌人“围剿”，及统一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领导之大计。

1934 年 7 月 28 日，在阎家洼子召开陕甘、陕北两特委和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红四十二师党委领导人联席会议，主要议题是总结红四十二师前阶段的工作；传达上海临时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讨论红二十六军北上，帮助陕北地区反击敌人“围剿”，以及统一两个地区党和军队领导问题。

会上，谢子长宣读了北方局给红二十六军的信，信中置红二十六军和陕甘游击队的斗争成绩于不顾，指责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林主义”、“土匪路线”等等。当时大家不知道中央有王明“左”倾路线，想不到日思夜盼，好不容易盼来的上级指示，竟是当头一盆冷水！会议又重提高岗的错误，决定再次撤销其职务，由谢子长接替四十二师政委。

这时，榆林的井岳秀部纠集各县民团共 1.5 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尽管陕甘边的同志对北方局的指示信很想不通，但还是以革命大局为重、决定派刘志丹率红三团到陕北帮助进行反“围剿”，并送给陕北游击队许多武装、物资和经费，欢送他们回陕北。

阎家洼子会议虽然推行了王明“左倾”路线，但对陕甘、陕北两个地区的斗争仍起了积极作用，它加强了两个地区党的联系与军队的统一协调，加快了陕北根据地的发展。

1934 年 8 月，陕北第一次反“围剿”获胜，游击队壮大、分散在 16 个县的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由于谢子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负伤，陕甘特委和军委决定，在他养伤期间，由张秀山接任四十二师政委。10 月，中共北方局巡视员黄翰来到陕北，看到谢子长伤重，提出调刘志丹到陕北，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地军队的工作。

1935 年 1 月 31 日，在白岔庙，由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等主持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第一团，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师政委；贺晋年任第一团团长，马佩助任团政委。同时成立了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选举马明方为主席，崔田民等为副主席。

1935 年 2 月 5 日，陕甘。陕北两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二十六、二十七军和陕甘、陕北两地的其他武装力量：并决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谢子长任副主席，高岗、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选举惠子俊任书记。2 月 21 日，谢子长不幸去世，高岗接任西北军委副主席。

1935 年 4 月，国民党又调集陕、甘、宁、晋四省军队共四、五万人，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当时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尚未连通，敌我力量悬殊。在紧急情况下，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总政委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经过半个多月协同作战，连连获胜，5 月 1 日，两军在白岔庙会师。至 6 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从此，陕甘、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在 20 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发展到 3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数年的艰苦奋战终于迎来了陕北、陕甘一片红。

1954 年，高岗反省这段斗争时说：“过去，总是不认为陕甘根据地的成就是党的领导，许多干部的创造，而是挂在自己的帐上。当时，刘志丹、谢子长他们在山里搞，各方面都不成熟，只搞了一个根据地。我提出“狡兔三窟”，搞了照金、南梁、陕北三个游击根据地，觉得关键时候恢复了党、军队和根据地，自己在这里面起了作用。这本来是集体领导和人民创造，不是你一个好汉英雄搞起来的。但自己念念不忘，我曾说：‘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桥山’。把自己估计高了，把自己的作用夸大了。”

（三）错误“肃反”和中央营救

1935 年 7 月，敌人又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的军队十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地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

在这紧急时刻，朱理治、聂鸿钧等组成的中共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来到陕北。他们置敌人的重兵“围剿”于不顾，却以自己的同志为敌，急不可耐地先夺权，后“肃反”，几乎断送陕北红军和苏区。

1935 年 7 月 15 日，朱理治、聂鸿钧在永坪镇主持召开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指示信，【注 11 北方局的五封信，即 1934 年 7 月 13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致陕北特委的信；11 月 9 日给红二十六军同志的信；1935 年 4 月 5 日中央驻北方代表与河北省委给陕甘特委及全体同志的信；1935 年 5 月 10 日机密指示。】并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说什么“国民党面临全面崩溃，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要求西北党“迅速创造一块包括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已退出该苏区）的根据地”；“打通新疆、内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等等；要求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镇”、“不让敌人践踏苏区一寸土地”；为了清除不同意见，还要求在党内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

当时，刘志丹、高岗等正在前方指挥作战，没有参加会议，他们率领红军主力于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消灭了绥德境内的晋军两个团，迫使晋军仓皇逃回山西；红军乘势解放了佳县、吴堡、绥德等县大片土地。然后回师延川文安驿休整，紧张地准备南线作战。

这时，朱理治河郭洪涛赶到文安驿，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北方局的五封信和永坪

会议决议，号召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右倾调和主义的残酷斗争”，“必须把斗争深入到全体党员中去”，并要改组领导班子。

刘志丹等广大指战员认为大敌当前，当务之急是反“围剿”，而不是搞什么“反右倾斗争”！朱理治等未能得逞，只得回去酝酿更为残酷的斗争。

1935 年 9 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鄂豫陕苏区的红 25 军，经过长途转战到达陕北，三军会师，军民欢腾。

第二天，9 月 17 日，朱理治主持召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研究会师后统一领导和下一步军事行动等问题。他们利用红二十五军远道而来不了解情况之机，操纵会议做出三项决定：1、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自任书记，原西北工委成员一个都不保留；2、改组西北军委，聂洪钧任军委主席，红二十五军的戴季英为保卫局长兼参谋长；3、将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1953 年 10 月初，新组建的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全歼东北军一一零师。战斗中，高岗亲临战场，赤膊上阵杀敌，给战士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陕北苏区扩大为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南北长两千余里，东西宽一千多里的广大地区。红军发展到近五千人，游击队四千多人，已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这时，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机关从永坪镇转移到瓦窑堡。

当时的情况很不正常。面对敌人的大举进攻，一方面是刘志丹、高岗等率领部队在前方浴血奋战，捷报频传；另一方面是朱理治等人在背后捅刀。正当反“围剿”最紧张的时候，针对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一场最黑暗、最残酷的党内斗争——“肃反”开始了。

1935 年 10 月 4 日，聂洪钧传令徐海东：立即逮捕刘志丹、高岗、杨森等人。徐海东怕发生意外，并且他从缴获的敌人电报中得知，中央红军已到达甘肃静宁，有来陕甘的迹象。因此他没敢轻举妄动，表示：为避免弄错，最好等中央来解决。

但朱理治等人却急不可待地要抢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解决问题，一计不成，又派程子华到前方，程也没敢下手。后来只得以“调工作”.“开会”为名，分别秘密诱捕刘、高等人；继而又扣押了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和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甚至连警卫员也不放过。

保卫局长戴季英心怀鬼胎，怕被捕的同志在转移途中被群众认出，竟把他们打扮成俘虏，用白布袋套头，只挖两个洞露出眼睛（颇像三 K 党）；脚戴重镣手上铐，或用麻绳捆成一串，引来群众围观，都说是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对他们吐口水，扔石块，百般嘲弄。

被捕的同志被关进瓦窑堡保卫局的监狱，受尽折磨，每天都有人被拖出去杀掉。在高岗他们牢房的后院，挖了一个大坑，随时准备活埋“犯人”。高岗编了顺口溜：“手绑麻绳脚带镣，身上披个烂麻包，头上戴个‘八卦帽’，光脚丫子满地跑”。为此又招来毒打。

这次错误的“肃反”造成陕北党内最大的冤案，并给西北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期间有二百多名党的干部被杀害；使苏区群众对红二十五军丧失信任，说他们是假红军，见了就逃避；也使各部队之间互相猜疑戒备，甚至发生冲突；部队开小差的增多了，不仅战士逃跑，干部也逃跑，甚至有乘机叛乱的。地方干部怕见省委的人，听说省委来人了，就逃上山……敌人则乘机反扑，夺回他们的地盘；地主豪绅也疯狂反攻。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面临着毁灭的危险。

正当陕甘苏区党和红军被“左”倾路线整得七死八活，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1935 年 10 月下旬，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还是在 1935 年 9 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出草原打下腊子口后，看到敌人报纸上关于“围剿”陕北红军的消息，立即交给中央。当时红军正不知向何处去，有人提出向宁夏—内蒙—甘肃方向去，打通国际通道。发现陕北有红军和苏区，毛泽东非常高兴。9 月 20 日左右，成为在甘南哈达铺开会，找贾拓夫来介绍陕北的情况，研究是否去陕北的问题。

1933年陕西省委破坏后，贾拓夫去北方局汇报，有北方局介绍去上海找中央报告，辗转来到中央苏区，后来随军长征回到陕北。这时，他详细介绍了1933年以前陕北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常委们决定到陕北去。

1935年9月27日，中央在通会的邦卢镇开会，正式决定吧陕北作为长征的“落脚点”，把中央红军改为陕甘支队。会后，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带电台去寻找十五军团。

当时陕北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国民党十万重兵围剿；二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大搞“肃反”，刘志丹、高岗等一大批领导骨干被关押，生命危在旦夕。幸亏中央红军及时赶到，挽救了陕北红军和根据地。

中央红军一到吴起镇，就有人向他们反映陕北“肃反”的情况，毛泽东立即命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 3 陕北有救了！

1935年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到达十五军团驻地下寺湾，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听了郭洪涛和聂洪钧汇报后，毛泽东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杀头部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 4

1935年11月中旬，张闻天等带领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立即组成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小组调查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经过认真调查，党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搞错了。随即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同志。

1935年11月26日，中共西北局作出《检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个别领导人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以至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

但是，这个决定仍然认为，“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陕甘边区南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态度的错误，以至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等等，这就使陕北“肃反”的错误没有彻底纠正，以至后来对原陕甘苏区党政军干部的工作安排也受到影响。直到七年后的1942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新的决定，才明确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指出：“中央及党务委员会 1935 年 11 月间的决议，除对戴继英、聂洪钧两同志的处分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1935年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代表党中央为刘志丹同志平反。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出席会议。张闻天说：“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同志的处理是个冤案，应该纠正”；他宣读了“中共中央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分配工作。

1935年12月中旬，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刘志丹、高岗等同志，询问其健康情况，并说：“你们受委曲了。但对应该革命者来说，坐牢也是一种考验，又是一种休息。”他还说：“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搞起革命的。这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究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 5

三、在陕甘宁边区

刘志丹和高岗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毛泽东看中的西北领袖。

平反以后，党中央没有调整陕北苏区的领导人，刘志丹和高岗等都没有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高岗现实被安排在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负责扩军和筹款。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1936年1月，被派到内蒙任陕北骑兵团司令，率部到长城沿线及内蒙伊克昭盟地区开辟工作。说是骑兵团，其实只有13个人和枪，几乎是白手起家。伊克昭盟群众基础

差，党的工作薄弱，工作和生活都非常艰苦。

高岗心里充满矛盾，他在反省时回顾这一段经历，满怀感慨地说："郭洪涛派我带了 13 个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经常打仗。当时认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苏武牧羊，迟早会被郭洪涛害死，不如去出家当和尚。志丹去山西前，我和他谈了自己的想法，他批评了我，我也明白自己的想法不对。后来他牺牲了，我发狠在蒙古地干出样子给他们看。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与其这样被人家整死，还不如去当和尚、挑大粪；在生活上开始放纵自己。后来他曾向张秀山透露过这种心态。

他带着这种心态来到内蒙，与当地的汉蒙游击队一道驰骋在贫瘠的荒漠和茫茫草原上，打击土匪、反动民团和国民党军队。不久，高岗被派往三边，【注 12 三边，指三边与内蒙交界的靖边、定边、安边。】特委任蒙古工作委员会主任。在此期间，他学习、贯彻党中央的一系列对蒙古工作的方针政策，并组织部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蒙族的风俗习惯，加强纪律教育；把部队分散到村户，广泛深入宣传，争取蒙族上层人士同情抗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队所到之处纪律严明，没买公平，带领群众发展生产，很快得到群众拥护。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并建立了党群组织；同时，以蒙汉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了保安部队及其指挥部，高岗任司令员，统一指挥三边、伊克昭盟各县、旗的部队、游击队和自卫军。

在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感召下，乌审旗王府保安司令部副官奇国贤、保安团副团长奇金山、奇国华、王爷府营长那素、保安队中队长王悦丰等，于 1936 年春先后投奔红军，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武装。民族工委还在定边设立蒙民招待所，接待和联络蒙族人士，开办训练班，培训蒙族干部。红军开始西征以后，高岗率骑兵团河蒙汉游击队协同西征主力部队作战，保障后勤。三边地区解放后，高岗率骑兵团向鄂托克旗进军，开辟绥蒙后套地区；蒙古工委将三边地区被反动军阀马鸿逵控制的大盛池交给当地的蒙族人管理，受到蒙族人的欢迎。

经过艰苦努力，他们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信赖和拥戴，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1936 年 9 月 15~17 日，高岗列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了开辟绥蒙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及对今后工作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赞扬。这是他第一次出席党中央的高级会议，第二次见到毛泽东，并给毛泽东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1937 年 3 月，随着苏区向宁夏扩展，蒙古工委改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仍有高岗主持工作；同时将蒙民招待所改为蒙回招待所，分别成立了蒙、回民族学校；扩建了蒙汉支队，建立回民支队。

这个时期，高岗远离党中央独立活动，缺少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监督，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生活上放荡不羁，沾染了不少流氓无产者的思想作风，是他后来在私生活方面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

（一）走上领导岗位

出任边区保安司令

1937 年 5 月 15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高岗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他却获得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的 17 位执行委员之一，并在党中央未提名的情况下，全票当选为边区党委书记。尽管当时党中央还是任命郭洪涛为边区党委书记，可是缺席获全票的事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不久，高岗被任命为中央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书记。

"七·七"事变后，根据国共两党协议，8 月下旬将；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八路军，总共只有三万多人， 6 其余的红军都改编为八路军留守部队（保卫党中央、陕甘宁）和地方部队。9 月，讲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辖三省的 23 个县），高岗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之一。随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高岗任保安司令。11 月，任八路军骑兵司令，率骑兵团到三边 7 及其北部一带，联合蒙族同胞开展剿匪和抗日游击活动。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不知道边区党代会上我得了全票。中央调我回来，我还以为又犯错误了，对人家说，这次回家凶多吉少。回来以后才知道是党代会得了全票。先在毛主席那里

（中央军区）做一局局长，后来当保安司令。”

当时边区的形势十分险恶：一方面是山西的日军不断侵犯黄河河防，轰炸和炮击河西的城镇；一方面是国民党 30 万军队的重重包围，对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唆使边区的反动势力捣毁抗日组织、攻击抗日军政机关、杀害我工作人员及群众；并调集数十万军队先后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三次较大规模的进攻，妄图消灭边区。同时，在边区内部，匪患严重（其中三边地区张廷芝是被我打散的国民党残部，流窜为匪），成为边区的心腹之患。

高岗上任后，根据毛泽东在洛川会议提出的“保存和扩大红军”的任务，8 立即着手对陕甘宁边区的地方部队和自卫军进行整编。

首先，将原有的地方部队、游击队和警卫部队改正编为保安部队，将边区划分为若干警备区，设立警备司令部，明确各保安部队的驻守区域和任务，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其政治军事素质和战斗力，配合八路军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的重任，随时准备参加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第二，将原有的赤卫军改编为抗日自卫军，明确自卫军的性质是“半军事性质的群众性抗日武装组织，同时是抗日的后备军”。其任务是，平时生产练兵、维护社会秩序，战时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担负战勤任务。到 1938 年底，边区从村到乡、县都建立了抗日自卫军。

保安部队紧紧依靠边区人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坚决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粉碎其三次反共高潮和对白区党疯狂进攻；改造了旧政权和旧保安队，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巩固亲率保安部队，在八路军留守兵团的配合下，经过两年反复清剿，先后剿匪 40 多股，彻底肃清了边区的匪患。他后来回忆说：”去三边打土匪，认为自己还不错，三个月九肃清了。其实这是党中央、留守兵团、群众的力量。”

保安部队和自卫军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保卫千里河防，动员大批人力、畜力渡河支援山西抗日战场。巩固亲自沿河视察，慰问守防阵地官兵；到野战医院和沿途兵站看望慰问伤病员，了解部队的伙食与医疗情况，勉励伤病员安心治疗；要求医护人员和驻地的群众像对亲兄弟一样护理好伤病员。

1942 年 5 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保安部队编入正规部队，由联防司令部统一指挥。贺龙任司令员，高岗任副政委。因政委关向应生病，由高岗代行政委职。此时，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达四万余人。

走上党政领导岗位

1938 年 4 月，党中央决定改组边区党委，任命高岗为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

他初涉边区领导工作没有经验，遇到不少问题，产生过畏难情绪。正如他所说：“边区党委的工作很难搞，心想：‘边区麻烦，不如当地委书记，挑大粪也好’，‘去他妈的，不如去挑大粪’”

党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的干部到边区工作，手把手地教他，才逐步成熟起来。1938 年 11 月，中央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高岗是委员之一。1941 年 5 月，他出任西北局书记，主持全面工作。1946 年，他又连任第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注 13 1946 不安吧 4 月召开边区第三届参议会一次会议时，高岗虽然已经调到东北工作，但仍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培养下，高岗的工作获得了全面丰收，他本人也获得了很高的荣誉。1945 年党的“七大”期间，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高岗的这段历史，就是人们所说的“西北起家”。

然而，他在工作中，往往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在反省时，不无愧疚地说：“1938 年到边区党委。过去肃反，王明、郭洪涛的错误的。现在自己做了保安司令，做了书记，如果更谦虚谨慎，和不同意见的干部一起工作，那就好了。可是自己的能力的不成熟的，我却觉得仇恨，很狭隘。”

（二）建设模范边区

高岗在任期间，重点抓了边区的民主建政、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及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工作。

陕甘宁边区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3个县，总面积12.9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安徽省），人口150万（1938年状况），人少地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由于脱产人员大量增加和国民党的封锁（他们叫嚷“不让一颗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边区各方面的工作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困难。

中央到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战以来，延安的部队和公务人员逐年增加。1939年以后，国民党重兵伺机进攻边区，中共中央被迫从前线陆续调回军队保卫边区，党政军脱产人员由1937年的1.4万人，猛增至1941年的7.3万人。虽然中央规定党政军脱产人员不能超过人口总数的3%但实际已达5.4%。群众的公粮负担也因此逐年加重；1937年征公粮1.4万石（一石为五百斤），占边区粮食总产量的1.28%，每人平均负担仅一升，是是很轻的。以后逐年增加，至1941年激增至20万石，公粮已占总产量的13.8%，每人平均负担达一斗四升，比1937年增加了十多倍。 9 人民负担加重，必然会引起不满。

另一方面，边区的财政收入却锐减。原来边区财政收入的相对一部分是来自海内外爱国人士及抗日团体的捐助，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军饷等。这些收入占边区财政收入的比重相当大。 10 1940年10月以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加上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邮路，外援从此断绝。毛泽东曾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11

边区党委对边区的经济状况极为焦虑，高岗说：“短时间加重群众负担可以，长期下去群众受不了。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止境地搜刮老百姓呀!”他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归结起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两条：发展生产和节约开支。高岗说：“建设边区就是今天党政军民共同的中心任务”，“建设的另一面，就是精兵简政，就是减少一大批脱离生产的人员，转入生产，就是减少各种不必要的开支，厉行节约。”

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建议，被边区政府和中央采纳。【注 14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极其重要的政策》中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主席说：“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和“精兵简政”两项重要方针，取得重大成果。

1、大生产运动

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作出《关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强调党和政府要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为了解决边区的生存问题，毛泽东和高岗进行了长谈 ，了解陕甘宁的自然资源，研究发展生产渡过难关的办法。他们一致认为，只有把部队、学校的人员都动员起来，自己动手，发展生产，不愁没有活路。这就叫“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于是，党中央向全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支持抗战”的号召。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闻风而动，成立了以高岗为首的边区总生产委员会，要求党政军民机关加强经济建设，全区财政实行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政策，增加政府收入，改善吗、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才、生产运动迅速展开。

三边地区盛产食盐，是与外界交换的重要物资。八路军359旅的1200多名指战员进驻定边盐湖，大搞盐田建设，使盐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1941年4月成立了食盐督运委员会，除

部队运输外，边区政府还组织群众冬闲时到三边运盐，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1941 年 10 月，西北局第一次高干会进一步提出“加强农业生产，大力发展私人手工业，帮助建立家庭纺织业生产”的工作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变工队、互助组、合作社；政府在财力和技术上给农民以帮助和扶持；设立农业学校、公营农场和自然科学研究院，进行技术试验和推广，指导农民改良生产技术。同时，边区政府发布了优待移民的政策，妥善安置难民，吸引他们到边区参加生产；把军队、机关和学校都动员起来，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发展农工业、商业、运输业等多种经济，千方百计减轻人民负担。

1942 年春，针对一些高级干部对经济建设不够重视的倾向，西北局要求加强对经济建设的领导，把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民主建政结合起来。高岗说：“什么是民主？民主的头一条酒啊要农民手里多有些小米，就是要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所以，民主与建设其实是分不开的。”

在 1942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3 年 1 月 14 日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重要演说，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大生产运动。

1943 年 1 月，西北局召开各职能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部署机关生产任务。高岗要求各机关、学校、部队等单位，争取在粮食、肉、菜等方面达到自给有余。同时，边区政府决定发放农业贷款两千万元，帮助贫困农民发展生产。

1939 年到 1943 年，边区政府分别举办了三届工农业展览会，展示工农业生产成果，鼓励劳动模范，促进大生产运动。在 1943 年 11 月召开的边区首届劳模代表大会和第三次生产展览会期间，毛泽东到会发表了《组织起来》的演说。这次展览会的成果表明，陕甘宁边区基本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并提出 1944 年“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的新目标。

为了完成 1944 年的生产任务，高岗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业务会议，如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提出公私兼营、公私并重的政策；技术人员座谈会，要求技术人员进一步提高技术、提高效率，保证两年内做到边区工业品完全自给；在合作社主任会议上，高岗发表了《合作社要为群众办事》的讲话，要求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伟大号召，办好合作社。

在大生产运动中，高岗带头种了一块地，做到副食、被服自给；他还有一手纺线（纱）的好手艺，在机关里给大家做示范，教干部们纺棉花、纺羊毛。

大生产运动不仅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战胜了困难，改善了人民生活，为支持长期抗战打下了物质基础，而且也锻炼了干部，改变了传统观念，提高了干部战士的素质，改善了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

2、民主建政与精兵简政

毛泽东对李维汉说：“要搞好”三三制”政权，【注 15 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时，人员分配的原则是：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各占三分之一。

】此事，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带头搞好。 12

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根据党中央指示，在部分地区试行“三三制”政权，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恒古未有的民主改革，边区人民欢欣鼓舞，踊跃参加选举。改革亲自到试点地区视察，帮助总结经验，然后向全区推广。

1939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4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第一届参议会，宣告成立边区参议会，高岗当选为边区首届参议会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通过了边区党委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关于边区政府和参议会的组织条例、选举条例、高等法院组织条例和《陕甘宁土地条例》、《发展国防经济建设案》、《工作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案》等法规性文件。

1941 年 4 月 30 日，边区中央局提出试行“五一施政纲领”，确定了使边区“更加提高民主政治，发展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规定了发展农工商业的政策。

1941 年 11 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高岗和林伯渠分别连任参议会议长、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当选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通过了“五一施政纲领”和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提出的“精兵简政”等提案。

民主建政不仅体现在“三三制”，也体现在各党派真正行使权力。1942 年 1 月，高岗率考察团到绥德、米脂等县考察工作。他与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和各厅局长一起对政治、经济、军事、党务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研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考察中，一方面坚持党在统战工作中的领导原则，同时又放手让党委人士大胆工作，使他们有职有权，党内外的关系非常融洽。

按照精兵简政的精神，1941 年 5 月 13 日，中央决定边区中央局与西北工委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西北地区的工作，高岗任书记，林伯渠、谢觉哉、陈正人、肖劲光、王世泰、张邦英等为委员，贾拓夫、李卓然为候补委员。

西北局机关带头精简，高岗提出边区一级的机关减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员，合署办公，紧缩上层，加强下层。从 1941 年 12 月到 1944 年初，边区政府系统进行了三次大精简，裁减机构百余处，缩减工作人员数千名。13 同时，建立和改革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不仅在边区政府系统，还包括中央很西北局，根据《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的要求，要减去一些不急要的政务，重新划分和审定各级政府及工作部门的职权和业务，改善领导作风，首先改善高级机关的领导作风，全力搞好生产，教育两项急要和首要任务，做到生产第一，其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教育第二，其中又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简政工作结合整风运动进行，涉及政策、制度、机构、人事和业务，及领导作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精简中既要检查思想，也要检查工作。

经过两年努力，边区机关精简机构达到了“统一、精简、效能、节约和克服官僚主义”的预期目的。精简下来的干部一部分充实到生产和县、乡第一线领导，一部分送到各级党校学习提高。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使陕甘宁边区焕发出勃勃生机，人民当家作主，安居乐业，工农业及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与国民党统治区内外交困，民不聊生的独裁政权，形成鲜明对照。在 1944 年 12 月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和英模会议期间，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到会讲话，赞扬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和民主运动的发源地。

3、各项事业大发展

教育事业

党中央对干部培养十分重视，早在 1937 年 12 月，毛泽东、张闻天等久发出指示，要求招收青年学生到边区来。1938 年 3 月，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中央的神圣任务，强大的党组织是必要的”，“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因此，必须打破党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1944 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指出我党领导人民已经完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思想准备与物质基础。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必须在党的干部中提倡“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西北局和边区党委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边区党委组织部于 1939 年 9 月 23 日发出了“关于今后组织工作的指示信”，要求注意吸收工人与知识分子入党。12 月，高岗签发了边区党委“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要求大胆吸收各方面愿意为无产阶级关门事业奋斗到底的知识分子，并团结其他党派的进步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奋斗，按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欢迎知识分子到边区来参加建设和为抗战服务；号召“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工农干

部与知识分子互相学习，不务虚名，不摆资格。”

同时，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一直把文化教育工作当作第二件大事来抓。在1939年制定的“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实行普及免费的儿童教育，以民族精神与生活知识教育儿童，造成中华民国的优秀后代”，“发展人民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民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水平”，“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发展”。此后，又陆续制定了关于发展国防教育、新闻教育、卫生保健事业等方针政策。

根据这些政策，边区党和政府创办了党校、各种干部训练班和学校、研究会等，并在各地区建立中小学。延安保育院、保育小学收容了大批军烈属子弟和全国各地及海外来的儿童。延安中学、延安大学、民族学院、西北党校（高岗亲任校长）等一大批中高级学校及自然科学院也相继成立。到1944年，全区学校达1300余所，在校生四万余人，比1935年增加近十倍，边区成为一个“人才库”，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此外，还组织了许多识字班、夜校、冬学等，普遍建立读报组、图书馆、及各种文艺团体、文化促进会等等，使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起来。

少数民族工作

陕甘宁边区是多民族地区，高岗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了解当地民俗民情，积累了不少经验。他担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贯彻执行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多次对绥蒙地区的工作作出指示。西北工委设立民族问题研究机构，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1939年春，高岗只是绥蒙负责人：“你们必须注意培养当地干部”，“要记住，不从新党员中培养大批当地干部，尤其是蒙民干部，是不能把伊盟工作做好的。” 1940年春，西北工委先后制定了《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发至各级党委，指导民族工作。

这期间，西北工委组织了一些大型文化活动。如建立才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举行成吉思汗公祭大会；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10月，延安清真寺落成并举行典礼；成立中国回教救国会陕甘宁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1941年秋天，根据中央指示，由朱德和高岗发起成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10月26日，成立大会开幕，东方各国和国内的回教协会、蒙古同学会、藏族学会、彝族同学会等民族团体及18个民族的一百多位代表出席大会，选举朱德为主席，高岗当选为委员；毛泽东、朱德到会讲话，号召东方民族加强团结，共同战斗，反对法西斯。

1941年10月，成立民族学院，高岗任院长，来自七个民族的四百多名学员在这里学习。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研究我国民族问题及培养民族干部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边区的少数民族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对待蒙回两个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成绩的。”

（三）整风运动和历史总结

1942年春，党中央发出整顿党风的指示，并派任弼时（中央书记处书记）指导西北局的整风运动。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总学习委员会召开动员大会，任弼时作报告，要求用几个月是时间学习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通过整风运动，统一党的思想，加强党的领导。

随着整风学习的深入，重点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左”倾路线展开批判。同时，由任弼时负责，着手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重新审查。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即九.一指示)，强调党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统一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同时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和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 14

西北局根据中央要求，于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联系本地区实际，对边区的历史进行总结。高岗代表西北局作了《边区党的

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回顾了边区党的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几年来的工作，肯定了边区党委在 1938 年 5 月以后（即高岗任边区党委书记以后）所执行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于中央路线相符合的，并作出决定，纠正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以及把党政军民平列起来的错误观点，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与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确定了以发展生产，支援抗战为边区今后的基本任务。

1942 年 11 月 21、22 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张国焘是右倾分裂主义……向这三个路线作斗争，两个作了结论，一个还没有作结论（王明），你们现在作了一个西北的结论，是很好的。""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地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 15

1942 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 1935 年陕北（包括陕甘）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认为 1935 年 9、10 月朱理治、郭洪涛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的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二百名以上的党政干部……不仅完全是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并认为，在 1935 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央党务委员会 1935 年 11 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高岗在 1954 年反省时曾不无愧疚地说："当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郭洪涛受到很厉害的批判都能接受，现在被人家一批就受不了啦。"

西北高干会结束后，1943 年 1 月 29 日，西北局邀请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常驻委员的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传达了高干会精神，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扬。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说："这次会议是思想上与制度的大转变，将来贯彻下去，见诸实行，才是我们的收获。""去年共产党提出整风运动，秋后又开高干会，是把思想问题见诸实行，是一贯精神。""以伟大的党羽全国人民携起手来，才是伟大的作风"，"希望共产党要研究党外人士的心理，真能与党外人士合作。此不但党伟大，政府也伟大了。"

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非常高兴，批示："此种座谈会应每月举行一次"。

整风运动后期的审干工作中，西北局和边区党委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偏差。高岗发现问题后，立即找人进行调查，并先后向任弼时和毛泽东反映了情况。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指示，审干工作要"重调查研究，反对逼、供、信；做到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搞错了的坚决平反。中央派帅梦奇（中组部副部长）协助边区党委对错整错斗的人进行平反甄别工作；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亲自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指示组织部门安排好他们的工作。

（四）走上辉煌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成为其他解放区学习的榜样，高岗的威望也随之提高，他已不是刚从内蒙回来的那个满腹怨气，对工作无从下手的骑兵司令，而是一个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精心调教的攻击领导干部了。1943 年冬，西北局召开劳动英模大会，党中央、边区和各分区的党政机关向高岗献锦旗，赞扬他是"西北星辰"、"西北灯塔"、"西北人民的救星"。

1944 年 5 月 21 日至 1945 年 4 月 10 日，高岗参加了长达 11 个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并被推举为"七大"预备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大会副秘书长。毛泽东在关于"七大"方针的报告中说：

过去有的同志急躁，希望革命明天就胜利。但是可惜没有胜利，一拖拖了十年。有了 30 万党员，几十万军队，头大了，急躁起来了，结果只剩下了一个陕北。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

一个是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民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实验区。我们的一切工作先在这里进行试验，在这里开“七大”，在这里解决历史问题。

1945年4月，高岗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他的政治生涯登上新的高峰，走上辉煌。

“七大”结束后，1945年6月底，高岗主持召开了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二次西北地区高级干部座谈会。根据“七大”精神和党中央解决历史问题的办法，再一次对边区党的历史进行分析讨论，摆事实，讲道理，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了团结，巩固了西北党的领导。会间，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央讲话，说：“刘志丹、高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朱理治、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高岗出了问题，郭洪涛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注16 这部分及以下内容，详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郭洪涛的申诉，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又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中央监委1959年的《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

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思想混乱，在同志间造成了新的不团结，也引起许多陕北老同志的严重关注。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陕北肃反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路线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堂、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召集座谈会，共同研究解决。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历史问题的争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他们都是当年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对陕北党史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一）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一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史册”。

然而，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陕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是党中央到达陕北才得到挽救。

（二）关于错误肃反的问题。座谈会一致肯定了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重申1942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以及1942年12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正确地决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注 17 《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中说：“陕甘边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

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军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三）关于郭洪涛在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中的责任问题。郭洪涛是受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执行了“左”倾路线。后来，北方代表根据他所提供的关于陕甘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不实情况，又派朱理治和聂鸿钧到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在 1983 年的座谈会期间，五人小组的同志和郭洪涛谈话时，他也说，“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这段历史的上述结论，为避免以后再出反复，根据五人小组的要求，参加座谈会的八个人都在所形成的文件上签了字。

1983 年 7 月 13 日，中央发了第 28 号文件，重申并坚持了 1942 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纵观高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工作的过程，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紧跟党中央、毛泽东，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值得一提是，高岗出任边区党委书记不久，张闻天就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16 可以说，高岗的思想作风无不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在陕甘宁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获得的。他对毛泽东，从救命之恩的感恩戴德，到无限崇敬奉为圣贤，乃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所以这些情感和心态，都使他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也惟其如此，高岗才站住了脚跟，成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其次，党中央对他着意培植，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巩固与建设陕甘宁边区，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直接参加西北局和边区的党政领导工作。如任弼时、徐特立（中央宣传部部长），谢觉哉（西北局副书记、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以及李维汉（边区政府秘书长），陈云、南汉辰（财经工作），张爱萍、萧劲光、贺龙（军事工作）等。如果没有他们大量艰辛的工作和诚心诚意的传帮带，高岗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正如他在 1954 年反省时所说：“那时我啥也不懂，都是人家教的。”

如果说，在创业时期，高岗是以刘志丹为楷模，那么在陕甘宁时期，他就是以毛泽东为导师，以一大批诸如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李维汉、陈云等为先生，步步跟随，努力地干，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第三，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其他兄弟根据地军民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保证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能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仅凭高岗和他的保安部队，是不能担当保卫边区。巩固边区这一重任的。

第四，就高岗个人来说，团结大批外来干部，包括知识分子，虚心向他们学习，齐心合力搞好边区建设，是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他只认得自己的陕北小山头，狭隘自私“小肚鸡肠”，时时惦记着自己山头的利益，算计着别让那些外来的“能人”把他手中的地盘和权力夺了去；假如他用人唯亲，只相信自己的一帮兄弟，而对“外来户”处处提放，事事刁难，以老大自居，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最后，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平易近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他受到人们尊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驰骋在内蒙荒漠和草原的骑兵司令，还是身居高位的西北局书记，乃至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他始终保持着同下级、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平时，他常到伙房与炊事员一道干活儿，同警卫战士一起打球下棋、打扑克，争输赢争得脸红脖子粗，输了一样的钻桌子。过年时，秧歌队来慰问，他就扯条羊肚子毛巾系在头上，加入他们的行列；联欢会上，只要大家喊一声“高书记来一个！”他就会扯起嗓子唱一段陕北道情或信天游。他到营地视察，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下共餐；到农村调研，同农民一起边干活边拉话，亲如

一家。有人说他“不像个领导”，也有人说他“土里土气”。但他不在乎，他就是他，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一个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高级领导干部。

总之，陕甘宁的成就，不能说没有高岗个人的作用，但要是没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众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军民的努力，以及兄弟解放区的支援，他将一事无成。

然而，后来他过多的看重自己的成就，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加之人们对他过分地美誉、吹捧、奉承、甚至投其所好，纵其所欲，使得他飘飘然，昏昏然。他过高估计自己，过分相信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很有能耐、很有水平了。这就严重障碍着他的头脑清醒和思考在、慎密，放松了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和行为的约束，这是他后来饭大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4 年，他在反省西北时期这段历史时，既肯定自己有工作成绩的一面，也承认曾经有过悲观情绪和骄傲情绪。他说“本来，那时自己在各种政策上，理论、文化、干部教育，各方面是不成熟的。自己总结了正确的东西，而黑暗的、不健全的方面没有讲；没人批评，也受不得批评。结果宣扬吹嘘正确的，而黑暗的、不正确的没有受到揭发批判。”

“刚当边区党委书记时，觉得工作很难搞，心想：不如去当地委书记，挑大粪也好。后来有了成绩，就骄傲起来。”

“其实，边区粉碎三次反共高潮，是直接在党中央、毛主席指导下粉碎的，不是自己看得那么正确，自己是跟着走。至于整个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干部培养，都是在中央和毛主席直接指导下搞的；各种政策、政权、教育、统一战线，主要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自己也还没有完全体会、领会这些东西，有些还不了解，却总是觉得一切都懂。自己本来在政治上不成熟、不高明，但是装得自己高明，表现自己还不错。主席推举自己，自己也把自己估计高了。中央的各种政策得到正确实施，就以为是自己做边区书记能拿出一套，让各个根据地学习。实际上全部是中央的。而自己却认为自己差不多了，骄傲起来，没有好好利用和平机会下苦功夫学习。当时毛主席说要掌握正确思想方法；天天说尊重本地干部。而自己实际没有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狭隘。在学习、尊重老干部方面、尊重外来干部方面，做得不够。因此，许多东西没有学到。当了西北局书记以后，1942 年高干会议批判“左”倾路线后，就骄傲起来了，以正确路线自居。实际上并不成熟。1945 年“七大”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以后，就更骄傲了，自己不论才德各方面都是不够的，而自己却飘飘然，还以为只是自己个人的功劳，了不起啦。”

四、战斗在黑土地

从 1945 年秋到 1953 年底，高岗在东北工作八年多（最后一年多虽离开东北，但仍是东北党政军的第一把手）。

我们将分两节来讲述他在东北的往事，本节重点叙述 1945 年 8 月至 1948 年 11 月，即东北全境解放前的事情。

日本投降后，高岗主动要求到东北工作。

他在反省这一时期的问题时，说得最多的除了与苏联人的关系之外（如我们在第二章所叙述），就是他与彭真等人的意见分歧与争论。其实，当时与彭真发生争论的不只他一个，还有陈云、张闻天、林彪、罗荣桓、黄克诚等，即当时多数东北局委员。他说：“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指彭真）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同志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

这些争论，在 1946 年 7 月和 1948 年 11 月的两次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中都曾作过结论。【注 18 1946 年 7 月 1 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对彭真等人的错误进行了批评，认为他们犯了路线性错误，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对东北局进行了改组，林彪任书记，罗荣桓、彭真、高岗和陈云为副书记。彭真于 1947 年调回中央工作。1948 年 11 月 23 日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重申了 1946 年 7 月会议的意见。】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彭真犯了“路线性错误”。按理说，是非应该已经清楚。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分歧并未消除，以致到 1987 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有重“开战”，争得不可开交。

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本节要告诉读者的。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东北是个好地方，不仅仅因为那里土的肥沃、宝藏丰富，更因为她背靠苏联、朝鲜和蒙古，面对我华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工业发达、交通便利，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中央“七大”期间曾说：“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在的一切全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这就是毛泽东独霸东北之梦。

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明白，以自己当时的力量，要占有东北，谈何容易！因此，他们当初为抗战胜利后制定战略方针是“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和日本无条件投降，急剧改变了我国内外的形势，似乎有了独霸东北的希望。

当时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远在西北、西南大后方。一时半会儿过不来。而我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只有一关（即山海关）之隔，并已发展到辽西、热河；山东解放区与东北也只有一海之隔，现在正可借助苏联红军　的力量出关收复失地,【注 19 1945年 8 月 11 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命令原东北军之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所部和冀热辽之李运昌部，分别由山西、绥德、河北、察哈尔、山东和冀热辽地区向东北进发，收复失地。同时，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等苏军撤退时，接收全东北。到那时，只要我们把住往沿海的港口，国民党军队就休想进来。而且，许多人相信，苏联老大哥一定会帮助我们。

毛泽东可没这么乐观，他已经估计到蒋介石要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甚至要发动内战。果然，蒋介石来抢夺胜利果实了——1945 年 8 月 11 日，蒋介石连下三道命令，一是命解放区军队原地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命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勿稍懈怠”；三是命伪军“切实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接着，又拾起“剿共”的屠刀，密令各战区想、重新印发 1933 年所编的《剿匪手册》，准备发动内战。

1945 年 8 月 13 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并号召全党提高警惕，准备打仗。

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准备内战，一面散布“和平”烟雾，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谈；一面在美国帮助下加紧向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运兵。

毛泽东没有料到，抗日战争中的盟友美国人会帮助蒋介石打内战。

为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194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8 月 27 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达了我们队和平的诚意。在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毛泽东更没料到，苏联老大哥竟然会背着我们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注 20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该条约规定：苏军进入中国，与中国军队合作，消灭日军；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大连为国际自由港，苏联继续租用旅顺军港，中苏两国共同经营中长铁路；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实际上把对日本的受降权全部交给了国民党政府。条约于 8 月 26 日正式公布。

】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条约”的各项条款后认为：“东北三省为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

问题的，” 17 于是，决定派千余名干部，由林枫、张秀山带队去东北；万毅部“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 18

其实，国民党政府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就把东北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抗日武装，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才取得今天的胜利。现在，按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由李运昌率领的冀热辽主力部队 1.3 万人和地方干部 2500 人，率先挺进东北与苏联红军会师。接着，山东解放区的部队也渡海踏上这片黑土地。

延安派出的干部团由张秀山带队，于 1945 年 9 月 2 日出发，到晋绥与林枫带队的干部团会合，共 1500 余人，奔赴东北。

1945 年 9 月 14 日，最先进入沈阳的冀热辽军区第 16 军分区司令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中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

东北的形势似乎正在按照中共中央的预计发展，令人鼓舞：那里没有国民党的军队；我军已解放了山海关至沈阳的各个城市；苏联红军对我们非常友好；长期受日伪统治的东北人民热烈欢迎祖国的军队——八路军。如曾克林给中央的报告所说；扩兵很容易，并有大批伪组织伪武装均待改编；武器装备也很充足，在沈阳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材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19

中央政治局会议连夜进行研究，于 1945 年 9 月 14 日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立即乘苏军代表的飞机赴东北主持工作；指示各解放区配备一百个团架子的军、地干部尽快进入东北。同时，为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调整了部署——将“向南发展，扩大解放区”的方针改变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

高岗坐不住了。会议尚未结束，就强烈要求去东北工作。

1945 年 9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迅速、坚决的争取东北，在的吧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

于是，中央陆续向东北派出十万部队和两万多党政干部，其中包括 20 名中央委员（有四名政治局委员，占政治局委员的三分之一）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见中共中央抢占东北决心之大。原来派往山东军区任司令员的林彪，刚走到河南濮阳，就被中央一份“万万火急”电报拦截，转奔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注 21 由于中苏条约的限制，进入东北的共产党军队统一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 年初，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直到毛泽东回延安以后，才决定增派高岗去东北工作。1945 年 10 月 22 日，高岗同张闻天、李富春等一道告别了延安，踏上新的征途。

（二）方针之争

1、“独霸东北”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945 年 9 月 28 日，中央军委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指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点首先放在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的斗争基点，再进而争夺和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 20

蒋介石也在紧张行动：任命东北行辕主任，将东北三省重新划分为九上两市【注 22 1945 年 8 月 30 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将原东三省划分为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与安九省和哈尔滨、大连两市。】，任命了各省市的行政长官，开始接收并行使“东北主权”。同时，借助美军军舰运送大批军队北上，抢夺已被我收复的城镇和交通要道。

于是，中共中央接连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坚决反击国民党军队进攻，霸占东北。 21

1945 年 10 月 19 日，东北局接到中央《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东、安东的方针》的指示：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在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1945 年 10 月 23 日，中央致电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于是就有了“独霸东北”这个口号，与这个口号相关的，是争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

其实，“独霸东北”只是一厢情愿，国民党不答应，美国不答应，苏联也不答应。不过在当时，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东北局主要负责人，对“独霸东北”都坚信不移。

1945 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开始向东北进攻。他们装备精良，行动迅速，来势汹汹。而我们的新四军徒步行军，尚未到达东北。

1945 年 11 月 2 日，中央军委指示：立即布置内线作战，先在葫芦岛至锦州、营口到海城之线，尽力阻滞登陆之蒋军，以待先到部队之组成及路上行进之部队到达，并于适当时机，坚决消灭蒋军，不使进沈阳。

但是，没想到苏联老大哥要执行“中苏条约”，竟然不顾兄弟之情，于 1945 年 11 月 10 日允许国民党在苏军撤退前五天空运部队接受各大城市。

东北局一面与苏方交涉，一面仍按照中央指示，于 1945 年 11 月 12 日作出“在苏军撤出后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的部署，并报送中央。

1945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电示：“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主力集中作战之枢纽”。

1945 年 11 月 15 日，中央同意东北局 12 日电：“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

同日，毛泽东给林彪、彭真发出《关于内线作战的方针》的指示：“挨敌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集中最大兵力……于有利的时间、地点”……举行反攻，“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然而，毕竟来了那么多准备精良而又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队，又有中苏条约的限制，岂容我“独霸东北”!

后来，在 1948 年 11 月下旬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上，罗荣桓【注 23 罗荣桓，中共中央委员，1946～1948 年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曾说：“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有种依靠（苏联）红军、和平幻想的思想”，“基本问题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

1、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在“独占东北”，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方针指导下，东北局在 1945 年 9 月底在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的主要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装，加强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伪分子，摧毁伪满政权，建立民主政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在农村要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与国民党打仗。

这里没有提到与国民党斗争的长期性与艰苦性，也没有提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它忽视了日伪统治 14 年的东北，群众基础和党的工作都很薄弱，没有党组织，没有政权，没有根据地人民的支援等实际情况。尽管在 1945 年 10 月 3 日，东北局又提出，“在满洲东、西、北方面，分兵接受政权，发动群众，发展武装，创建根据地”，在后来的工作部署中也说“发动群众是各项工作的决定一环”， 22 但实际工作的重点依然是夺取大城市。因此，东北局部署的各项工作很难开展，甚至我党政军难以立足。

果然，由于苏军执行中苏条约，把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交给了国民党，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45 年 11 月 16 日，敌占领山海关，19 日占领绥中，21 日占领兴城……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 1945 年 11 月 20 日对东北工作做出新的部署：“迅速在动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

1945 年 11 月 22 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将上述部署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注 24 11 月 22 日，刘少奇给重庆代表团电：“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红军处不准我们与顽作战，要我们退出铁路线若干里

以外，以便蒋军能接收，他们能回国。彭林未答应，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

这是东北战略方针的重大转变，它改变了前一阶段以抢占大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方针，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乡村，转向根据地的建立。然而，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争夺大城市的部署没有改变。就在 11 月 22 日同一天，党中央指示东北部队：“顽十三军五十三军向锦州急进，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梁两部以全力全部或大部歼灭该顽”，“蒋军困难很多，兵力不够分配，现在顶多只能调五个军入东北，集中主力消灭锦州一线之敌，即使苏联允许蒋军控制东北各大城市，在苏军撤走后，我仍有可能夺取大城市。” 23

也是 1945 年 11 月 22 日这天，我军撤出锦西；东北局及我军总部被苏军赶出沈阳，撤到本溪；26 日，我军撤出锦州。

这仗能打吗？林彪不同意在辽西决战的部署。

在 1945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部署了“以锦州为中心地区，为我全力集中作战之地区”之后，林彪于 19 日到达辽西前线，21 日，即致电军委、彭、罗说明当时我军的情况，并提出不同意见：

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故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神，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 24

然而，林彪的意见没有被采纳。

1945 年 11 月 25 日，黄克诚【注 25 黄克诚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时任东北人民自治军西满区副政委兼所属原新四军第三师师长、政委。】率领的部队刚刚赶到辽西前线，就接到东北局的电报，命令他们切断铁路交通，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沈阳。他们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而且得不到武器装备补充，连衣服药品也没有。他当天给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电报告了部队的困难处境：

“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他建议：“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27 日，黄克诚再次向中央军委报告：“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部队)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25

1945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的建议，同意放弃辽西决战，并指出：“我企图独占东北已无可能，但必须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长春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我应力求插足之外，东满、南满、北满、西满广大乡村及中小城市与次要铁路，我应力求控制。”“应一部分主力去控制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有重心的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

1945 年 11 月 29 日，黄克诚就根据地问题再次致电东北局：“已经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必大大削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为土匪占踞（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会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利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时间，发动乡村群众，

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他建议：“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补充，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或旅）之根据地，每师划三到五个县。由该部队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和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该部队要派出必需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材、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补充部队”，如果在整个东北部队中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

他连发三封电报，提出建立根据地的建议，均无回音。

同日，东北局虽然承认“目前我党已无独占东北之可能，必须改变方针”，但仍主张“将工作重心方针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之长春路四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背靠着苏联、朝鲜、外蒙、热河，创造强大的根据地，面向长春路及沈阳附近、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以便在苏军撤退时与国民党争夺这些大城市。”

可见，东北局仍没有放弃夺取大城市而到乡村去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与“独霸东北”相关的口号，还有如“一战决胜”、“最后一战”等等，都反映了当时一些人缺乏同国民党进行长期战争的思想准备。

2、大收编的后患

东北局之所以那么坚信能够独霸东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军队的大发展。

1945 年 8～9 月，出关部队大约是十万人，到年底就发展到 28 万。26 仅冀热辽的部队在出关前后的两个多月，即由 1.3 万人发展到 13 万多人，整整扩大了十倍。10 月 26 日，彭真在沈阳东北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谈到国共双方的兵力时说，到 11 月我们就有二、三十万。27

这样的大发展，兵员从何而来？刘少奇 1945 年 10 月 9 日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的《关于部队迅速分散发展扩大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部队“必须摆开分散，迅速发展扩大，收编和改造伪军、伪警”，“只有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

1945 年 11 月中旬，彭真曾对刚到沈阳的张秀山等人说：伪满的国兵都是受过良好的训练，我们有的是枪，发给他们，即可为我所用。要成建制地收编，采取像摘葡萄的政策那样拿过来，这样就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独占东北。28

这样的大收编留下严重后患。

新扩充的部队成分复杂，除少数矿工和学生外，大部分是收编的旧军队、旧警察，甚至土匪特务，并且用缴获的新武器装备起来。这样的部队政治觉悟和纪律都很差，根本没有战斗力。可是晚些到达的老八路、新四军，却得不到任何装备的补充（如黄克诚的“七无”电报所说）。于是就有人发牢骚说：“新兵（指收编的部队）新枪，老兵（指晚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老枪。”而且这些老兵们只能用老枪去对付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和土匪，其困难可想而知。

更为严重的是，像大土匪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伙（人称“四大旗杆”）都收编为人民自卫军；而共产党仅派少数干部到这些新部队去做政治思想工作。这些伪满的残渣余孽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来之前，以“先八路，后中央”（当时群众称国民党为“中央”）；“先共产党，后国民党”的手段，借共产党的招牌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当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时，仅一个月左右，这些新编的部队几乎全部叛变，成为武装土匪。拒统计，1945 年 12 月底至 1946 年 1 月初，仅十几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 1.2 万人。合江五千人，龙江约三千人，牡丹江三千人，松江一万人，辽北三千余人，嫩江三千余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四万人。” 29

即使如此，蒋介石也不许我们大发展，很快就派大批装备精良的军队向东北扑来。仅仅过了一个星期，1945 年 10 月 16 日和 19 日，党中央又发出相反的指示：凡我到东北之部队

“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此刻，我军必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再分散”；“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是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

对于这样的扩军方针，张闻天曾批评说：“在军队建设方面，采取收编加委的错误方针，把许多土匪武装都搞成了‘三江人民自治军’让他们利用我们的招牌，扩大自己的势力，当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打到关外的时候，这些土匪武装纷纷哗变，把我们派去的同志给杀害了，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 30

3、接收城市

我冀热辽部队和山东部队最先进入南满（主要是在当时的辽宁、安东两省）地区，然后向北满、西满、东满进军，一路消灭顽抗的日伪军和土匪、收编旧军队和警察，接收城市。到 1945 年底，东北各省的省委或工委就陆续建立起来，并召开了临时参议会，通过民选形式，选出了省主席，建立了民主政权，取得了合法地位，与国民党委派是省政府相对抗。南满几乎所有的县，西满、东满、北满绝大多数的县，也都先后建立了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和地方武装。

然而，深入分析一下就发现，政权建设工作中同样存在着严重的隐患；部署彻底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而是原封不动地保留机构，在日伪时期的旧人员重新加以任命，让他们当厅长，当县长，当国大代表。这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利用合法身份，勾结土匪，私通国民党，搞暗杀和各种破坏活动。这就使得本来就不了解共产党的人民群众，误认为共产党、民主政府与日伪时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个招牌而已。而我们的党和军队则由于忙于接受，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群众。因此，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 31

这样接受的城市，很快就被来势汹汹的敌人多去。我军且战且退，党政领导机关不断转移。但关于工作方针的争论也始终没有停止。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经太行、冀东、热河，历时一个月，于 1945 年 11 月 20 日到达沈阳。他们没有料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正等待着他们。

当他们到达沈阳时，东北局正在开会研究工作方针问题。高岗在会上发表了意见。他认为，按照中苏条约，苏联即将把沈阳等大城市让给国民党，已无可置疑；目前，国民党军队大批进入东北抢占地盘，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我们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很难立足。所以，我们的方针应该是避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打算，而不是下大力气与国民党争夺大城市。

彭真等人不同意高岗的意见，他们认为大城市对我们很重要，绝不应放弃；苏联红军应该支持我们，而不会把我们控制的大城市交给国民党。双方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

张闻天和林彪完全支持高岗的意见。

会后，林彪对高岗说，照这样搞下去不行。我要向党中央建议，由你来主持东北局的工作。

高岗坚决不同意。

东北局内部对形势估计和战略部署的意见分歧，使东北的工作举步维艰。而这种争论竟然持续了几个月。

4、北满分局的意见

1945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北满分局，陈云为书记，高岗、张闻天等为委员，同时成立以高岗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的吉黑军区（后改为北满军区），任务是控制北满各地，组织军队，建立政权，发动群众，镇压反动派，巩固后方。此时，高岗、张闻天等人还在赴东北的路上。鉴于中苏条约的规定，北满分局和松江省的领导机构于 11 月 22 日撤出哈尔滨，

迁到其东边 90 公里的宾县。

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人离开沈阳时，东北局已经开始撤退。他们于 1945 年 11 月 23 日，乘运煤火车的一节闷罐车一路北行，11 月 26 日到达哈尔滨与陈云会合。高岗一到，陈云即提出让高岗当分局书记，他自己当副书记。

高岗笑道："这不行！还是按中央的决定，你当书记，我当司令员吧，打仗搞根据地，我比你有经验。以后，我在外边打仗，你在家里坐阵，有问题一起商量，我保证听你的！"陈云三次建议，都被高岗拒绝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们配合默契，把北满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

1954 年，高岗反省时说："刚去北满时，我做军区司令员。陈云三次推举我当分局书记，我不干，让陈云当书记。我就天天剿匪、土改、组织二线兵团。【注 26 二线兵团指主力部队以外的地方 ，平时主要担负保卫解放区和地方治安等任务。战时可以成建制地参加主力部队。因为其优良的军事政治素质，参军后可以立即投入战斗，受到主力部队的欢迎。】1946 年以前，主要如此。"

就在 26 日当天，陈云主持召开了北满分局的第一次会议，28 日结束。他们认真分析研究了当前东北形势，总结了几个月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任务。11 月 29 日，以陈云、高岗、张闻天三人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发出了《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电报， 32 明确提出：

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以达到包围歼灭大城市之敌及钳击长春铁路干线，使我们能够在同国民党的长期斗争中，取得全局的优势；

……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城市工作的目的，是为加紧创立广大根据地服务，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统治地位；

……

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

……

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必须严重注意干部中由于进入城市而生长起来的享受腐化倾向。同时，应该预先防止国民党进入中心城市后向我们压迫时，在干部中可能发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动上的混乱。教育干部时时注意新地区的新情况、新任务和新的工作方式，防止把老解放区的老经验机械地运用到新地区的倾向。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的和纪律的教育，密切军民联系。要十分注意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的关系，以及系统地培养本地干部的工作能力……

这份言辞恳切的电报很长，分两天发出。这些关键性的意见，对党中央改变东北的战略方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收到一半，就回电："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完全赞同。"

1945 年 12 月 1 日，北满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高岗就目前形势与创建根据地问题的报告。

1945 年 12 月 3 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发动农民减租和清算土匪》的指示。指出："你们从长、沈大城市退出以后，除开继续发展与整训部队以外，应集中力量发动农民减租，解决土地问题，并组织工人群众。只有这一改革的实现，发动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群

众，才能使我们在东北站稳脚跟，并确立我们对国民党的优势。”

但东北局仍要夺取大城市。1945 年 12 月 5 日，东北局给中央军委及林彪、程子华、高岗、陈云的电报中说：“我们应积极准备参加争夺沈阳”；“如蒋顽开到后，苏军即撤退，我即坚决争取消灭顽敌，先占沈阳，再夺长春”；“如蒋顽到后，苏军仍不撤退，于蒋顽进入沈阳三至五日后，我即以相当兵力跟踪逼近沈阳……以各种形式与蒋顽争夺沈阳”；“为了达到上述之目的，必须阻断北宁路前之敌，或予以歼灭性之打击。因此在北宁路方面，除林所指挥之主力作战外，提议程、詹集中二、三万主力，同时向秦皇岛、山海关、绥中一线之顽敌进击。”

当日，陈云、高岗即复电彭、罗，指出：“大歼灭及阻断北宁路线，同时以三四万主力进攻沈阳，一万主力威胁长春，如此大兵，已否全部到，并请考虑后果及影响如何”；“你们转来中央关于改革独占满洲与建立根据地战略指示，与你们来电是不同的。我们意见，亦分别请示中央。”

次日，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建议根据中央新的方针和东北实际情况，立即作全面部署，并要求派五个老主力团来北满帮助创建根据地。

北满分局的《几点意见》和 1945 年 12 月 5 日的电报表明，他们与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需要党中央来决断了。

1945 年 12 月 7 日，刘少奇对东北局 12 月 5 日的部署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我独占东北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此，不应以夺取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铁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 15 万野战军，建立 20 万地方武装，以准备翌年春天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望你们迅速加以确定，否则摇摆不定，妨害工作，丧失良机。”

北满分局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当日又向党中央和东北局提出补充意见：由于北满地区的许多战略要点为国民党势力占领或控制；群众尚未发动；我两万多新部队多系召集合股而来，成分复杂，阶级觉悟低，存在不稳定等情况，决定我们要“准备与国民党作长期斗争”，现在“各县不忙于扩大部队数量，应立即讨论如何掌握现有的部队……配备干部，加强领导，清洗坏人，补充兵源，解决服装，团结内部……军事首长率领此部队，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坚决地扫清各战略要点、中小城市的主要敌人，这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主要关键，训练部队的主要方法。”

5、“一二·二八”指示

尽管多数东北局委员不赞同东北局的部署，但争论仍在继续，东北局仍然“摇摆不定”，各方意见不断反映到中共中央。

毛泽东因为在重庆劳累过度，回延安后一直在休养，对东北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但 1945 年 11 月下旬以来，由刘少奇多次发出的指示，已明确表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12 月 21 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请你们注意长期永久根据地之建设”，“必须派主要的老部队和干部去开辟工作，建立后方，建立工业，组织与训练军队，开办学校，以便能源源供给前线，犹如汉高祖之汉中。只有这一计划的成功，我在东北的斗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能迟早争取胜利。”

1945 年 12 月 24 日再电：“东北的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争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我提议你们把屁

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现到东北的主力部队和干部，必须分散部署，应以大半分到东满、北满、西满各战略要地去建立根据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发展，并准备随时能撤走……”

不难看出，刘少奇对东北局的“摇摆不定”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急怒心态溢于言表。

一边是疲惫不堪、冻饿交加的共产党部队，一边是被美式准备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打又打不赢，退又不愿退，加上东北局工作方针之摇摆不定，领导者争论不休，更增加了困难。长此下去，难道很多要走西路军【注 27 1935 年 10 月，红四军奉中共中央之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敌众我寡，于 1937 年 3 月失败。】的下场么？

后来高岗反省时说：“1946 年 1、2 月间，我打土匪回来，苏联派一个上校到宾县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要我们转告中央。他说现在东北有两派，一派执行毛泽东、斯大林的路线，一派反对这个路线，就像一个人骑在树枝上砍树干，自伐其木，非常愚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毛泽东出来说话了。病中的毛泽东仔细研究了东北的情况和双方的意见后，于 1945 年 12 月 28 日亲自起草并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指出：

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建立这种根据地的地区，现在应当确定不是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这是在现时条件下所作不到的。也不是在国民党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附近地区内。这是因为国民党既然得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就不会容许我们在其靠得很近的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

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末，我们在东北就将陷于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

……只要我们能够将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普及到一切干部和战士中去，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的胜利……干部中一切不经过自己艰苦奋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侥幸取胜的心理，必须扫除干净……迅速在西满、东满、北满划分军区和军分区，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他还指出：我军……估计在一年内，将达四十万人以上。如此大量的脱离生产人员，专靠东北人民供给，是决不能持久的，是很危险的。因此，除集中行动负有重大作战任务的野战兵团外，一切部队和机关，必须在战斗和工作之暇从事生产。

这个指示后来被称作“一二·二八指示”。陈云、高岗、林彪等人欢欣鼓舞，马上印发，传达执行。可是彭真却批评他们“泄密”，迫使他们不得不作检讨。实际上东北局依然没有贯彻执行这个指示。

在敌人强势进攻下，东北局于 1946 年 2 月底由本溪转移到抚顺，并于 1946 年 3 月 6～8 日召开部分委员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东北的形势、作战方针，以及创建根据地等问题。会上又发生激烈争吵。林枫批评林彪，说他一仗都不打，从山海关一直退到这里，是逃跑主义。林彪则说，以目前的情况看，根本就不该硬拼，而且他的每次行动都是报

告请示中央的……

会下，林彪无奈地对高岗说："这样闹下去要误大事！我看还是你找个理由回延安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和我们的意见当面向毛主席讲一讲，请求中央派少奇同志来主持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但是，由于战事太紧张，东北局于 1946 年 3 月 20 日转移到梅河口，4 月 18 日又转移到长春，高岗回延安汇报的事不了了之。

（三）血的教训

"独霸东北"问题解决后，接踵而来的是东北问题能否和平解决，是"最后一战"还是长期斗争？争论仍在继续。

虽然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召开了政协会议，但中国何曾有和平？东北更无和平可言。

然而，我们必须争取和平，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渴望的。于是便有了旷日持久的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局面，这就使得一些人对和平抱有幻想，也让一些人想在和平实现之前再捞一把，多枪一些地盘。

根据形势需要和"一二·二八指示"，中央决定，将东北人民自治军改为东北民主联军，并将部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按西满、北满、东满、南满四个区域，成立了四大军区和各省的军分区。

1946 年 1 月 5 日，为了配合承德保卫战，中央电示东北局：国内和平有希望，保卫热河的战斗是一招决定性的。目前阶段中并可能是最后一战……

于是，有人就盼着，打完这最后一仗，就可以实现和平了。

1946 年 1 月 10 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同时颁布了 13 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

同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防止 军事冲突的通知》，指出："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阶段即将从此开始。"

第二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发出《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的政策问题的指示》指出："停战是包括满洲在内的"，"在国军未到达满洲广大地区前，你们应速谋发展，将部队高度分散，控制广大地区"，"全国和平后，满洲对国民党亦应采取和平合作方针，迅速发动广大群众，要求民主改革"。

然而，所谓"停战协定包括满洲"，我将"控制广大地区"，"要求民主改革"等等，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蒋介石根本就没有打算停战。1 月 13 日当天，就密令其军队抢占东北的战略要点，继续向东北解放区进攻。

于是，中共中央又于 1946 年 1 月 13 日电示东北局："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后要向我们进攻是不可避免的。请东北局立即布置一切，在顽军进入东北向我进攻时，击破其进攻。"

1946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电示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即苏方）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 不怕以最大牺牲，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又是一个"最后一战"!

党中央对时局的估计非常乐观，不仅对最后"一战大胜"充满信心，而且对实现和平充满信心。1946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又称"二·一指示"），指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的主要斗争形势目前已

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这个指示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而且绘出一幅美好的和平景象：“我党即将参加政府”,“我们的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

当然，要实现这一切，必须先打赢“最后一仗”。

于是，党中央于1946年2月5日电示彭真、林彪等：“你们在锦州、阜新、热河丧失了作战机会，此一最后作战机会（见1月27日电——笔者注），你们绝不要再丧失。你们如不能在东北打一个好胜仗，以后你们在东北的政治地位，就要低得多。因此你们必须立即准备好一切，集中尽可能多的兵力，不怕以最大牺牲，求得这一作战的胜利。”

在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关于东北问题须准备长期战斗的指示》中，虽然承认国民党“仍不想停战……你们扔须作比较长期的战斗准备”，但又“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在谈判中我们须有让步，但国民党须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并可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可见在当时，不仅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相信“一战决胜”后，和平就会来到，而没有长期艰苦斗争的心理准备，就连党中央也“估计在东北不可能长期继续（打下去）”；并试图“以我在东北之让步交换国民党军队从热河撤退”。

但是，国民党军队正气势汹汹地来抢夺东北，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怎么可能是“最后一战”？而且从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我们明显处于劣势，又怎么可能“一战决胜”呢？

处于战争第一线的许多干部，其中包括陈云、高岗和林彪、黄克诚等人，根本不相信真的会有和平，认为和谈是敌人的阴谋。面对全副美式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开始”、“主要斗争形势已由武装斗争转变为非武装的群众议会斗争”等等，全是幻影，只会麻痹人民的思想，丧失对蒋介石内战阴谋的警惕。

1946年2月25日，北满分局陈云和高岗致电东北局：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应立即执行中央关于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队伍，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可依靠的根据地，将使革命处于不利地位”。

1946年2月，苏联红军开始撤退（后应国民党政府要求，于5月3日撤退完毕）。中共中央一个接一个电报发往东北，要求乘苏军撤退之机抢占大城市和战略要地。而中长铁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当属四平。

1946年3月4日，中央指示：“应尽力阻止顽军进入四平”，“不论四平能否保住，对顽军进攻，均需给以打击，比不战而退要好。”

针对国民党即将从苏军手里接收大城市，并进攻西满、南满一些城市的局面，1946年3月5日，中央指示东北局：“蒋与我方在东北的军事对抗和冲突将继续一个时期”，“你们必须迅速准备严重的粉碎蒋军进攻的战斗，并须准备在上述地区被蒋军占领后你们仍能继续斗争”。

抚顺会议就是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召开的，而东北局领导者们的思想却统一不起来。

1946年3月11～12日，苏军撤离沈阳，蒋军立即进驻，并以沈阳为中心向四周扩展。然而，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地区毕竟十分重要，怎能全部让给国民党？于是又开始争夺。

1946年3月17日，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国民党还是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1946年3月18日，在苏军撤出四平后，我军解放四平。

1946 年 3 月 20 日，敌军逼近抚顺，东北局带着争论转移到吉林的梅河口。

中共中央继续不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

1946 年 3 月 24 日：“我党的方针就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铁路全线，不惜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面”。“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1946 年 3 月 25 日:“你们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特别保卫北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退时，一二日内控制之。”

1946 年 3 月 27 日：“为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力争由我军占领长、哈、齐及中东全线，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讯赶时机。”

1946 年 3 月 29 日，东北局按照中央指示作出“友方撤退时及时以敏捷迅速手段占领长、哈、齐各市”的部署，得到中央同意。

然而，国民党岂能让我们得逞！杜聿明调动大军，下令要在 1946 年 4 月 2 日之前占领四平。林彪则在四平集中六个旅的兵力，准备“坚决与敌决一死战！”

1946 年 4 月 6 日，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林彪和彭真发出关于保卫四平的指示：“集中六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一个师”，“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

1946 年 4 月 8 日：“应以反复肉搏打几个昼夜……必须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保卫长、哈。”

从心理说，林彪是不赞成这样硬拼的,【注 28 4 月 11 日，林彪给中央和东北局的电报中讲了敌我现状和蒋军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后说：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但因为毛泽东要这样拼，他只能服从。后来在 1948 年 11 月东北局扩大会议上，林彪说他是“硬着头皮打的。”

当时，对这一仗究竟怎样打，思想上不是很明确，所以打起来以后，是且战且退。关于这一仗的目的，当时的说法是：阻滞敌人，为后方争取时间，以便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1946 年 4 月 16 日，四平保卫战拉开序幕。一交手就消灭敌人一个师共 4300 余人，我军威大震，敌军心大惊。这一仗打得漂亮，阻滞了敌人的进攻，煞了敌人的威风。此后，我军利用两军僵持之机，一边阻击敌人，一边整顿部队，宣传群众，瓦解敌人，的确为后方争取了时间。

1946 年 4 月 18 日，四平保卫战正式打响。这一天，东北局由梅河口转移到长春。

1946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电示林彪、彭真：“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

形势似乎不错，1946 年 4 月 26 日，彭真在长春干部会议上，对形势作了非常乐观的估计：“本溪、四平、长春几个战役后，东北形势已变，转变到根本对我们有利……现在优势已到手，问题是巩固优势”；“我们的口号是誓死保卫长春，把敌人消灭在长春以南。”

毛泽东也很高兴。1946 年 4 月 27、28 日，分别以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名义电令嘉奖坚守四平的将士，要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到最后胜利，把四平变成‘马德里’，34 要林彪：“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1946 年 5 月 1 日又致电林彪：“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

精疲力竭……”

但是，敌军并未被“打得精疲力竭”，反而调集更多的兵力分三路向四平包抄过来，全面进攻。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经过惨烈战斗，敌军于 1946 年 5 月 18 日突破我军防线。

这时，林彪决定撤退。他在向军委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估计敌人明天就可占领塔子山……塔子山如失守，敌人就可以从我后侧迂回，封闭四平守城我军的退路，那时我们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灭之危险”；“我们已经大量消耗了敌人，并赢得了时间。我们的保卫战是胜利的”。又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我们队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

1946 年 5 月 19 日，中央回电：“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至此，毛泽东放弃了对四平战场的遥控指挥。是夜，林彪下令撤出四平。

毛泽东又命令林彪：“长春卫戍部队应立即开始布置守城战，准备独立坚守一个月不靠主力援助，而我主力则将在敌人两侧及后方行动。” 35

但实在不能再拼，也无力再拼消耗了。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一致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6 年 5 月 21 日，东北局由长春撤到哈尔滨的第二天，敌人就占领了长春。

四平战役双方都投兵十万，我军毙伤俘敌一万多人；自己的伤亡，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说是八千人以上。林彪后来给毛泽东的电报说，他伤亡了 1.3 万人，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老骨干。

这样的消耗战究竟是否该打？一直存在争议。

如毛泽东电报所说，“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因而震慑了敌人，为建立根据地争取了时间，保住了包括哈尔滨、齐齐哈尔在内的北满根据地。

但也有人认为四平保卫战是错误的决策。

许多年后，在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重提旧事，毛泽东说四平保卫战是他决定的。黄克诚当面顶撞说：你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不管怎么说，四平保卫战总算以伤亡上万将士的惨痛代价，惊醒了那些做着“一战决胜”之梦的人。

（四）东北局改组与“七．七决议”

东北局撤到哈尔滨以后，经中央批准，于 1946 年 5 月 26 日与北满分局合并。

几个月来的争论不仅影响了领导干部的团结，也影响到各项工作的开展。因此彭真等人曾酝酿改组民主联军总部，把林彪撤掉。林彪等人也向中央建议，改组东北局的班子。

1946 年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同意罗荣桓去苏联治病，决定由高岗代任民主联军第二政委，主持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罗荣桓临走前与林彪、陈云、高岗商量，一致认为彭真对东北局的工作领导不力，遂以他们四人的名义致电中央，建议对东北局领导人的分工进行调整，林、罗、高并力举陈担任东北局副书记。

中共中央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于 1946 年 6 月 16 日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高岗兼秘书长。

1946 年 7 月 3 日至 11 日，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并于 7 日作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

的决议【注 29 这个决议由陈云起草，经中央修改后批准。】（即“七·七决议”），总结了半年多来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1、肯定了 1945 年 8 月以来，我党我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创造广大东北解放区和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指出“目前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和土地问题的解决尚在开始阶段。我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虽对我有利，但“必须承认自己的弱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2、当前的任务：

（1）克服和战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准备以长期艰苦斗争取得和平。

（2）坚持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正确方针。目前或今后一个时期内，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创造根据地的主要内容是发动农民群众。发动农民的方法是发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粮分地的斗争，并迅速普遍地执行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五四指示”。【注 30 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从此开始推行土地改革，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斗争中改造村政权，建立农会和人民武装，发展党组织，使东北自卫战争成为人民战争。为此，应以主力兵团的一部配合地方武装肃清土匪；组织地方干部工作团，力求在半年之内把群众发动起来。

（3）明确现在斗争的目的是为保卫解放区，实现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民主而斗争。今日之东北已非抗战时期之敌后，要紧紧依靠广大劳动人民，不要被地主阶级所蒙蔽，不要委任和发展地主武装。

（4）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作战的原则，不在于城市和战略要点一时的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以达到保卫解放区的目的。

（5）为适应长期战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

（6）造成干部下乡的热潮。应使干部认清形势，认识斗争的尖锐性和长期性，认识发动农民是东北斗争成败的关键。“强调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号召他们跑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这就既可以完成发动农民的中心任务，又可以彻底改正干部的不良倾向。”

3、东北的斗争环境长期艰苦，但前途是光明的，不是孤立的。从全国斗争的发展过程看来，革命力量在上升，反动势力在下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强大，国民党从未像今天这样丧失人心。只要我们认清东北的形势，团结一致，紧紧地依靠群众，兢兢业业，一步一步地向着奋斗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建立起巩固的阵地，粉碎反动派的进攻，实现和平民主。

会后，东北局和各省市负责人分别到各地宣传落实中央“五·四指示”和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精神，调动三分之一军队进行剿匪，组织大批干部深入农村【注 31 据统计，7、8 月间就调动 1.2 万多名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期间，高岗亲自到合江视察了刚解放的安东市（现密山镇），并查看了与兴凯湖中苏边界及界标。当时苏联红军企图以兴凯湖为界“取齐”中苏边界（这将会吃掉我一大片领土），遭到高岗坚决反对。经双方交涉，维护了我国领土完整。

由于林彪主要在前方指挥打仗，罗荣桓去苏联治病，陈云于 1946 年冬到辽东分局主持工作，彭真调回中央，东北局于 11 月 2 日决定，在林彪随军行动期间，由高岗主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日常工作。到了辽沈战役前夕，1948 年 8 月 18 日，中共中央同意在林彪去前方时，由高岗代理东北局书记。

（五）北满先行

1、剿匪斗争

高岗到北满之初，大量的工作是剿匪、整军建军、战勤和土改工作。

北满地区在东北的最北部，苏联接壤；包括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牡丹江五个省和哈尔滨特别市，人口近一千万，物产丰富，工业和交通都比较发达，是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和义勇军十分活跃的地区。然而，这里又是东北匪患最严重的地区。

东北人把土匪称之为“胡子”。

共产党面对的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残留的日伪警察、特务、汉奸和恶霸地主合流的武装团伙，及负隅顽抗的日本军人。他们有些曾被共产党收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到一个月，几乎全部叛变为土匪；有的接受国民党的“委任”，打着国民党“先遣军”、“挺进军”的招牌，有国民党派去的“高参”和精良的武器装备，是道地的政治土匪，老百姓称其为“中央胡子”。当时东北 154 个县，有一百多县被土匪占据。北满土匪四个旅，号称十万人；南满土匪号称五万人。合江地区的匪患尤为严重。最有名气的“四大旗杆”【注 32 当时最大的四股土匪首领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黑子）、孙荣久、号称“四大旗杆”。】都盘踞在佳木斯周围的合江地区十几个县内，不仅数量多，而且控制着部分铁路、公路和航道，包围着佳木斯、依兰、富锦等城市，妄图在苏军撤走后接收佳木斯与合江全省。他们出没于深山老林之中，活动在广大城乡之间；残害骚扰百姓，袭击我军机关，杀害我干部战士；伏击人民自治军和苏联红军的车辆，抢掠武器装备；甚至公然向正在举行“八?一五”纪念大会的主席台扫射，制造流血事件；洗劫两座县城，集体枪杀包括我县长在内的 20 多人……

匪患不除，何以立足，更何谈民主改革！

因此，北满军区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剿灭土匪，解放广大乡村。

高岗对剿匪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一到北满，就根据北满分局 1945 年 11 月会议精神，于 1945 年 12 月初，主持成立了北满军区剿匪司令部；并相继建立了北满五省军区；整编和训练部队，清洗坏人；以师为单位，划定区域，深入林海雪原进行剿匪。在短短的两个月左右，松江与合江两省军区的部队剿灭了大股土匪，夺取了一批主要据点。1946 年 2 月初，两省剿匪部队在通河会师，陈云和高岗亲临前线，勉励部队官兵再接再厉，彻底消灭顽匪。

到 1946 年 4 月中旬，北满 65 个县中，有 58 个县获得解放，大部分选举产生了县政府，改造村政权，共产党在群众中建立了威望。苏军撤退后，民主联军顺利接收了哈尔滨、佳木斯及合江全省。但四平战役失利以后，残匪乘机收罗旧部，再度猖獗起来，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我东北局与北满分局合并，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而且由于大量部队撤至松花江以北，增加了剿匪力量。

1946 年 5 月下旬，经中央批准，张闻天到匪情最严重的合江省任省委书记。

1946 年 6 月 4 日，东北局发出《关于剿匪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接着，高岗签发了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估计在十五天停战【注 33 1946 年 6 月 6 日，国共双方达成东北停战 15 天的协议。】以后，国顽必然作更大规模地进攻。各地土匪亦将更加积极活动，使我处于腹背受敌之情况”；并总结了半年来未能彻底肃清顽匪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未发动群众，没有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剿匪部队中缺乏老的主力做骨干；在站上上有不当之处，各地配合不够密切等。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否则“将会使我党在东北处于非常不利的 ，甚至有遭受失败的危险。”

《决定》将剿匪部队按区域进行了分工，战术上采取远距离出奇兵奔袭、合击、穷追等办法，进行反复扫荡、严厉镇压，对投诚者必须解除其武装，不得收编。同时，在所有剿匪区域，有计划地抽调千余名干部组织工作团，各级领导机关中除必须留机关工作的人员外，“均应离开大城市，走出洋房子，脱下西装，脱下皮鞋，穿起农民衣服，背上行囊，不留恋空头的工作职位浮在上层，而老老实实到乡下去给群众办事”；工作团要与部队密切配合，根

据中央土地政策的指示，发动群众，依靠基本群众和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搜缴地主及散匪的武装，镇压反革命，造成人民的剿匪运动，使之真正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人民武装，造成人民战争。

最后确定：各个地区由剿匪部队、地方党、政府及工作团的负责人组成临时的统一指导机构，松江地区工作团由张秀山负责组织；牡丹江、东安、合江之工作团由张闻天负责组织。

1946 年 6 月 20 日，合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张闻天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我和原省工委的同志一致认为，前一段的工作是有错误的，“最主要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去年 1—2 月指示，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剿匪方面，虽然取得了成绩，但由于决心不大，作战方针不对头，甚至对土匪抱有幻想，所以斗争不力，只是把他们打垮、打散，而没有消灭。更加错误的是，还曾经和土匪头子谢文东等人谈判讲和，割地而治。这是一种阶级投降主义。在力量使用上，由于忙于接收，把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干部，分散到各县、市去做官，而没有集中起来，到农村中去发动群众。因此，使工作局面迟迟不能打开，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工作，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他指出，失误的根源是“领导思想右倾”。开头是对形势估计过分乐观，而看不到还存在严重的斗争；而“当国民党进攻，土匪包围时，又表现悲观、动摇，幻想用谈判的办法取得和平，而逃避艰苦斗争”，“这主要是因为对抗战胜利后的阶级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对国民党决心要打内战，以及敌我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认识不足，缺乏思想准备。再就是对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斗争缺乏经验和认识，还想用抗战时期的那套政策和策略，同地主和土匪武装讲‘统一战线’，而不是把立足点放在发动群众方面，就是没有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结果，实际上把屁股坐到了人家那里，怎么会不吃亏呢？！”最后，他提出“一个中心，即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即剿匪、生产、支前”的工作部署，把合江根据地的建设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36

这个讲话虽然是针对合江省的，但也反映了他对前一阶段东北局工作的看法。

为了加强剿匪力量，1946 年 8 月下旬，调贺晋年到合江军区任司令员，并重新调整了剿匪工作的部署。经过三四个月的跟踪追剿，先后消灭以“四大旗杆”为首的大股匪伙近八万人，活捉张雨新、谢文东、李华堂、孙荣久等匪首，公审枪决。广为传颂的杨子荣深入匪穴活捉“座山雕”的故事，就发生在合江地区。

至 1947 年 6 月，土匪基本被肃清，安定了社会秩序，农村土改也取得初步胜利，水陆交通和部分煤矿、金矿、林业、水产等很快恢复了生产，群众生活得到初步改善，军队发展壮大，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威望大大提高。党中央对北满地区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成功地完成剿匪认为，可算是高岗到东北后立下的第一功。

2、土地改革

在剿匪的同时，反奸清算和土地改革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北满农村的情况与关内不同。这里的土地高度集中，5%的地主富农占有 40%的土地，另外还有大批土地被日本、伪满政府和汉奸抢占，即所谓“开拓地”。【注 34 开拓地是伪满时期日本拓务省和伪满民政部拓政司合伙组织的各种开拓团，抢掠农民的土地，变为其“公地”。】绝大多数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房屋、牲畜和农具，甚至连基本生活物品都很缺，他们全靠给地主当雇工维持生计，处于赤贫境地。

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提出练兵、生产和减租减息三大任务，1946 年 5 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进行土地改革的指示（“五・四指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根据“七・七决议”，派出五分之三的干部和三分之一的部队，7 月下旬又增派两道三个团的主力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剿匪、土改、扩军、建立民主政权等群众运动。

首先是发动群众开展清算汉奸恶霸及大地主的斗争。在经济上清算他们多年来逃避负荷及劳工账，算得他们倾家荡产，废除高利贷，将其土地财产退赔给贫苦农民及增加雇工工资等。但由于地少人多，不足以解决农民的土地需求，一些地方提出将“开拓地”分给农民，

得到东北局的支持。

高岗虽然没有主持土改工作，但十分关心此项工作的情况，他要求工作团关心群众疾苦，有个遵守纪律，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让他们参加工作，这样既解决了干部不足的问题，又能发挥当地干部熟悉情况的优势。

至1948年秋，除南满的少数地区和大城市周围村镇外，东北地区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翻身做了主人的贫苦农民，彻底砸碎了几千年的封建枷锁，拿起武器，投入了保卫胜利果实、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也曾出现过一些偏差，1947年7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委在平山召开土地会议，推广晋绥等地的经验，推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东北局贯彻平山会议精神，出现了侵犯中农、打击工商业、乱打滥杀及党内斗争扩大化等偏差。

1947年12月，党中央批评了平山会议的错误。不久转发了任弼时的报告，对土改中的偏差进行纠正。1948年2月，毛泽东再次就土改中的错误和新华社在土改宣传中“左”的偏向问题给刘少奇发电报进行批评。

与此同时，张闻天于1948年2月提出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经东北局批准在全区执行，及时纠正了偏差。

1948年9月，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高岗虽然对刘少奇在土改中的错误有意见，但他认为刘少奇的检查是诚恳的，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

北满地区经过剿匪、土改、民主建设，彻底肃清了土匪，消灭了封建剥削阶级，建立了民主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至1948年3月，据北满四省（松江、龙江、合江、嫩江）的不完全统计，共平分土地五千余万亩，牛马40余万匹，衣服520余万件，并没收大量金银等物。北满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翻身做主的贫苦农民提高了觉悟，建立起自卫军(民兵)和各种群众团体，踊跃缴纳公粮、参军支前。同时，壮大了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北满根据地很快得到巩固发展，为东北解放战争创造了可靠的后方，提供了兵源、战勤和物质等方面的保障，为解放全东北和全中国作出重大贡献。

3、整军建军

于此同时，北满分局和东北局、东北军区狠抓了整军建军工作。

由于收编和扩编的部队数量很大，成分复杂，国民党进攻时哗变的很多；而出关的老部队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经过四平战役以后，老主力部队消耗很大，战斗力下降。所以，整顿和扩大人民军队成为当务之急。

高岗在陕甘宁边区曾长期从事军队建设工作，到北满以后，把建立红军和巩固陕甘宁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连以上干部进行路线教育，宣传贯彻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东北局及北满分局的工作部署；对战士进行形势教育，开展立功运动，增强胜利信心；进行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纪律教育和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第二是加强党的领导，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发挥连队支部的作用。第三是进行整编，精简机构，清理坏人，纯洁队伍，加强指挥机关。第四是进行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经过整顿，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大大提高。

1946年9月23日，东北局指示各地工作团，在土改工作的基础上，彻底摧毁敌伪残余和地主阶级统治，建立和巩固基层人民政权，组织可靠的人民武装，形成人民战争。为此，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各省军区组建二线兵团，以保证向主力部队提供经过训练和有作战经验的兵员，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从各省的地方部队抽调部分力量，成建制地补充道所在地区的主力部队；二是组织翻身农民自卫军（即民兵），平时担负生产、治安等任务，战时担负战勤之前，配合部队作战。

翻身农民热烈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掀起参军支前热潮，干部带头、父母送子、妻子送郎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部队得到大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合江地区在1947年5月至

1948 年 4 月期间，组建了十多个独立团，相继补充道主力部队；松江地区组建了三个独立师，8.7 万余人，送往主力部队；辽东地区在 1945 年 10 月至 1948 年 12 月，参军人数达 33 万。同时，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发起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活动，加强了军政、军民关系。

东北战场相当平静仅仅维持了两个多月，蒋介石就按其“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向南满地区发起进攻。

从 1946 年 9 月上旬起，林彪、高岗等联名，或以东北局名义，发出“采取运动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根本方针”，“准备粉碎敌人进攻的指示”及《关于地方部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并在《东北日报》上发表了社论《东北军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当时，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南满的民主联军被迫撤退到中朝边界的吉林省临江、长白、蒙江、抚松四个偏远小县的狭小地区，处境非常困难。1946 年 10 月 31 日，经中央批准，成立南满分局（亦称辽东分局），派陈云去主持工作，【注 35 陈云任辽南分局书记兼辽南军区政委，萧劲光为副书记、军区司令员，肖华为副书记、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坚持辽东根据地斗争。

从 1946 年冬季至 1947 年春，民主联军总部成功地指挥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注 36 1946 年 12 月 27 日到 1947 年 3 月 3 日，民主联军在临江进行了四次保卫战，击退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统称为“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是为了配合临江保卫战，北满的部队三次南渡松花江，打击进攻临江之敌的后方，迫敌撤出临江。】战役，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计划，迫其转入守势。民主联军则完成了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经过短时的休整，开始了战略反攻。

从 1947 年 5 月中旬至 1948 年 3 月中旬，民主联军连续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迫使国民党退守沈阳、长春等几座孤城，大决战的时机到来了。

1948 年 2 月，东北局召开政治工作会议，高岗要求各军区和部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大家都认识到全国革命形势已到了一个转折点。军区和野战部队要抓紧时机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提高阶级觉悟和战斗能力，为解放全东北做出贡献。

4、后勤保障

在军队大发展和大反攻即将开始的时候，后勤工作更加重要而艰巨。为此，东北军区召开后勤工作会议，要求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高岗指出：大规模的战争能否胜利，后勤供应非常的重要。历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部门要抓紧组织军工生产及其他各项工作，保证前方部队的需要。为此曾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主力”的口号。

高岗历来很重视军工生产，早在 1946 年，民主联军总部就根据“七·七决议”精神决定成立军械局，在佳木斯、牡丹江、大连等地建立了七个军工生产基地；高岗亲自勘察厂址，筹建工厂。1947 年 10 月，民主联军总部召开军工会议，作出《关于军工生产的决定》，建立了一批军工厂和修械厂、所，形成制造、修理配套的军工生产系统，生产了大量武器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不仅基本保证了东北的需要，还支援了华北和华东战场，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扬。同时，成立军需、气象等学校及医科大学，培养各类技术人才。

1948 年 3 月，东北局作出解放全东北，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决策。7 月，成立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为保障军需运输作出贡献。在各次战役中，后勤部门组织大批物资和民工、担架等支援前线，保障各次战役的胜利。

1948 年 9 月，辽沈决战之前，成立了东北地区及各省的支前委员会，高岗亲任东北支前委员会主任兼民运部长，要求各级党和政府把支前工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他说：“要粮给粮，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一句话，要什么给什么。只要我们能办到，竭尽全力支援前线，要真正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为了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将后勤工作分为前方后勤与后方后勤。前方后勤属于军队编制、下设五、六个分部，负责部队的军械、供应和医疗救护等；后方后勤则负责军工、军需生产、物资调集、及物资运输等。这种后勤体制，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辽沈战役中，东北军区共运送粮草八千万斤，油料八千桶（每桶 141 公斤），动员民工 160 万人，其中 7.6 万随军参战，担架 13800 副，马车 6750 辆，修路 4370 公里，架桥 385 座，等等。在以后的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期间，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畜力，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全区参军总数 160 万人，支前民工 313 万人次，担架 206178 副，大车 306710 辆，马 907020 匹，粮食 450 万吨。谁能说得出，为战勤保障工作，高岗付出了多少心血！

1948 年 11 月 2 日，随着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接着是百万大军进关与平津战役。高岗作为东北战勤工作的总负责人，随军到平津战役前线总指挥部，为解放平津再立新功。

总之，关于北满时期的工作，高岗虽然不是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但他像在陕北创业时一样勤奋努力地工作。那时环境很艰苦，在哈尔滨，他就睡在沙发上，夜间不停的来电话，很少睡觉。有时半夜出发去前方找林彪商讨后勤保障工作；热河闹鼠疫，他带着警卫员去了解疫情；山东来的部队没有冬衣，一夜冻坏好多人，他亲自到处找仓库解决冬装；为了解决前方给养，他奔走前方后方。在整军治军方面，他发扬陕甘宁时期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教育。东北局改组以后，他一度主持东北局和军区司令部的工作，上下团结一致，很快扭转了东北的局面。因此，林彪很佩服他。大军进关时，高岗去送别，林彪感慨地说："老高，没有你，我打不了胜仗!"

就是在这期间，他们与彭真等人因为对工作方针的意见分歧而结怨。但从他们打算请刘少奇主持东北局工作这一点来看，当时对刘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

1947 年 8、9 月间，东北局派赵德尊去平山向中央工委汇报情况，他先找了安子文谈了彭真等人的错误、中央改组东北局的决定和东北局 7 月会议决议等情况。安子文说：彭真已调中央，现在他的地位这么高，在东北并未给什么处分，这事一定要慎重，千万别再说了。后来赵德尊和康生谈，康生说：这么重要的问题，当然要说。于是，赵德尊向刘少奇汇报，刘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东北党就是因为和朝鲜党不团结，结果垮了……

赵德尊回来向东北局汇报后，他们认为刘少奇偏袒彭真，从此对少奇产生隔阂。

高岗后来反省时说：

"1946 年改组东北局以后……自己一点宗派的眼光看问题是错误的，不是与人为善。那时，他（彭真）也坚持错误。我们不是帮助的态度，而是对立的态度。那是很狭隘的。当时争论很多，那时，我对，他错。但这是陈云、林彪、罗荣桓等一致的意见，不是我一个人的。当时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改组，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一些工作。"

（六）历史的总结

回顾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历史，尽管在出关初期的半年多，对一些问题发生意见分歧，甚至造成一些失误，但那不过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曲折。总的看来，东北各项工作的成就是伟大的，对全国解放战争所作的巨大贡献不可磨灭。

1948 年大军进关前夕，东北局于 11 月 23 日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注 37 该决议于 1949 年 5 月 6 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

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盲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 1945 年 12 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至 1946 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 1945 年 12 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使全党同志团结在东北局周围，同心协力，坚决依靠群众，动员 1.2 万干部深入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斗争，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土匪，使反对蒋美匪军的战争成为广大东北人民参加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的艰苦战争中，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之下，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从防御转入反攻，以致最后彻底的全部消灭了敌人，解放了全东北。

我们还要引用陈云在会上说的一段话：

东北解放的原因，一是中央领导的正确，二是有国际援助，三是关内的配合，四是前后方的努力。如果前面三条都有了，第四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点里有几条，可能在现在与以后，都会有不同意见，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其中包括和与战、敌我力量之强弱、独占东北、优势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七?七决议”之前就有争论，“七?七决议”以后也有，但是，另外的意见占了领导地位。这种争论在部队、在地方都有，这决不是个人意气，而是原则上的争论。因此，东北局的改组很有必要，否则搞不好。再就是 1.2 万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三是仗打得好。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四是“七?七决议”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 1948 年 12 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但“七•七决议”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 60 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然而在“七•七决议”以及 1948 年 11 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1953 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1985 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

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亦不符合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以今天的正确来掩盖过去的失误，也不应以今天的过错，甚至罪行来否定过去的功劳。

五、建设新东北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支援全国解放，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很大成绩东北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不止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向高岗学习。

（一）战略转变

早在1948年3月东北大反攻开始不久，东北局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东北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前线大兵团集中作战的一切需要。”1948年11月23日，大军进关前夕，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再次确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东北，支援全国，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一切为了支援与争取全国战争的胜利，仍然是东北党的战斗的口号”。决议强调：“必须百倍加强党在东北一切建设中的领导”，“加强党内组织统一”，“加强全党的团结，以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

东北全境解放，为东北和平建设创造了条件。1949年春，东北局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了全面恢复工作。

1949年8月22日，在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37再次强调：“东北是全国的有机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径沈阳时，指示东北局：“要把东北建设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确定了东北率先发展的方针。

1950年3月，在东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作《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投身到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去，并明确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列为东北经济建设三年计划纲要的战略目标。随后，东北人民政府通过了20年规划和三年经济计划纲要，提出195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首先是恢复国营企业的生产。

1、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环境变了，党的中心任务变了，党员的思想作风也必须随之而变。1949年，东北局首先在全区开展整风学习，以使全党从思想上、作风上跟上新的形势，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年8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来以后，针对当时党内一些思想状况，提出名誉、地位、物资待遇应当给谁的问题。9月8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荣誉属于谁？》的演讲，指出由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后，党的中心任务也要转变。过去是以战争为标准看一个干部，现在要以基本建设为标准考察干部。他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严肃批评了那些“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资享受”的干部。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物资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言”；“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

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资待遇，是人民根据你的贡献给的酬劳。”他提出，过去看一个干部，是以战争中的表现为标准，现在要以经济建设中的表现为标准。

这个报告反映很好。后来经过李荒、马洪等人修改，李富春把题目改为《荣誉是属于谁的？》，送中央审查。毛主席和刘少奇都看过这篇文章，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北日报》于 1949 年 11 月 10 日发表，后来《新华月报》、《活页文选》分别转载，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搞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节目，在全国宣传。

后来批判高岗时，有人说他用名誉、地位收买人心；也有人说这个报告是他剽窃别人的文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在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后，要学会搞建设，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岗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至于报告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乃至提纲都是他自己提出的，马洪只是帮他整理加工成文稿。像这样由秘书或写作班子帮助整理加工文稿的情况，不止高岗一人。这是否能算是“剽窃”呢？

党中央对东北的整风给予充分的肯定。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此后，东北的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局又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2、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1949 年 1 月，东北局成立了东北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构，制定了 1949 年的经济恢复计划。同时，按照党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并采取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主张，38 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于当年 8 月经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其中确定了从 1950 年到 1952 年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目标：“以全力争取吧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恢复到 1944 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工业方面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同时也注意轻工业的提高。农业方面是提高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制订了为实现这些目标应采取的措施。《施政方针》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特别提出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国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尽管当时没有预料到 1950 年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困难，但经过全区军民的艰苦努力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 1952 年，这些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3、大力培养各种技术干部，广招人才

伪满时期，东北的技术人员有许多流亡关内；东北解放后，绝大多数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因此，东北的技术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个人干部”；并在报刊上发表《欢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干部到经济战线去》等文章，广泛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恢复和建立各类学校，如开办培训班、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大学、行政学院和各类专科学校等，选拔优秀工农分子进行培养。到 1952 年，全区从个人中选拔培养了十万干部，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力量。第二是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建设战线，选派大批优秀老干部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要求他们努力钻研业务，尽快成为内行。第三，派李富春到中财委请求从关内招聘技术人才。经中央批准，东北局派专人到京津、上海、武汉、西南等地招聘上万名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到东北参加建设（当时关内

建设尚未恢复，失业的人很多）。第四，大胆录用旧军队和旧政权的技术人员，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业务上放手，生活上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第五，1950 年制定了对技术人员的五项优惠待遇，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来东北参加建设。通过这些措施，不但解决了东北的技术力量短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矛盾。

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建立干部梯队，定人定向，有计划地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成熟一个，提拔一个。克服盲目性和临时观点，保证干部需求和干部的质量。同时，对干部的使用上，用人唯贤，不论资历，不讲山头。

针对东北解放之初有人散布“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的流言，1950 年 1 月，刘少奇与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这种说法是无原则的、错误的，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他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4、克服困难恢复生产

由于许多生产设备、零配件在战乱中丢失，再加上苏联红军撤退时把大量工业和交通设备拆运回国，使东北工业生产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把失散在民间的机器、零件、器材等捐献出来，并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献计献策，帮助恢复生产；在生产中实行民主管理，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等群众运动；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管理方法等等，许多厂矿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同时，东北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 年夏，党中央派高岗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 12 个月的易货贸易协议，【注 38 当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苏两国尚未建交，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授权苏联政府和已建立的中国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并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以便于中共代表团进行公开参观访问活动。这个协定包括以物易物的形式获得苏联提供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以农副产品换回急需的生产设备和物质。当时，在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这个协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后，东北与苏联及其他友邻国家的合作也开展起来，到 1952 年 10 月，东北人民政府先后与苏联政府达成几十项新的贸易和经济援建协定；并开放边境所有口岸，允许当地政府与相邻的苏联、朝鲜、蒙古的地方政府进行贸易往来。

东北在 1949 年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准备工作，从 1950 年开始全面经济恢复工作。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阶段。

（二）建设新东北

1、优先发展重工业

由于东北的能源、交通和重工业比较发达，国营企业(主要是重工业)占很大比例（接收伪满和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以及关内解放战争的需求等，东北局制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在工业方面又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

抗美援朝战争促使东北吧方针经济,尤其是方针重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1951 年元旦，《东北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生产》的新年献词，指出：1951 年的四个重大任务，一是巩固国防；二是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经济建设；三是进一步深入和巩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四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1951 年 2 月 27 日，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他说，只有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资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目的，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

在发展工农业的过程中，东北党和政府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得以落实。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城市合作经济与私营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东北地区的工业恢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 1952 年底，东北工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总值超过 1943 年最高水平的 10%以上；工农业比重，1949 年为一百，1953 年工业为 486.1，农业为 162.4；生产资料年增长与消费资料比，1949 年为 66%，1952 年为 78%，1953 年 1～9 月尾 75.4%；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工业），1949 年国营企业为 72.6%，私营企业为 22.3%，合作社及公私合营、手工业伟 5.1%；1953 年分别为 79.4%（不含国防工业）、11.7%和 8.9%；商业，1953 年国营批发业伟 83.7%，国营与合作社的零售为 72.3%。39

三年间，由于东北工业恢复和改造，始终坚持以发展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为主的方针，使东北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 年东北工业的比重仅占 35%（农业比重为 65%），1950 年增加到 43%，1951 年增加到 52.6%，1952 年将增加到 55.9%，从而使东北工农业的比重达到 1943 年的水平。40 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工业，虽然基础庞大，但却是殖民地性质的，整个工业附属于日本的工业体系，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东北工业在恢复与改造中同时也摆脱了殖民地经济的性质，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东北工业的恢复，1952 年，全区开始了由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把基本建设提到了首位。这一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 1951 年增加了 125%；东北工业部投入新建（包括改建）工程的资金，1949 年只占 25%，1952 年增加到 90%。

2、建设强大的国防工业

1948 年冬，百万大军进关后，东北仍保持相当数量的军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 20 多万边防军。东北不足五千万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参军人数达 160 万，占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

东北局在施政方针中指出“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的目标，以及在作风上“克服游击习气与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等要求。

早在 1941 年，党中央就曾批准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航空学校。高岗亲自带人到安塞选校址、勘察机场、筹建航校，并于是年春季招收了一批学员。后来因种种原因，航校停办，党仍保留一个飞行大队。这个飞行大队于 1945 年 10 月来到东北，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航校的基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航校多次转移，高岗亲自主持选址和迁移工作。1948 年底，高岗向党中央汇报了东北航校的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在东北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1949 年 3 月，根据中央决定，由东北航校调一批干部成立了航空局。1949 年 5 月，在长春正式成立东北航校。这是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该校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在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上参加了检阅飞行。1950 年又成立了沈阳航校，在抗美援朝中，这两所航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 年夏天，刘少奇和高岗访苏期间，向苏联提出购买二白架飞机和代培飞行员的要求。虽然他当时不会预见到一年后将发生朝鲜战争，但他为军队近代化建设所作的努力，无疑是有远见的。

在国防工业方面，除北满和大连等地的军工厂外，沈阳解放后又接收了一批军工企业，更加强了军工生产，为大军进关作战和支援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等作出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局决定把南满的部分重工业工厂迁往北满，国防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养军治军方面，高岗在陕甘宁时期，就很重视屯垦养兵，吧屯垦与人民子弟兵的性质联系起来，作为长期方针。在和平年代，高岗仍坚持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方针，边练武，边生产；1950 年春，东北军区召开第一次部队生产会议，高岗提出军队要“自给三个月的粮

食”的任务。要求部队领导不仅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组织与指导部队开展多方面的生产，而且要组建工程队参加地方的水利、铁路、公路和基建工程。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经费，而且培养了人才，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在建设正规军的同时，加强民兵建设，平时生产，战时支前。抗美援朝战争中，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3、农林牧业全面发展

在农村工作方面，东北局发扬毛泽东在陕甘宁提出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从变工互助组到农业合作社，乃至大型国营农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探索。东北的农村合作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东北党和政府还制订了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治水治沙，在西满地区营造大规模的防护林，有计划地向北满地区移民垦荒。

东北人民政府在《施政方针》中提出的营造西北部防护林的计划，从1950年开始动工，经过勘察规划，加强了原有林的保护，营造了大量种苗，建立各级林业生产的领导、技术和种苗机构，做了大量准备改造。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东北人民政府作出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要求以6～１０年时间营造西北满防护林的宏伟规划（造林面积大的地区用10～12年完成），由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副主席林枫、高崇民、李富春署名发布实施。防护林南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余、甘南等地，长1100公里，宽三百余公里，跨60多个县（旗），受益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六千万亩），等于东北总面积的20%。完成建成后，林木收益可达相当于四千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这项工程不仅在国内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这一决策，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

为了把群众性的造林活动持续下去，东北人民政府规定每年4月5～20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造林护林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年的造林面积达到1950年的47.55倍。

遗憾的是，这项计划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林业发展带动了畜牧业发展，高岗多次强调增畜、爱畜、保畜和提高牲畜质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改良畜种和预防畜病的活动。到1952年，牲畜量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畜疫得到控制。

从1950年起，东北人民政府着手根治水患，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合理开发利用水力资源，进行现代化的水利建设，控制水害，造福万代。

4、大力支援全国

东北地区遵照党中央关于“先走一步，支援全国”的指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没有忘记关内的兄弟省区，不论在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还是在经济建设、干部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援。

早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东北酒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关内大批军用物资。解放初期，全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发资本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造成物价暴涨，市场混乱，金融危机。为了评议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心，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迅速扭转局面，东北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调运大批粮食、布匹、棉纱、木材、钢材等物资投放到关内市场，仅天津在1949年冬的半个月内，每天从东北调入的粮食达1000～1200万斤，有力地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帮助关内平息市场风波，渡过难关。在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地区承担了主要的战勤供应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关内的负担，支援了他们的经济恢复工作。

此外，东北地区还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向关内调配了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大批有经验的经济工作干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和各地的经济建设。

（三）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东北人民全力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1950年6月，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为防不

测，中央军委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东北的军队陡然增加了 26 万。毛泽东命令，“部队应准备于 9 月上旬能作战”。撤出，东北进入了紧张的战备。

然而，要真的投入一场新的战争，谈何容易！当时我国面临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关内的工农业生产尚未恢复，粮食、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后勤保障只能由东北多承担。因此，1950 年 10 月 8 日，毛泽东发出特急电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物，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遵照这个命令，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调派干部建立健全战勤机构，为志愿军组建五条后勤供应线；动员成千上万的民工、技术人员和担架、车辆等随军服务，源源不断地把战需物资运往前线，把伤病员和部分朝鲜难民运回国内；铁路实行军事化；重要工厂向北满转移……

三年间，为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高岗几次亲赴朝鲜，与金日成首相、彭德怀一道共商两军协同作战大计；他往返于北京、莫斯科和朝鲜之间，为争取苏联援助，做了许多工作。东北党和政府带领全区军民为保障战争的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受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好评，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抗美援朝的胜利的功劳是一百，后勤工作的功劳应该由 60。

在这期间，高岗被推举为军委副主席。

（四）增产节约与“三反”、“五反”运动

东北经济建设和支援朝鲜的任务都很重，东北的财政很困难，尽管中央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但东北局考虑到全国刚解放，关内的经济尚未恢复，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于是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克服困难。

1951 年 5 月，高岗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工会议上，做了《为增产 500 万吨粮食财富而斗争》的报告，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增产节约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广大职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心，促进了技术改革，增加了生产。当年 10 月，就增产节约价值一千万吨粮食的财富；到年底，完成价值 1600 万吨粮食的财富，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 年 10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学习推广东北经验，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随着增产节约的深入，揭露出许多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仅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严重地腐蚀党政干部，破坏党和政府的威望。东北局在 1951 年 8 月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高岗亲自作动员报告，东北局作出相应决定，41 把整顿党风和增产节约、“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同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张秀山为主任、张明远为副主任的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并由纪检委向各省市派出工作组，指导帮助开展“三反”运动。

东北的经验再次得到党中央的赞同，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全国推广。【注 39 1951 年 11 月 20 日，中央转高岗 11 月 1 日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为其写了批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 11 月 1 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1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介绍了东北的经验。12 月 1 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12 月 8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党中央的指示，使东北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更加深入健康地进行，并取得很大成

绩。

1952 年 5 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整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在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和不法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法资本家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向党政军机关国家干部行贿，并通过他们盗窃经济情报，十分猖狂地进行不法活动。情况反映到中央后，1952 年 1 月，中央批准开展以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情报（当时称为“五毒”）为内容的“五反“运动。3 月，中央提出处理不法商户的五项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根据这些原则，东北各省市对不法工商户分别进行了查处。

在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左”的偏差，如不切合实际地搞“打老虎”运动，要求各地抓“大老虎”，扩大了打击面，甚至发生逼人致死的现象。后来东北局纠正了这个错误做法。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清除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堕落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在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同时也纯洁了党政干部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工作热情，保障了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顺利进行。

总之，东北当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东北对全国的贡献自有公论。直到 40 多年后的今天，在全国各地依然能看到当年东北援建的工厂，能听到当年支援关内的工人、技术人员们未改的乡音。

不能否认，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当年高岗的确是在为彻底改变东北的贫穷落后面貌，为支援全国兄弟省区共同发展呕心沥血。惟其如此，他才能受到全东北人民的拥戴，也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

高岗在东北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据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干部说，一是他善于抓大事，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大事是什么？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具体政策，狠抓落实，并获得成功。在北满时期如此，东北解放后也是如此。起草他继承和发扬在陕甘宁时期“搞五湖四海”的精神，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干部，以德才取人，不论山头，不计资历，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三是深入实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这些就是高岗的“成功之道”。

然而必须看到，东北的成就虽然有高岗的一份贡献，但更主要是有党中央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真确的战略部署和东北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才使东北的解放早于全国其他地区，使东北人民有了得天独厚的和平环境，得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重建家园。而大批军队进关作战，一方面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东北人民的负担，为他们方针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建国方针，东北建设事业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是东北广大党员、干部、军队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下团结一致，舍生忘死地日夜奋战，才取得看抗美援朝和东北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没有这一切，高岗将一事无成。

1954 年，高岗在反省时说：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工作，开始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和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些工作。以后，中央支持，苏联帮助，调干部、出主意、买机器、来专家。自己在一些方面，部是摸得很深恨准的。爱报喜，不报忧。听到“先进”就舒服；一听说“有毛病”，就不高兴。因为自己没有看到这些，过高地估计自己个人的作用，也就产生了突出个人和不注意集体领导的缺点。

（五）新的分歧

如前所述，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高岗对刘少奇是尊重的，尽管后来产生了一些隔阂，但没有成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他们在工作中发生一些意见分歧，而高岗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意见分歧多了，自然就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但还说不上是反对刘少奇。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42 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1949 年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43 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在东北谈话（富农问题）。 44

1、关于私人工商业

1948 年，张闻天发表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之一，并提出了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思想。这个《提纲》是东北局制定关于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思想依据之一。

张闻天认为，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东北的国营经济，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谓“特殊的历史条件”，就是在日伪时期，东北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和汉奸所控制，几乎没有民族工商业。东北解放后，大量的日伪、汉奸产业和官僚资产被没收而成为强大的国营企业。即所有的大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并且国营经济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并且主要是以加工订货、包产包销、承揽工程等形式，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发展。

这种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相关的方针政策也与关内有所不同。

国营公私企业的关系，他充分注意到私人资本主义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指出他们的投机操纵之破坏作用。他提出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就是把必须要方针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并对其进行管制与监督，与其破坏性作长期斗争，并将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都无利可图，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而凡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因而使之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同它的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任务”；“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危险的。”这就是对私人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公私兼顾”的具体体现。

高岗完全接受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把它作为东北局指导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依据，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监督改造的方针处理公私关系及工农商的产购关系，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带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刘少奇不赞成东北的做法。

1949 年 5 月 31 日，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概述了他视察天津时发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后指出“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些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电报还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点名要张闻天参加，并发表意见。

电报最后指出：“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电报并转来邹大鹏给刘少奇的信，大意是：

（1）刘少奇的报告（天津讲话）解决了他久已存思想问题，即城市工作中的宁“左”勿右引起的苦恼。

（2）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令他们“垂头丧气”，但因为怕被说成“右倾”，又不敢提意见（他参加了东北局讨论和通过《提纲》的会议）。

（3）认为张闻天的主张是错误的，私人资本“垮了”不如利用起来好；“垮了”以后工人失业，劳资两不利。他举了一个牙刷厂为例。这分明属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张闻天明明是主张要保护和发展的，何错之有？

当时高岗正在苏联访问，便由李富春主持起草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存在的偏差，并提出改进意见。高岗回国后，不同意这个报告，重新组织人进行调查，另写报告，认为“少奇同志不了解东北的情况”，说东北的私人资本经济十分薄弱，对公营经济的依赖性很大，不承认东北局在政策上有“左”的偏差。

高岗还对东北局的几个常务说：少奇同志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薄一波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他叫王鹤寿等人吧刘少奇在天津队资本家讲话的记录（高岗在反省时说，这些谈话记录是陈云让王鹤寿送给他的）搜集起来，转给毛泽东，明确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为高岗“反党”的重要“罪证”。

2、公营农村发展道路

周恩来所说的合作社问题和刘少奇在东北的谈话，都关系到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早在陕甘宁时期，毛泽东就发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不但建立起许多变工队、互助组，也发展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公营农场等。在北满，中共北满分局推广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建立了一大批变工互助组织。1949 年，高岗进一步指出：“必须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加强公营农场”；“（互助组）在获得生产工具改造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东北局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注 40 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是：农贷，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或在价格上给以优待；良种及国家可能的农业扶助，变工组有优先权；劳模奖励基本奖给好的变工组等等。】以利其发展。

1950 年，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东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运动。到 1952 年，东北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 80%，耕地面积达到 84%，农场与合作社也有所增加。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解决较早的北满、东满等地区的大部分贫苦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少数农户买了牲口、车辆，有的还增加了土地，甚至雇了长工，放高利贷，有了剥削，成了新富农，其中不少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据东北局 1952 年 3 月的调查，这种新富农约有 1%左右的农户。有人把新中农称之为“排头”，而把新富农称之为“旗杆”，羡慕他们，学习他们，向往着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富裕起来。这是中国农民走了千百年的一条“单干致富”之路。

也有一些人认为，单干是农村发展的自发趋势，单干致富和集体致富是农村两条道路的反映，是农村发展的方向问题。高岗说，“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放弃无产阶级领导，主张完全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对于党员剥削问题，他认为，原则上讲，不允许党员剥削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要通过教育的办法解决，非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

1949 年夏季，刘少奇从苏联归国途径沈阳时，曾就新富农问题在东北局发表过意见。1950 年 1 月，东北局又就这些问题给刘少奇写信请示。

1950 年 1 月 23 日，刘少奇针对东北局提出的问题，找安子文、张秀山等人谈话，大意是：

关于互助组织问题，他说：现在农村生产力很低，农民生活仍很贫穷，仅可温饱，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把 70%的农民参加变工互助当作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及把三匹马、一辆车的农民看作新富农，都是“左”倾情绪。现在东北的这种农民部署富农而是中农，这种农民只不过占农民的 10%，还需要大大发展而不是限制。应该使 80%的农民都达到这种水平（其中有 10%的富农），将来才能谈得上集体化问题。现在的变工互助的基础是农民在贫困和破产的威胁和无力自耕的情况下出现的。将来生产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有能力独立经营土地时，这种互助就会解体而出现更多的单干农民，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织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这两个不同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关于富农及党员剥削问题，他说，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将来用国家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工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至于党员成了富农，或着富农成了党员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当前主要是发展生产，党员要带头，不要怕雇工，不要怕有的党员变成富农。这个问题可以到将来解决，那时开除十万八万的也没关系。认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同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应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后来雇工到北京开会时，将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组织部的信交给了毛泽东。高岗说，毛泽东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并对高说：“该丁的就要顶一顶。在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作交易，而要展开斗争！”

1951 年 4 月，山西省委关于老区农村合作社问题的一个报告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报告提出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是对私有制的一个否定因素。对于私有制基础应当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刘少奇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因而是错误的”；“想通过这种建立在贫困落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社来动摇和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危险的。”

以后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单用这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农业社会化要靠工业”；“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些意见。

至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已经超出了最初在东北农村问题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951 年 9 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10 月 14 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的多数，以及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对互助合作的指导思想，应是反对和防止农民的自发倾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要加以积极扶持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高级形式。各级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

毛泽东非常赞赏高岗的报告，1951 年 10 月 17 日即批示将报告及三个附件印成一个小册

子，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军、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的通报，转发高岗的报告，作为党内文件发全国学习。通报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1952 年 1 月，高岗组织一些人写了《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文章，并作了一次报告。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他说：“在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倾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这种说法的实质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他指出，对土改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是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富农党。这就将是人民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

毛泽东看这篇报告以后，批示：很好。请乔木同志作文字修改，以能公开发表为度（大意）。于是这篇文章不仅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且由新华书店印成“活页文选”向全国发行，扩大宣传。

供销合作社

早在 1948 年秋冬，张闻天经过调查研究，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国营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发展供销合作社，以及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等问题的意见，45 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利的助手。”因此,“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他还主张给社员分红利，以吸引农民加入供销社。

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高岗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指导东北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1949 年夏,刘少奇赴苏途经东北时,在东北局常委中谈到供销合作社问题时,批评张闻天的意见是“资本主义路线。”反对供销社以分红为号召吸引农民入社。他强调要从业务方面和价格方面为社员服务，吸引农民。1951 年,刘少奇写了《论合作社》一文发各中央局讨论，其中除上述意见外，还提出供销社对社员实行在价格优惠和配售制等具体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并说搞配售制是“发疯了。”

高岗在东北局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他认为刘少奇反对供销社盈利分红、限制社员入股等，是犯了“左”的错误；而搞配售制是恩赐观点，都是错误的。

高岗对刘少奇的意见不仅这些。

3、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

1949 年 8 月，高岗在东北施政方针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刘少奇的主张是：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46

1953 年，毛泽东提出在 10～15 年内基本实现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总路线。根据这个总路线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合国防现代化的方

针。

4、关于工会立场

解放前，企业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建国以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了，企业工会同行政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0 年 7 月，邓子恢在中南区总工会的一次报告中提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和‘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与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1950 年 8 月 4 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子恢同志的做法，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同时，邓子恢的报告先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高岗不同意邓子恢和刘少奇的意见。1951 年 4 月，他主持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针对邓子恢的观点进行批评。他认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行政与工会的立场没有不同，所谓“具体立场不同”，既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人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高岗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查修改，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给毛、刘写信，认为“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不适宜。”1951 年 5 月 10 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同意高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讲清楚。”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明文章暂不发表。

1951 年 10 月，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在工会工作中的两种意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对内政策上，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由此认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

不久，李立三受到批判并被解除职务。高岗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

此外，高岗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任用等方面对刘少奇也有一些意见。

总之，高岗在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期间，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方面，确实与刘少奇有一些分歧，而且他的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支持，也得到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

其实，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并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歧和争论的过程中，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常常把这些分歧和争论同对个人的态度，同对毛泽东或对刘少奇的态度联系起来，与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稍有不是，就说是反对谁，甚至就是“反党”。

1952 年秋，党中央决定调高岗到中央工作。10 月，高岗带着东北的成就与辉煌，也带着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歧与不满到北京去上任。后来，分歧与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也由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最终发展到对刘少奇的成见，甚至对其革命品质产生怀疑，以致要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来北京仅仅一年，自己被打得粉碎。

注释和出处

1　横山县原称怀远堡，与李继迁寨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清朝设怀远县，1914 年设立横山县以后，李继迁寨属横山县，《辞海》第 1977、3026 页。

2　当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打死一个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使刚刚发展

起来的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108号文件明确指出：“三甲原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3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4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5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7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8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期四天。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飞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抗战的持久性，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日本进攻的辅助方面。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我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00页。

9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1～103页。

10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

11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2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3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69页。

15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42页。

16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当时毛泽东主张现在不提这个问题。此后，张闻天名义上仍是总书记，而实际上把工作逐渐转移，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他只抓宣传教育工作。张培森：《张闻天在 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302页。

17　《辽沈决战》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0页。

18　《辽沈决战》下卷，第590页。

19　《辽沈决战》上卷：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第184页。

20　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68页。

附录二　怀英阁

横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很多，但那首“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的山歌却很出名，尤其那唱遍全国，乃至响彻宇宙的《东方红》，就是从这里唱出去的。如今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还能不时看到曾经遍布全国的红太阳衬着大海波涛的画面——这里的人们依然怀念着那火红的年代，以及曾经为老百姓做出贡献的人们。

离横山县不远处，有个叫庙湾的地方，一座十分精美的石牌坊耸立在山脚的公路旁，令过路人赞叹不已。

过石牌坊上山，便是庙区了。庙湾，顾名思义，是一处集天地间各路神灵的地方，大至玉皇大帝，小至无名小神，有的修了殿堂楼阁，有的只有在山石上挖一小洞，里面刻一小神像，都可享受人间香火。在庙群的东南角，还专门为女神们修了一座小院，与男神庙隔开。离山顶不远处有停车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和众多道教界人士，管理庙宇和接待游人都由道士负责。由此上行几十米到庙区的最高处，见两座并列的楼阁，那琉璃瓦顶的，便是我们要寻访的“怀英阁”。

跨进院门，迎面看见“怀英阁”额匾高悬于门头，那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写的。门内是写有“饮水知源”的影壁，绕过影壁，便是大堂。大堂正中是毛泽东的立像，四位陕北革命领袖谢子长、李子洲、刘志丹、高岗的半身像分列其左右；四壁有县文化馆制做的陕北革命历史连环画，也有一些老同志的题词之类，还有一些老同志题写的条幅或镌刻在柱子上，或悬挂着。在塑像的两侧还有八字形摆列着的几块画有革命史的宣传牌。总之，感觉比较繁杂，但却表达了人们对先烈们的一片怀念和敬仰之情。

楼上是三位领袖毛、朱。周的坐像并列在一个高台上，背景是红太阳照耀着陕北的山川；四壁也有讲述共产党、毛泽东功绩的连环画。怎么没有刘少奇呢？也许是因为他当时不在陕北吧？

出得门来，扶栏远眺，山川尽收眼底，豁然开朗。见旁边那座与“怀英阁”并列的楼阁，便问道士，此为何庙？

答曰：玉皇大帝。

又戏问：毛主席怎么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

道士认真答道：“毛主席说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能行!”

再细看，玉帝庙虽然也是两层楼，但却是灰砖青瓦结构，比起毛泽东“庙”的水泥加琉璃瓦来，逊色多了。

又问为什么要把怀英阁建在庙群里？

答曰：政府经费困难，放在这里好管理，是“以庙养馆”

原来如此！毛主席要是知道自己靠庙里的香火钱养活，会怎么想呢？

后来参观李自成纪念馆，它修建在城内的一个庙区里，也是“以庙养馆”。不知这“以庙养馆”是不是陕北人民的发明创造？

最后，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一尊石碑，记录着当地老百姓为修建“怀英阁”集资捐款捐物的明细账目，总计 14 万余元。接待者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榆林地区还有两处“怀英阁”。

十多天后回到北京，看到一部新华社记者拍的内部参考片，说榆林地区群众那么贫困，却大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其中特别提到集资就、十几万修建“怀英阁”，解说词还说（大意）:“反党分子高岗的塑像赫然列在毛主席身边……”。

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处理的，不得而知。它，这座凝聚着陕北干部群众对革命前辈思念之情的“怀英阁”，如今还在吗？

2007 年 7 月于北京

结束语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作者诚恳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平静的心情来审视、剖析这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了解其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牌匾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细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是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50 多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看到相关的领导人讲话、报告或文件中，无非是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具体就是反对刘少奇（这是事实），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推论了）。以图将来成为毛主席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无限上纲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足以置高岗余死地的其他犯罪事实。但他却自杀了，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这究竟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认真想来，高岗的毛病和错误的确不少，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们究竟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估量他的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真正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原则处理，而不是偏听偏信，夸大缺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悲剧会发生吗？

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尤其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混淆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合诸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错误绝非仅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国际国内、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影响外，领袖或领导集体自身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还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作风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反映在他们工作中，必然导致党的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偏离正确轨道。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缺乏真正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特别对领袖的监督，结果往往使这些偏差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必至酿成大损失，方才醒悟，却为时已晚。

试想，假如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不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主观唯心的东西；假如他们多一些民主法制观念，不搞一言堂，不独断专行，不以我划线定是非，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来说，尤其是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素质的提高，封建主义主义遗毒和实用主义谬误的清除，集体领导党和民主监督的确立和加强，显然是必须长期贯彻的艰巨任务。同时，在当前大力利用“机遇”的情况下，在经济、政治、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规范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并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抵制资本主义的迷惑，坚决清除腐败，去恶存善，去假存真，去丑存美，仍是十分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这些就是作者最恳切的期望。

2006 年 8 月

跋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从 1994 年开始筹划到现在出版，经过了漫长的 13 年。从最初打算写一个回忆资料，到后来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从思路到内容到结构，经过几个人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几经审核，务求材料真实，言辞朴实，立论有据。在交稿之前又多次多方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

这本书是 50 多年来第一次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岗事件发生过程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它对我党在建国后政治生活的影响，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

事实上，多年来，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受株连或未受

株连的同志，都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或申诉，要求对此案重新审查，重作结论。在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2005 年，我们很欣慰地得消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向高岗的亲属表示（大意）：中央领导很重视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几年来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一致认为，高岗同志在西北和东北时期对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他在北京的问题，由于有 1955 年党代会的决议，中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0 年啊，终于又听到了“高岗同志”这亲切的称呼！对此，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他的战友及部下，都会感到欣慰的。接下来，中央同意高岗的亲属修复他的墓碑——按照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样子，只刻写墓主“高岗”和生卒年份，不写立碑人，不写碑文。

我第一次去万安公墓看那半截残碑，是在 1997 年的初夏。它掩映在杂草丛中，一片凄凉。要知道，他可是共和国的第一任副主席呀！

2006 年听说要重修墓碑了，便去看个究竟，拍了第二张照片——整个墓区经过清理，杂草没有了，显得清爽宁静的两侧还栽了两束鲜花。转眼看到小路旁多了一个告示牌，过去一看，原来是告知墓区路线及“名人墓”所在位置，高岗名列其中第 71 位，位置在“酉区”。

2007 年初，听说墓碑修好了，赵老几次要去看看。我说等天暖和再去吧，坐轮椅不会很累。5 月，他过生日，提起此事，却因孩子出差，说等回来再一起去。他多年患重病，很久没有写毛笔字了。在等待日子里，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几次才写成一张条幅“高岗同志之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要把它贴在碑上，照张相留个纪念，也算了个心愿。

不料，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在病危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这件事。6 月 27 日，赵家兄弟和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遵照赵老的嘱托，贴上碑铭条幅，献上一个花篮，拍了照片。忽然天暗如黑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第二天我去医院，给他看了我拍的照片。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却一个心愿。昨天……天意，冤案，窦娥冤，六月雪，高岗冤，天降暴雨……这本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曲折，几个人，十几年，不容易，要写个东西记下来……事情办成了，做了一件好事，不要沾沾自喜……是一家之言，要准备接受各方面的响应，特别是不同的反映，要准备挨骂……”

或许是他再无牵挂，或许是医生、家属和他自己努力配合，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康复！

为了让他早日看到这本书，我和出版社的同仁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我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既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鼓励我自己。

然而，天不遂人愿！9 月 9 日（星期日）早晨六点半，突然传来噩耗：赵老已于昨夜十点 50 分离开了我们！本来，我正准备这天下午去医院，向他报告书稿已进入排版阶段的消息，不料还是迟了一步！由于他生前已办理好遗体捐赠手续，9 日上午八点半，我随赵老的子女们一道，匆匆送他最后一程——将遗体送往北医三院的解剖楼！来不及通知亲朋好友，连鲜花都来不及准备，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真正的“后事从简”！从接到噩耗起，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赵老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他生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历经坎坷；身后又为医学研究作最后的贡献。他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堪称我们的楷模。我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想到这些，当晚我又投入紧张的校核书稿工作，以期实现赵老的遗愿—让这本书早日面世。

张晓霁